

# 西安文革狂潮

罗玉振

## （一）：返校见闻

1966年3月，西北工业大学的师生到陕西洛南县参加第二批社教即“四清”运动。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们工作队只是传达学习一些有关文件，听听有关报告、念念报纸上的有关文章等，然后讨论并提高对文化革命的认识。

7月下旬，正当我们热火朝天地开展“四清”工作时，从西安回洛南县的师生把我们大学生召集在一起搞文化大革命，传达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北京、清华等大学的学生赶走工作组，成立红卫兵组织，并起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以及毛主席亲自给红卫兵写回信支持他们造反等消息。同学们都激动得跃跃欲试，当晚立即组织游行示威，并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口号，弄得其他工作队员和农村干部群众莫名其妙。

紧接着，我们给工作队领导写大字报，批判他们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我们还批判斗争工作队的领导，捆绑撕我们大字报的工作队员史占虎给他戴高帽子斗争，逼迫杨育英脱去军衣、摘掉军帽斗争他。我们所谓的革命行动把社教运动的秩序打乱了，引起各级领导的不满。他们把我们定性为反革命行为，是以带队老师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斗争我们的老师，围攻批判我们学生。

8月中旬，西安的文化革命进入高潮，以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矿冶学院（简称冶院）为首的少数革命造反派把斗争矛头直指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提出“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的口号，把揭发批判他们问题的大字报、大标语往大街和省委门口张贴，遭到许多不明真相群众的指责、围攻、谩骂和殴打。在我们学校的强烈要求下，省委下发通知，要求我们这些在农村搞社教的全体师生立即返校搞文化大革命。

8月24日，全体师生乘汽车离开洛南县返校。汽车一进入西安市和平门，我们便看到一派战斗气氛，大街两旁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人潮涌动、车辆如织。大标语和大字报的内容大部分是支持西交大、西工大和冶院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的，还有揭发省委问题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谣可耻、传谣可悲、信谣可恶、辟谣可敬”的大标语、大字报随处可见，也有少量“坚决抗议西交大、西工大、冶院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罪行”的标语。

汽车开得越来越慢，不时停车或急刹车。进入东大街往鼓楼行驶时，只见前面一片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口号声不断，毛主席像、语录牌、红旗和各种横幅在人海中林立，汽车和电车拥堵不堪。原来，今天市里召开了由十四个单位发起的“西安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五六万人。我们西工大也是发起单位之一，大部分师生都来参加大会了。现在大会刚刚结束，他们正在大街上游行示威。我们的汽车只好掉头寻找偏僻的小巷回校。

我们学校的规模在西安市排第二（西安交通大学排第一），在校学生有一万多，地址在西南郊的边家村。学校的南大门（正门）对着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东门斜对着西北大学。汽车到校门口时，因为大部分师生员工到市里参加大会了，只有一百多人夹道欢迎我们。学校的战斗气氛很浓，从校门口到新饭厅的马路两旁尽是大字报栏，吸引了众多人在观看，大部分人是外面来的。大字报内容大部分是针对省委的，也有一些针对本校。马路边有一堆一堆的人群，正在激烈地辩论着什么。我和同学们一样都急着想看大字报。下车后回到宿舍，我把背包往床上一扔，草草铺好床、洗把脸就匆匆下楼到外面看大字报去了。

我走出宿舍楼，站在路口向四下望望，看到操场上围着许多人，走近观看，只见学校大轿车的玻璃被砸得破烂不堪，车周围挂着宣传牌，其中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流血惨案写照，并有许多学生被打伤、衣服被撕破的照片，还有人在校车上采访。我很关心这三次流血事件的情况，

便挤在人群中从头仔细看起来。

原来，8月14日至16日，一些大学生到省委门前贴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许多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坚信西北局、陕西省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阻止、围攻、殴打贴大字报的学生。我校的宣传车在大街上因散发揭发省委问题的稿件，同样遭到许多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和打、砸、抢。16日下午两点左右，西交大、冶院和其他院校的师生得知同学们被殴打的消息后，按捺不住怒火，冲出校门来到省委门前，并向省委提出八项要求。然而，省委一直没有人出来答复并解决问题。他们便在省委门前的建国路上静坐示威。西工大和许多院校的师生及单位群众陆续来支援参加静坐，最多时达六七万人。同时，还派学生代表冲破层层封锁到北京找中央领导反映西安的严重事态。一直到8月18日，刚从北京参加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的西北局书记刘兰涛出来讲话，基本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各校学生才停止静坐撤离回校。

刘兰涛在讲话中强调：有极少数人说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完全烂掉了”、是“黑帮”等，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员工是不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了“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口号是不对的，不利于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揭发和批评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说法同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是不一致的。还有人提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的口号，必须指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绝对正确的。每个革命者，对那些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将他们统统打倒，彻底粉碎。但是，把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并列起来的提法则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地方党组织，包括中央代表机关，如中央局都不能同党中央相提并论。最近，由于“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引起了许多争论，我们必须加以澄清。

我想，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学生们的革命行动的，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师生的一切革命行动”，可能就是针对西安的。该社论大长了革命师生的士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我听同学们议论说，而今省委仍暗中指示不让群众和学生接触，怕他们了解事实真相而转变立场和革命师生站在一起，说明他们心中有鬼，还要继续抵制革命造反派的揭发和批判。

我们高中的同班同学考到西安7个，其中西交大3个，西工大包括我两个，那个叫璩金生，在八系，我在五系，西安石油学院和西安公路学院各一个。我和璩金生脾气相投，很合得来。第二天上午，我想邀璩金生一起去西交大看望他们三个，就到八系的宿舍找他。但是他们系下去搞社教还没返校，我很遗憾，只好一个人去西交大了。

西交大在西安市的东南，距我们学校大概有20多里地，没有直达公共汽车。我扭头走出东校门，穿过边家村，顺着南城墙的马路直奔西交大。

一路上看到许多大字报，走到和平门时，我看到一张大字报前围一大群人，便也走过去观看。原来是8月21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一下吸引了我，我便驻足观看。大字报的谈话内容如下（西交大指西交大学生代表）：

西交大：十六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学校的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这是他们逼出来。我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不知道中央首长怎样看？

陶铸：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动！（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查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了多少同学？

西交大：不太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

陶铸：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人，我们正在调查。

西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

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西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严重的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陶铸：你们来时还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西交大：他们在西安车站楼上安两个喇叭，骂我们是以西交大为首的狗崽子，还有盯梢、跟踪。

.....

陶铸：地方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你们。（鼓掌）李世英同志来没有？

西交大：没有。

陶铸：李世英是一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信件。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省委楼那么大，坐坐怕什么！（热烈鼓掌）你们的静坐示威不仅是革命行动，而且是伟大的创举。来北京的同志们是通过层层封锁才来的。你们是人民的好儿子，不是反革命，给同学们戴的反革命分子帽子一笔勾销，来北京是革命的需要。你们要革西北局的命、革省委的命，他们怎么能不反抗呢？什么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人感觉奇怪。你们要有革命的韧性，不要一碰钉子就灰心丧气。

西交大：有些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

陶铸：我们现在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谁如果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当然应该打倒。打人就不对了，真是反革命还有法制嘛！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别人革命，这不是如赫鲁晓夫一样了吗？怕革命的就是自己心中有鬼。（鼓掌）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同志们，相信你们是革命的，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来，毛主席知道你们的情况。西北局打来电话，西安现在不准在街上搞辩论、贴标语、贴大字报，（大家问：这样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这算你们的创举嘛！这样可以向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嘛！闹革命怎么能在屋子里闹呢？革命不能只限制在屋子里，辩论可以上街，大字报可以上街。外国人究竟是少数，北京不是照样也有外国人，大字报不是也照样贴在街上了吗？

西交大：十五日我们接到伪造的党中央电报，说这两句口号“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是错误的。大家听到后十分兴奋。我们刚要游行宣传，就觉察到是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阴谋。他们组织人来打我们，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绝不是一般性问题。

陶铸：中央没有打过此类电报，以后你们写一个报告，详细一些，送到中南海秘书局转我收。你们不用着急回去，在这里看一看。你们不要怕，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你们闹革命，碰钉子不要紧。林彪同志那天不是讲了吗？要反对压制革命的形形色色的行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竟然有工人镇压学生，奇怪吗？斗争不要灰心，要坚持下去，有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有十六条，你们什么都不要怕，党的领导就是十六条。省委虽然是一个很高的领导机关，但是违背十六条，我们就不听。谁贯彻毛泽东思想好，贯彻十六条好，谁就可以当我们的领导。党的领导，不光是组织领导，更重要的是政策领导。

.....

看后我才明白，正是党中央的支持，我们西安学生的革命行动才取得了胜利。我坚信我们学校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革命的，而省委有严重错误。“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流血惨案就是省委中的一些黑帮一手策划的。

## （二）：陕西日报社前静坐

过去和平门，便看到一队一队打着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旗帜、举着毛主席像或毛主席语录牌的人流涌向西交大，大部分是去串联的，也有带着慰问信或贺喜大字报，敲锣打鼓去走访慰问的。西交大的校门口人更多，热闹非凡。学校周围的篱笆上尽是大字报，看的人也很多。我走进大门，校内更是拥挤不堪，在体育馆门前，参观的队伍排好长，里面正在展览“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流血惨案的照片和实物。

我辗转找到高中同学李丰有的宿舍，但他不在。他原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聪明好学，待人热情，考入该校工程物理系。听他们同宿舍的同学介绍，他还是系学生会的什么干部，可能接待来访群众去了。同宿舍的同学热情地让我坐下等，但干急等不到。快吃午饭时，刚好碰到高中的另一个同学谷玉海来宿舍找李丰有。他个头短粗，黑乎乎的胖脸盘，大大咧咧不善言谈，但很聪明，虽然没怎么用功却考入西交大无线电元件系。我们好久不见了，见了面分外亲热，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双手紧紧握着嘻嘻哈哈互致问候。他拉着我到饭厅吃完饭后，又带我到动力系找到高中的第三个同学王玉申。他个头瘦小，不爱说话，但记性非常好。我们交谈了一会便一起去找李丰有。他刚好回宿舍拿什么东西，看到我非常亲热地拉着我的手，但他太忙，只跟我说几句话，交代他们俩陪我玩就匆匆走了。他俩陪我在校园里边浏览边交谈，路两旁都是大字报，看的人熙熙攘攘、摩肩擦踵。他们俩干脆把我领到一块人不太多的草坪上盘腿坐下来交谈。我把在洛南县搞“四清”和文化革命的情况简单谈了谈，主要听他们介绍他们学校和近段西安市的文化革命情况。他们着重给我介绍了他们学校发生的所谓“六·六”事件。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时，西交大广播台打破惯例没有转播，同学们认为校党委是有意不转播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大字报。第二天上午，行政楼前贴出许多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当晚11时许，陕西省委紧急抽调500余名县团级以上干部组成工作团，由严克伦率领进驻西交大，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并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全校同学辩论“校党委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同时，校长彭康宣布停课3天，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学生会主席唐素等一批学生干部很快贴出“誓死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但是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却越来越多，并怀疑工作团包庇校党委。

6月6日，以李世英、杨克剑、刘维娜为首的众多激进学生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贴大字报，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并怀疑省委有黑帮、黑线等。接着，他们又分别到西北局、陕西省委、新华分社和陕西日报社反映学校工作团包庇校党委的情况。他们态度激昂、言辞激烈，强烈要求撤走工作团。中共西北局严词拒绝，并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牛鬼蛇神“闹事”，是反革命事件。当晚，他们指示工作团组织队伍镇压、反击、追根子。

第二天，工作团在全校开展排查和批判参与“六·六事件”的学生，并采取逐个登记、照象、电话录音等措施。各系召开大小斗争会围攻、批斗被查出的“闹事”学生，不少同学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逼自杀。8日，学校工作组把李世英、杨克剑、刘维娜等人戴上高帽子批斗后游校。当天，王永婷跳楼身亡，第二天中午李世英自杀时被及时抢救未遂。他在给父母亲的遗书中说，虽然他受了打击，但他不埋怨党，也不要父母亲埋怨党。后来，工作组又在全校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活动，逐个追查、人人过关，批斗了许多同学，白色恐怖笼罩校园长达40余天。听他们俩介绍，我不住惊叹他们学校的文化革命比我们在洛南的斗争激烈多了。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许多心里话还没怎么说就吃晚饭了。晚饭后，王玉申有事忙去了。谷玉海把我送到校门口，我和他告别后往回走。走到东大街陕西日报社门口时，看到许多人挤在门口旁边的橱窗里吵吵嚷嚷，过去一看，报栏里挂着一份当天的《陕西日报》，透过灯光清楚地看到头版印的毛主席像后不偏不斜地印有“纸老虎”三个大字。许多人气愤地涌进报社要找总编和排版人辩论，我也随着跟了进去。门卫的军人让众人在院子里等他们去叫，但迟迟叫不来总编和排版人，却让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来搪塞群

众。群众不答应，吵嚷着要他们的总编出来答话。我看时间晚了就离开报社走了。

走到钟楼西边的一个糕点门市部前时，看到许多人围在门口和门市部的人激烈地辩论着。我走近一听，原来是门市部的那个女店员把门口贴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标语撕掉后换上“坚决支持西北局第一书记刘兰涛同志的讲话”的标语了。那些人质问门市部的人为什么撕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标语，那个女店员的态度稍微好些，耐心地解释着，但另一个好像是门市部的头头，态度很蛮横，说什么“刘兰涛的讲话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并威胁说：“谁敢反对刘兰涛同志的讲话？”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越来越激烈，嗓门一个比一个大，都想压住对方。

我看看门市部的表，时针已接近 12 点，立即离开他们蹬登上电车。乘车的人不太多，我掏出四分钱买好到西城门的票后就找空位坐下，有几个人正在旁若无人地大声议论着，说现在最顽固的保皇派就是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北政法学院啦…我一听就明白他们是造反派，说明目前大专院校中造反派已经是大多数了，心中倍感欣慰。电车很快到西城门停下，我下车后快步往学校赶。

回到房间，同学们都已经熄灯睡了。我们宿舍住了 7 位同学，放着 5 张下铺的床，靠窗放一张共用的三斗桌。我在桌子东面的下铺，上铺是江苏启东县来的黄炳球；对面的上铺是四川自贡市来的王人武，下铺是黑龙江伊春市来的谷成义；和他们紧邻对着门口的上铺是南京市来的林瑞生，下铺是浙江绍兴来的陈美绍；门口靠前墙的下铺是陕西韩城县来的张希俊，上铺是我们 7 人存放东西的，靠我的床头处放着脸盆架。我们 7 人来自 7 个省市，语言难以沟通，尤其是江苏、浙江的家乡话我们几个一点也听不懂。但是，我们都能听懂谷成义的东北话，大家都尽量说带有当地口音的普通话，不懂时就让谷成义翻译。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床前把被子打开、从盆架上取出脸盆到卫生间洗漱。回到房间刚躺下没几分钟，突然，学校的广播响了：“通知——通知——，同学们马上起床，同学们马上起床，立即集合到陕西日报社造反，立即集合到陕西日报社造反！”反复播送几遍后又播放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一听到学校通知，我立即拉开电灯叫他们几个快起床，然后先跑出宿舍到外边的马路上集合。人还未齐，稀稀拉拉的队伍已经往东校门方向出发了，我借助路灯赶快跟上。出校门后，同学们几乎是连走带跑，队形熙熙攘攘穿过西城门后，直奔东大街陕西日报社。刚过钟楼 50 米左右就停下了，放眼望去，整个东大街影影绰绰飘扬着红旗、校旗及毛主席像、语录牌。辩论会已经开始，喇叭里正传出各单位代表的声讨发言，我们便就地坐下来听。代表的发言个个义愤填膺，说报社有意侮辱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天快亮时，我听到大会提出六项要求让省委立即答复：一是陕西日报立即停刊；二是揪出报社总编斗争；三是要求刘兰涛和霍士廉必须参加斗争会，但不能发言；四是此事立即电告党中央毛主席；五是马上举行游行示威，声讨陕西日报社的滔天罪行。后来不知怎么搞的，一直到天大亮了也没游行，估计省委可能不同意正在交涉，大会主持人让我们大家继续静坐示威。

已经半晌了，我们一直坐在大街上没有饭吃、又饿又困。广播里不时播放着声讨陕西日报社的滔天罪行、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我和刘瑞池正在无精打采地互相小声议论着，忽然有人喊“我们西工大的要撤走”，我们都暗自高兴，立即站起来跟着队伍往西拥。但走到钟楼，又有人喊：“同志们！同学们！不要走，一走，我们奋战到现在就白费啦！”前边的同学立即掉头拐了回来，好像没人指挥，一窝蜂似地又回到原地乱七八糟地坐下。

将近中午 12 点时，许多同学受不了太阳晒，坐到路边的树荫下，马路上的同学们三五成群稀稀拉拉地围坐着谈天说地，有的同学已悄悄溜走，学校也没人管。我们班的刘瑞池等 3 人在树荫下不时发着牢骚。“我们学校的头头干啥去了？”“说不定他们在哪儿吃饭哪，叫我们在这儿受洋罪…”连天的奔波，我实在疲

急不堪，也无心和他们说话，独自坐在马路边打起瞌睡来。正在我迷迷糊糊时，刘瑞池走到身边推了我一下。我抬头睁眼一看，他们几个正一个接一个地悄悄离开。我也站起来跟着他们往西大街走。走到鼓楼时，马路上没有静坐的同学了，我们便聚集一起互相开着玩笑、发着牢骚有气无力地走回学校。饭堂已经关门，我们也顾不得饿，回到宿舍往床上一躺便呼呼入睡了。

第二天上午，根据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安排，从社教地区回来的各班推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们 65 届 52 专业是一个大班，下面又分 5251 和 5252 两个小班。上午，两个小班先开会推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们 5252 班采取投票的办法推选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结果，李世文得全票为组长，张云忠和我都是 14 票为副组长。我很歉疚，害怕干不好对不起大家对我的信任，但想到，既然大家选我了，也不好推辞，只有尽自己的能力去干了。在讨论时有人提出，现在的任务应该是组织人下去宣传发动群众。但我认为，我们刚从洛南回来，对西安的情况还不熟悉，目前的任务应该是学习了解熟悉情况，如果出去一问三不知怎么给别人宣传？大部分同学赞成我的意见，最后，组长李世文宣布我们近段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大字报，了解学校和西安市近来的文化革命情况，并强调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要看，以便全面了解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晚上，我们大班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最后选出两人，一个是我们的老师盛希福，另一个是 5251 班的谭玉兴。开完会，我听说到宝鸡社教的八系同学回来了，马上跑到 21 舍找高中同班同学璩金生。他刚吃过饭回到宿舍，看见我非常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说：“我正想去找你哩，没想到你已经来了。”我们俩交谈了好一会，互相介绍了近段的情况。我还给他介绍了去西交大见到我们班的三个同学和他们学校的文化革命情况等，看同宿舍的同学要休息了，我就和他告别回去睡了。



### （三）：市儿童剧院的武斗

和我们一起搞社教的西安市儿童剧院的年轻演员们，思想单纯变化快。在洛南时，有些人开始支持我们学生造反，后来跟工作队领导一个鼻孔出气，成为批斗、围攻、打击我们的急先锋，但一回到西安又立马变成革命造反派了。28日这天，他们专门到我们学校慰问演出两场，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但是，和我在一个生产队搞社教的路林和赵国芬没有来，这让我很遗憾。路林和我关系很好，亲如兄弟。工作中，他总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和我谈心，开导、安慰并鼓励我。我们俩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知心朋友。

陕西日报社变化也很快，8月29日，他们在头版刊登出标题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社论。社论中谈到，省委对西交大的所谓“六·六”事件彻底给予平反，并肯定他们是革命行动。同时，省委还检讨说：“这个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另外，《陕西日报》还在头版刊登了“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出现新的高潮”的文章。但是，同学们的大字报里却说：“省委只是迫于压力才假惺惺地在口头上承认错误做检查的，从他们的许多行动看，骨子里仍然不甘心失败。目前，西安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暂时处于平静状态，预料省委的那些黑帮可能还会来一个大反扑。”

9月1日，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登出周总理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内容是让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去一次，到毛主席身旁学习革命知识。这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令我们高兴极了，个个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声不时在校园里回荡。

但是近来，陕西日报社抓住西交大中个别坏人的“打、砸、抢”行为，肆意歪曲和捏造，扩大事实真相，攻一点不及其余，企图歪曲抹杀西交大的革命主流。他们不仅印刷出大量传单，开着汽车在全市散发，而且还把传单夹在报纸里送到全省各地各订户手上。同学们纷纷贴出大字报“省委假检讨真对抗的丑恶嘴脸”、“省委何其毒也”……

许多同学想去西交大了解他们学校的情况，看他们有何反应，我也有这个想法。9月2日上午，我和李建亭、黄炳球、高景崇同学结伴一起去西交大，走到雁塔路口时，李建亭提议先到儿童剧院看望一下和我们一起搞社教的同志。我想也好，于是，我们改变方向顺着雁塔路去儿童剧院。

来到儿童剧院，已近中午，和我们共过事的王文堂、刘金萍、孟庆侠、高金铭等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他们的宿舍，又是沏茶倒水，又是张罗着到食堂给我们打饭，煞是热情。但奇怪的是，原来对我一直很亲近的路林却冷冰冰的，只打了个招呼“老田来了”，就借故溜走了。和我很熟的范文焕连句话也没说就躲起来了。我问怎么没见赵国芬？孟庆侠指了指一间锁着门的房间说，她有病回家休息了。看他们几个人都在亲热地交谈着，我有一种失落感，闷闷不乐地踱出房间看院子里的大字报。看了几篇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路林和范文焕曾经是保皇派，正遭到一些人的批判，怪不得他们俩灰溜溜地不愿意和我接触。为了避免尴尬，我就打消了再去找路林交谈的念头。

吃过午饭，他们几个正在亲热地交谈着，我独自来到院子里继续看他们的大字报。这时，一个戴着北京音乐学院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正在鼓动几个年轻人斗争他们揪出来的反党分子陈振纪。他们把陈振纪拉到院子中触地跪住，然后那个年轻人指挥那几个年轻人用树枝抽打他的屁股。陈振纪狼狈不堪地趴在地上不敢吱声，污秽的脸紧绷着，每打一下全身抽搐一下。我觉得他们的树枝好像抽在了我身上，心里禁不住一颤一颤的。我不忍心再看下去，赶快把头扭向大字报，但那噼噼啪啪的抽打声搅得我也看不进去大字报。

过了一会，他们好像打累停下来了。我扭回头看时，却见一个年轻人上去踹陈振纪一脚骂道：“滚你妈的蛋！”当陈振纪慢慢支起身子往屋里爬时，他们几个人又紧跟在后面用脚踢。院子西面是五六间专供被揪

出的黑帮住的没有窗户的小屋，屋门的上部被大字报封着，下面只留四五十公分高的一段空隙可以让他们爬进爬出，大字报上用黑色大字写着黑帮分子×××。我还听到那个北京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对那几个年轻人说：“我看你们西安光讲什么文斗、文斗，我看就得武斗……”我认为，这个红卫兵的说法不符合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公开号召打人肯定是错误的，但我不能制止，那样他们一定说我是同情、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说不定还会斗争我。

我默默走回房间，他们正要送李建亭他们走。我问：“那个北京的红卫兵公开打人，怎么不按党中央的十六条的规定搞啊？”王文堂神秘兮兮地小声道：“他说他们北京比我们这儿更厉害，谁敢管啊。”高金铭接着说：“每天早上，他们让这些黑帮们围着院子跑圈，谁被后边的人追上就要被后边的人打，跑完还要互相打脸。你没看到，陈振纪的脸都被打肿了？”我惊诧道：“我还真没注意到。”王文堂又悄悄插话道：“昨天晚上 12 点，陈振纪已经睡了，他们跑去说他睡的早了，把他叫起来要他围着院子跑 20 圈，但陈振纪没跑够就气喘吁吁跑不动了，他们就命令他自己搥自己的脸 20 下。”我暗想，这帮年轻人太残酷无情了。

李建亭拉着我道：“这不关咱们的事，咱们快走吧。”我们刚走到院里，就看到范文焕哭丧着脸推着一辆小车从我们眼前过去，车上堆着一些衣物、书籍、化妆品等乱七八糟东西。我以为她在搬家，一问刘金萍，原来是从她屋里搜出的资产阶级用品，让她亲自推去展览。看到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我们几个人都感到很尴尬，和他们道别后便匆匆离去。

9 月 5 日这天上午，学校组织同学们到西安市体育场参加全市什么“红五类”子弟辩论会。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弟，因此好多同学都去参加会了。我本来打算给家里和几个高中同学写回信，然后再看校园的大字报，可刘瑞池拉着我说：“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只当是去玩玩散散心吧，有些人想参加还没资格呢。”盛情难却，我就和他一起去了。大会主要辩论两个问题：一是目前西安市的斗争焦点是什么？二是对 8 月 30 日市体育场召开的“全市红卫兵大会”的看法。我们没有参加那天的红卫兵大会，因此对他们的辩论不感兴趣，坐在后边闲扯。可能许多同学也和我们一样不感兴趣，一个一个提前溜走了，会场上逐渐变得稀稀拉拉。下午 3 点左右，我和刘瑞池看我们班走的只剩我们四个人了，就招呼一声也一起回校了。

当晚，学校放映了当时被称为大毒草的喜剧电影《球迷》。因为是供批判的内部片，看的人很多，整个电影场都坐满了。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些工人球迷为观看一场明星足球赛而争抢入场券。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批判该电影把工人描绘得分文不值，流氓、阿飞充满了银幕，损坏、侮辱了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其实，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在观看时，那些演员的滑稽表演有时逗得人想笑，但是，没有人敢放声大笑，有些人实在忍不住了只好用手捂着嘴哧哧地偷笑。



图 1 《球迷》剧照

像这样风平浪静的日子仅过了十来天，西安市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静坐绝食斗争，惊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

## （四）：省委门前静坐绝食

9月6日上午9点左右，我们学校的广播突然通知全校师生员工紧急集合，然后浩浩荡荡地开到省委门前的建国路上参加静坐绝食斗争。我们到那里后，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快中午时，高音喇叭才播出原因。

前些时候，西安工业学院一直是受校党委控制的“誓死保卫陕西省委”“誓死保卫西北局”的保皇派，铁板一块，没有人敢站出来揭发批判校领导的问题。后来，由于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不断煽风点火，该校逐渐分化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由130多名学生成立，他们贴出了揭发校领导和省委问题的大字报。这下触怒了校领导（可能还有省委），学校称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下令让他们解散，并批判斗争这些学生，甚至围攻、殴打一些态度坚决、不肯屈服的学生。一个学生受不了他残酷批斗偷偷逃出学校，至今下落不明。

更严重的是，校领导竟然宣布，从9月3日晚起不给这些同学饭吃。为此，外地串联的学生一直与学校领导交涉，但问题一直解决不了。眼看这130多名学生已经饿了三天，不能再拖下去了。昨天，几十个外地串联的学生来到省委，要求省委出面解决，提出了六条要求，省委却把他们拒之门外，一直没人出头接见。今天早上，省委看到陆续有学生和群众来声援，门前的人越聚越多，只好让一个叫李康的干部出来答复学生和群众，他的回答却是让工业学院的130多名学生通过学习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解决。

外地来串联的学生们非常气愤，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李康辩不过学生，灰溜溜地走了，不管学生和群众怎么呼喊，再也没人出来答复。学生们经过商议，向省委发出最后通牒，警告省委领导，若不答复他们的六条要求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省委领导一直置之不理，于是学生们宣布从8点开始静坐绝食斗争，直到答应要求解决问题为止。

这个消息传开后，我们西工大和西交大、冶院、陕西工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西北大学临时革命委员会、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等200多所大专院校（其中包括外地160个）立即响应，陆续赶来支援他们，和他们一起参加静坐绝食斗争，人数达到5万多，坐满了省委门前的整条建国路。

天气非常炎热，我们坐在马路上确实不好受。想到130多个阶级弟兄已经3天没吃饭了，勇气就上来了。我们共同朗诵毛主席语录：“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受，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同时，还高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等，气氛活跃，慷慨激昂。

为了把我们为什么要静坐绝食的事实真相广播出去，让西安市的广大群众同情支持我们，临时成立的组织者要求使用省委的广播站，但省委的人说什么也不给用，把大门关了起来。后来，红卫兵采革命取行动，夺取了广播站，但播音设备已被破坏，经过很长时间修理才能用。于是，高音喇叭开始播出静坐绝食斗争的真相和鼓舞斗志的革命歌曲。

下午，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被学生们拉了出来。他在马路上转了一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回去后，仍不答复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推说他已经答复过了。后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的红卫兵带上章泽一起乘火车去北京告状。这就是后来有人造谣说的，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的红卫兵绑架了章泽。

晚上，儿童剧院的刘金萍、赵国芬、孟庆侠、高金铭等二十多人来支援我们。我们班和他们共过事的同学都很兴奋，热情地让他们和我们围坐在一起，快活地谈论着在一起搞社教的事。看着满天的星斗，想起“红军想念毛泽东”这首革命歌曲，因为他们都能歌善舞，便请他们带领我们共同唱这首歌。他们也毫不客气地唱起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毛泽东。困难时想您有力量，迷路时想您心里明，心里明……”歌声感染了周围的学生，纷纷跟着唱起来，有的同学唱着唱着禁不住淌下了泪水，气氛热烈而悲

壮。就这样，我们不是唱歌就是交谈，实在瞌睡了，就趴在膝盖上迷糊一会儿，终于熬过了漫长的黑夜，迎来了东方红。

第二天仍然很炎热，热辣辣的太阳如火上浇油，我们个个饥渴难耐。一些身体虚弱的同学开始晕倒，晕倒的人越来越多，几个担架不停地往外抬人，估计抬出去几百人。为了保存体力，我们不再唱歌和谈话，默默地抱膝而坐打瞌睡。午后，附近街道上一些好心的老大娘同情我们，可能知道我们是在绝食，提着一桶桶咸开水带着碗来给我们喝，同学们无不感激涕零，连声道谢。

下午六点左右，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的红卫兵把省委书记霍士廉拉到门口和他辩论。这时，天下小雨了，学生们依然斗志昂扬，秩序井然地坐在马路上静候省委答复。最后，霍士廉基本答应了学生们的六条要求。我们的绝食斗争胜利了，大家纷纷站起来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但是，在我们撤出时，周围有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道路两边围攻我们。我们学校的队伍走到建国路口时，那些群众把路堵得只有 50 公分左右宽，他们向我们挥舞着拳头高呼什么“反对绝食！”“绝食有罪！饿死活该！”拳头几乎兑到脸上，队伍被挤得稀稀拉拉的，同学们气得一边跑着紧跟队伍一边高呼“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好不容易回到学校。

我们学校是一个战斗集体，当我们经过校门口时，留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尤其是一些老人和小孩站在门口热烈欢迎我们的胜利归来。饭堂的师傅们有经验，人饿得很时，如果吃硬实饭就会伤胃，他们专门给我们做了好多可口的杂烩汤。我们的心情无比温暖和激动，好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没想到，省委书记霍士廉看参加静坐绝食的各大院校学生和群众撤离得差不多了，就否认答应了学生的六条要求走了。还未撤离的学生非常气愤，到省委接待室继续绝食。由于多日未进饮食，不时有学生晕倒被省委机关的人抬走抢救。后来，只剩下 24 个学生，他们意识到这是省委的阴谋，再有昏倒的学生也坚决不让他们抬走。他们表示，我们这 24 人就是死也要一起死在这里，除非立即答应六条要求。第二天上午，我们学校得知这一情况后，又有许多同学到省委去支持那 24 名学生的绝食斗争。

西安市的斗争态势也逆转了，大街上谣言四起，满城风雨。许多人把我们的绝食斗争污蔑得一塌糊涂，说什么“参加绝食斗争的大多数是黑七类”、“他们是假绝食，口袋里装有馍”、“有人到厕所里偷偷吃馍”、“他们绑架了霍士廉和章泽”等等，无奇不有。我们学校也分裂出一部分反对派和社会上的保皇派遥相呼应。因为我们学校目前的组织叫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分裂出的反对派就要成立西北工业大学临时革命委员会。边家村的另外两个大学也分别成立有保皇派组织，即西电筹委会和西大临委会。上午 9 点，他们带着宣传车，从我们学校东门进入学校灯光球场，车上的高音喇叭播送着“热烈祝贺西工大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向西工大临时革命委员会学习！”“向西工大临时革命委员致敬！”等口号。

听到宣传车的口号声，同学们都很愕然，没想到我们学校也分裂出反对派了，纷纷到灯光球场看个究竟。我赶到时，西电筹委会和西大临委会的学生刚进入会场。去了不少红卫兵，只见他们正在封锁球场的四个门，然后冲进会场检查那些出头露面要成立临委会同学的出身。后来，他们查出 15 个是“黑七类”（指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子弟，大部分是女同学。他们一个个被红卫兵押出门外，接着红卫兵用理发推子把他们的头发从中间一推，就成为一分为二发型的牛鬼蛇神头，然后他们被拉到门口的台阶上示众。西电筹委会和西大临委会的宣传车看到这个场景，立刻傻眼了，不敢再支持他们，马上改变口气广播道：“我们是来宣传十六条的，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要文斗、不要武斗！”那 15 位同学个个被红卫兵扭着胳膊，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狼狈不堪。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又把北边的大操场布置成辩论会会场，“邀请”西大临委会和西电筹委会来的学生到那里辩论，但被他们拒绝了。他们要走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有意羞辱他们，把那 15 个“黑七类”学生戴上高帽子拉到校门口，站在汽车上“欢送”他们离校，并高呼“欢迎再来！欢迎再来！”他们灰溜溜地很快撤走了。

9月9日下午，到省委支持24位学生绝食的同学回来了。他们说，毛主席非常关心他们的生命安全，一夜没有睡觉守候在电话机旁等消息，周总理已经派飞机把他们接到了北京，要亲自接见他们。我们听到后非常激动，不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但刘兰涛和霍士廉吓坏了，马上发出三条规定的通知，反复在全市广播。据从市里回来的同学说，刘兰涛、霍士廉和章泽坐在宣传车里用高音喇叭在市里转着高喊“绝食是革命行动！”。

附：周恩来总理给二十四位同学的电话

“我整整一夜等待着你们。”

“我一直坐在办公桌前。”

“你们可以问刘澜涛同志。”

“你们有什么要求，打电话，我可以命令，让所有军事电话停止……”

“你们这是革命的行动。”

“你们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要吃饭，在毛泽东主义的新中国，怎么能够绝食呢？结果是怎么样？它的后果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后果。”

“我不是责怪你们，我是劝导你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如果倒下一个同学，影响多么不好。”

“我给刘澜涛同志打电话，让工农群众不要围攻你们，要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做大量的解说工作。”

“你们有权提出罢郭××的官，但现在我情况不了解，我一个人不能回答。我要打电话给刘澜涛同志，要和党中央商量，你们要给我时间…”

“我们干革命要把自己的命保住，除非是刀架在脖子上，象刘胡兰那样。在新中国怎么能不吃饭？毛主席才刚刚睡下，我不能再惊动他了。”

“现在全国每天都发生许多事要解决…我们那些人怎么能支得开呢？赶快治病。你们不吃饭，我怎么能安心啊！我怎么能把电话挂断。”

“你们少数人要到北京来，可派飞机把你们接来。”

## （五）：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

当晚，我们学校到街上张贴许多标语，其中有“保皇、保皇、再保皇，破产、破产、再破产，直至自身难保”。街上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替省委说话的保皇派很少了，没人敢公开说“绝食有罪！饿死活该！”和那些污蔑我们的谣言了。

我和我们班同学张宝宇在街上张贴标语时，看到一份大字报，名曰“绝食病历”，内容是讽刺、挖苦参加绝食的学生和群众的，落款是西医二院（即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我们俩看后非常气愤，就把落款抄下来，准备找写大字报的人辩论，问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写的？是何居心？

第二天下午，我们班其他同学到西北大学参加筹委会成立大会，我和张宝宇来到西医二院。该院有两个组织，一个是临委会，一个是筹委会。临委会是造反派，我们就找到临委会办公室。办公室有几个同志正在忙碌着写大字报，一听说我们是西工大学生非常热情。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们说写“绝食病历”大字报的那个人叫陈澄。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他是地主兼资本家出身，表现也不好，可能挨过批，仇恨造反派。他贴出大字报后自知惹了祸心虚，筹委会又怕招惹麻烦已经让他跑了。后来，他们把学院的党委书记苏永年叫来跟我们谈话。他非常害怕，不敢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说什么“属于外调的问题，你们拿党中央统一的介绍信来，属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你们问筹委会”，还一再强调“我只对这两句话负责”。

临走时，我们把随身带的一些大字报送给学院。由于该学院的保皇派势力大，当我俩贴大字报时，看的人都非常惊讶。一个学生还给我俩念了一份传单，什么“相信西北局，相信陕西省委”“刘兰涛、霍士廉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等。他看我们俩在偷偷地笑，便知趣地不再念了。

9月11日上午，我和张宝宇又来到西安铁路局找一些工人座谈，想了解一下工人们对学生的看法和态度。通过交谈，我们了解到，目前工人中和我们观点一致的人不少，反对的人很少，但不明真相采取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少。其中一个工人拿出许多传单，我发现其中有一张是省女子中学揭发省委和陕西日报社问题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省、市领导的子女，是有名的保爸、保妈学校，怎么会有这样的传单呢？我拿过来仔细一看，确实是省女子中学的，是从省女子中学分化出来的一个“星星之火造反派”印发的。从这份大字报中可以看出，省委为使省女子中学为他们作反宣传，竟然采用登报表扬、请他们吃饭等卑劣手段。我们认为，如果情况属实，这就是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又一罪证。临走时，我们向这个工人要了一份这样的传单，准备调查落实一下。

第二天上午，天下着小雨，我急于落实省女子中学传单中的问题，就叫上同宿舍的黄炳球去省女子中学调查。到了一打听，才知道“星星之火”造反派只有3个人，之前有两人家庭出身不好退出了。但还有一个造反派有4个人，她们不敢在校内活动，只在校外活动。据她们讲，8月19日她们在火车站做反对西交大革命行动的宣传时，市委接待站一个干部用车把她们接到饭店吃饭，并说“这是党对你们的关怀”。她们自己印不了那么多反对西交大、西工大和冶院的传单，市委就让印刷厂帮助印。

碰巧的是，这天下午女子中学请我校反对派临委会的申中梅同学给她们作报告。我和黄炳球到会场听了听，许多内容是污蔑、歪曲我们学校革命大方向的，极具煽动性，会场上的学生不断高呼“声讨西工大的反革命罪行”的口号。当我们离开会场时，一群女孩借口我们没有一起呼口号围攻我们，我们和她们辩论，她们根本不听我们的话，一个劲乱吵乱闹。我们觉得和她们一直纠缠下去毫无意义，就甩开她们的纠缠冒雨回校了。

回学校后，才知道市体育场在开“炮打司令部”大会，大部分同学到市里参加大会去了。没想到省委乘虚而入，开着宣传车来我校进行反宣传。当在校师生揭穿他们的丑恶嘴脸时，他们想溜走，同学们围上去不让他们走，要和他们辩论。他们急了，开着车硬冲，几乎轧着人。同学们非常气愤，把他们的宣传车扣下

了。



图 2 西安市革命造反派“炮打司令部”大会

9月15日出现了一个可笑的事，西交大、西工大等400多个院校和单位在陕师大（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斗争大会，斗争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锡奎。那些保皇派学校为了证明他们并不保皇，也匆忙在体育场召开了一个所谓斗争原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大会。赵守一是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被陕西省委定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黑线的所谓“西北三家村”（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黑帮之一，早被打倒斗臭了。而且赵守一又不在场，只是声讨一下而已，我校的临委会也参加了。我们学校讥笑他们是在打死老虎、装怯作勇。

省委、西北局决定9月17日召开“西安市炮打司令部”大会，我们造反派为了争得主动权，立即决定16日下午5点先召开“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参加大会的有560多个单位，47000多人。会上，同志们揭发了省委和西北局阻挠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迫害革命造反派的大量丑行。有几个同学声泪俱下地控诉了打击、迫害他们的暴行，还有几个工人和农民揭发了省委是如何蒙蔽欺骗他们到大街上围攻、殴打学生的。会场上的人们不时高呼“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回校时，已经半夜一点了，学校又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毛主席和千万红卫兵在一起》，同学们仍然兴致勃勃地看完后才意犹未尽地休息。

17日早上，周总理派飞机把继续坚持绝食的24位学生送回西安，让他们参加省委召开的“炮打司令部”大会。他们中有我校的一位同学叫柳安，据他讲，周总理三次接见他们，与他们长谈，安排他们见到了毛主席。他们已经把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报告给了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革命造反派非常关心和支持。这就更坚定了西安革命造反派的决心和信心。

省委召开的“炮打司令部”大会实际上是在做样子，故意转移目标，把文化大革命引向歧途。主持大会的人和安排的大会发言人没有我们造反派的人。省委书记霍士廉首先发言做检查，他在讲话中说：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陕西省委在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代表陕西省委向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作检讨，向大家请罪。



……省委所犯的错误中，最严重的是把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师生六月六日的革命行动，错误地判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以后又在革命师生中进行‘查上当，放包袱’，错整错斗了一批革命同学。这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受打击、受迫害的是革命同学，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姐妹。我们想到这个错误，就感到十分痛心！我们一定永远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在这里，我代表陕西省委再一次向在所谓‘六·六事件’中受到打击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向大家请罪。

……尤其严重的是，我们没有及时地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炮打混入省委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坚决地引火烧身，号召大家揭露省委领导工作上的错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使运动又受到阻碍。

……有些十分重大的问题，处理得很不及时，特别是静坐绝食事件发生后，我们积极主动地和革命同学共同商量处理的不够，拖延了时间，直到周总理直接出面才得到解决，使许多革命同学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折磨和摧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陕西省委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这些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霍士廉只是笼统地给自己扣了许多不痛不痒的空帽子，根本没有检查自己如何对抗党中央毛主席，镇压、批斗和迫害革命群众尤其是起来造他们反的革命师生的。在其他人的发言中，虽然都慷慨激昂地说什么要发扬“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却一直在炮打死老虎，一直在早被揪出的胡锡奎、赵守一上大做文章，不敢真正地“炮打司令部”，揭发批判省委和西北局的问题。大专院校的革命造反派看不下去了，跑到舞台上和大会主持人辩论，揭露省委的阴谋诡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斗争，终于夺得了大会的主持权，打破了他们的计划，让大会以揭发批判省委、西北局的问题为主，真正成为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大会。每个造反派代表的发言都击中了省委、西北局某些领导人的要害，特别是刘兰涛和霍士廉，他们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狼狈不堪。

9月18日上午，西安市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分化出来的造反派冲破层层阻力联合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总部。他们在成立大会的宣言中说：“我们是为了炮打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而走到一起来的。”市委书记彭天出席了会议。他们认为，彭天是谣言的制造者、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煽动者，把他赶下了主席台。接着，在学生们的“打倒镇压学生运动的侏子手彭天”的口号声中，他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在省委和西北局的策划下，西安市的保守派们也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成立所谓的“西安市红卫兵司令部”，斗争矛头对准革命造反派。这充分暴露了省委和西北局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卑劣伎俩。

9月19日晚，造反派中有人发现17日的《陕西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竟然出现了“我们永远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好教师”的语句。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各大专院校，广大师生无不为他们屡犯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原则性错误而愤怒，是可忍孰不可忍。各大专院校迅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特意从陕西日报社门前路过，不断高呼“强烈抗议陕西日报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侮辱！”“坚决揪出侮辱毛主席的黑帮分子！”“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陕西日报社自知闯了大祸，罪不可恕，紧闭大门，没有人敢出来为自己辩护。

第二天上午，我们学校推选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反对派“临委会”为使他们的组织成为唯一领导学校文化革命的机构，倾巢出动，百般阻挠，想阻止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但是，他们毕竟人少，闹腾半天也无济于事。下午，西安市的造反派和西北局、陕西省委针锋相对，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成立“西安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有190多个单位的红卫兵参加。我校也组织红卫兵参加了，回到学校时，广播站播出一个“紧急号外”，内容如下：



## 紧急号外

经过几万革命群众长期的艰苦斗争，通过 9 月 21 日 14 点零 7 分到 22 日凌晨 5 点 35 分与刘兰涛、肖纯的辩论斗争，迫使西北局、陕西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令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侏子手——西安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郭韞停职反省，已请示党中央，周总理立即同意。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充分证明了，革命的真理在我们革命群众手里。我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西安工业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队 1966 年 9 月 22 日

## （六）：赴京学习搞革命

九月，是西安革命造反派不断发展壮大、保守派不断分化瓦解的时期。至九月下旬，西安市的造反派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各大专院校绝大部分是造反派，各中等学校、工矿企业和其他行业的造反派也由少数派逐渐发展为多数派。但在市郊农村，由于消息闭塞，很少有造反派组织，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学生的革命造反行为不理解，仍然相信省委的领导是正确的，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学生们造反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行为，是牛鬼蛇神闹事。

9月25日，我校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乡帮助农民秋收，时间3天。我们系分到长安县杜曲公社东风大队，学校只派两辆解放牌卡车送我们。由于车少人多，我们把行李装在车上，然后空手步行。吃过早饭后，我们就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天气晴好，秋高气爽，一路上，我们不时高唱着革命歌曲，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路边田野的各种秋庄稼，并互相议论着。进入长安县，有的同学累得跟不上，有的同学热得把外衣脱下来抱在怀中，队伍变得稀稀拉拉。到目的地时，已经12点多了，许多同学疲惫不堪，也不顾地上干净与否，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等候分配住处。

我们满以为社员们会欢迎我们，没想到热脸碰上冷屁股，竟然没有人理睬我们，只有一些小孩站在附近痴痴地傻望着我们。大队和小队干部没一个人来和我们接头，一直把我们晾在那里。同学们议论开了：“肯定是省委搞的鬼，他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了，谁敢接近我们啊。”“人家不欢迎，我们就不应该来，真是自找没趣。”有的同学嬉笑道：“牛鬼蛇神下乡来，吓得老百姓躲起来。”……

等了好一会没有人理我们，系领导只好无奈地把各班分到生产队，让先遣队员领往各自住处。我们班分到第六生产队，从汽车上找着背包，我们跟着先遣队员来到北边山坡下的一个破窑洞。窑洞的门破烂不堪，四周的墙壁黑乎乎的，地上堆着一堆麦秸，大概是让我们铺。我们又饥又渴，也不管这些，立即把麦秸铺开，把背包往铺上一扔就坐下来掏出自带的凉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刚吃几口，门口跑来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喊道：“敲钟啦！上工啦！”我们仔细一听，不远处果然有“当、当、当”的敲钟声。我们大老远来帮他们干活，他们连理都不理，却叫小孩催我们下地干活，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赶快把一个馍吃完就和张云忠一块到山坡下找生产队长，准备和他商量一下怎么安排。我们下到村里转着找了好一会儿才在场里找到他，他冷冰冰地给我们找了些镰刀，领着我们来到一大块稻田地，交待我们割这块地的稻子就忙去了。

我们觉得，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可能是听信了省委的宣传，把我们当成下乡劳动改造的反革命了。每天，他们给我们安排的劳动量很大，催得又紧，总是干到天黑才收工，几乎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许多同学手上磨出了血泡、腰疼得叫苦不迭。幸亏时间短，29日上午，我们终于结束这劳改犯般的劳动，和来时的兴致相反，满腹牢骚地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懒懒散散地回到学校。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西安市要组织全市游行，午饭刚吃过，学校就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到操场集合训练。我们都已加入红卫兵，到操场集合后，先分配任务。我和张云忠被分到全市的仪仗队，任务是抬“农业学大寨”的巨幅标语。分配完，我们先徒手训练起步走和正步走，因为入学时搞过军训，所以训练了两个多钟头就基本上整齐化一了，最后又抬着巨幅标语训练了一个多钟头。

晚饭后，仪仗队又集合开到新城广场，和全市3000人的仪仗队在一起试演。仪仗队的人都是我们造反派的，光我们学校就有540人。因为大家没有什么矛盾、心齐，试演时互相配合比较好，效果基本可以。之后，又训练了两天，虽然很疲劳，但大家都为能参加仪仗队自豪，心里很兴奋。

10月1日早上四点钟，我们参加仪仗队的同学就起床吃饭，然后集合奔赴市人民大厦前，游行需要的巨幅标语牌已经全部运到那里。等待中，我看到好几个外国人，其中有一个肤色红白、身材高大、满脸胡须的

外国人，带着照相机和录音机，正在拍照一幅“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和人民大厦的铁栅栏。铁栅栏里有许多人向外看他，当铁栅门一开，他不拍照了，笑了笑向西走去。我猜，他可能是美国人，没安什么好心，是为制造分裂、造谣污蔑我们而专门拍“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和人们在铁栅栏里的镜头的。

我们一直等到 10 点，庆祝大会开始了。市委书记徐步讲了大约 10 分钟的话便开始游行。仪仗队前面是打着红旗的方块队，接着是我们抬着巨幅标语的方块队，第一幅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然后依次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等。走到新城广场后，稍停一下，再踏着“解放军进行曲”通过主席台，把标语牌抬到另外一条街道上就回校了。

我们学校去北京的时间确定在 10 月 4 日，在北京要呆半个月，大家都高兴地做着准备工作。学校让同学们讨论给毛主席带什么礼品好，同学们的意见五花八门。最后，学校采纳大多数意见，决定给毛主席送一面大锦旗，上面绣金黄色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八个大字，由我校的红卫兵亲自写、亲自绣。

10 月 4 日，我们学校开始分批乘火车去北京。10 月 5 日上午，我们系乘坐 11:05 的火车离开西安。一路上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不时唱起《北京有个金太阳》《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革命歌曲，晚上 9 点多到郑州。

国庆前夕，我先后收到家里和叔伯大哥的两封信。他们听说我参加了绝食斗争非常吃惊，劝我不要再参加类似活动，认为那样会影响我的前途，让我赶快给他们回信详细说明情况。大哥比我大一岁，1964 年考入河南农学院园林系。他和我的观点不一致，他劝我不能造党和政府的反，那是反革命行为。他认为，只要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和政府，不会有好结果的；说我肯定是受蒙蔽了，赶快醒悟，以免铸成大错。他还埋怨人家骂他是保皇派了等等，洋洋洒洒写了七八页纸。我立即给他们回信，劝家里人不用担心，我自己心里有数，知道该怎么做；又给大哥讲了很多道理，让他紧跟党中央毛主席，不要和造反派作对充当保皇派等等。为了省四分钱邮资费，我先寄走了给家里的回信，给大哥的信贴邮票，准备去北京路过郑州时再寄。

火车只在郑州停 16 分钟。我怕时间不够用，就托付一个在郑州下车的旅客，帮我把信带去投到市里的邮筒里。快过黄河时，同学们都挤到窗前，争相一睹黄河的风采，但是天黑看不清，很快就过去了。黄河过去之后，窗外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了，大家兴致渐减，有人开始打盹，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我却一直很兴奋，脑子里乱七八糟地考虑着到北京的事。”

北京有我高中同班同学 7 个，我很想见见他们，尤其想见和我最要好的邵俊峰。他在北京林学院，在家排行老四，同学们都称他邵四。他是我入团时的介绍人之一，对我帮助很大。还有考入天津大学的李宗林、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乔定国（外号乔五），我们四人非常要好，亲如兄弟。毕业前夕，我们四人专门照了合影照。上大学时，我们本来约好一起走，结果七差八差，也没见面，我一直思念着他们。我迷迷糊糊地胡思乱想了一夜，天快亮时，火车进入北京市区。同学们一个个醒来，车厢里又恢复了热闹景象。

9 点多钟，火车到达北京市永定门车站，市委接待站的同志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北京航空学院的体育馆里，吃住都不要钱。接待站的大客车拉着我们到学院内时，已近中午，只看到路两边尽是大字报，人潮涌动。我们都饥肠辘辘，安顿好后就去食堂吃饭。饭后自由活动，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去校园里看大字报、熟悉环境。

我们来北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了解这里是如何搞文化革命的。第二天，我坐公共汽车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一进北大校园，路两旁同样全是大字报，看的人很多。北大的师生们对以聂元梓为领导的革委会有不同看法，形成两大派，并因看法不同成立许多战斗队，互相贴大字报批判对方，还有许多揭发批判中央某

些领导的大字报。吃午饭时，我碰到我们班同学蒋宜昌。下午，我们俩一起来到清华大学，这里正在针对“8.24”血洗清华园事件和王光美问题开辩论会，他们要求王光美在9日以前来清华作检讨。

原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清华园中的大学生纷纷将大字报的矛头指向以刘少奇为首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司令部。那些高干子女们一直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没想到搞来搞去搞到自己老子头上了，怎肯善罢甘休。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生、高干子弟刘菊芬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引领清华附中等12所中学的几千名中学生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分头进入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二校门。他们先推倒标志性的建筑二校门，然后占领广播台，用高音喇叭向全校反复播放：“你们不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那就给你们一身剐！”同时反复播放“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他们又把大字报区戒严，撕光所有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搜捕写大字报的学生、干部、教师，甚至逐家挨户搜查“打扫战场”。躲在家中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也不能幸免于难。身着退色军装、手提军用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把搜查出的人赶到学校“生物馆”殴打折磨；有的押到二校门的废墟旁用铜头皮带殴打后再关押起来。校园内一片杀气腾腾、白色恐怖、惨不忍睹。这就是轰动北京的清华大学“8.24”事件，据说著名作家老舍就是在这次事件中因受不了残酷的折磨和殴打而投湖自尽的。

## （七）：北京见闻

10月8日，我准备到北京林学院找高中同班同学邵俊峰和王田民。早上5点多，我就起来去乘车，但迷迷糊糊坐错了车，一直到新安里才发现，又赶紧下车又转车到清华大学门前，再乘5路车到林学院。我找到邵俊峰的宿舍一问，他到体育场开会去了，下午4点回来。下午4点，我再去找他还没有回来，只好给他留言明天再来找他。打开留言簿一看，原来我校八系的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璩金生也来找过他，也是没有找到留言说去北京石油学院找李聚泉同学了。我从留言中得知他们八系住在北京工业学院，便决定晚上去找他。

我从林学院出来，乘车又到北京农业大学找高中同班同学田文来，仍然没找到，同宿舍的同学说他到广州串连去了。我奔跑一天，一个同学也没找到，扫兴而归。

晚饭后，我乘车来到北京工业学院，总算找到了璩金生。他幸运得很，昨天下午他到北京农业大学找到了田文来，今天不仅找到了北京石油学院的李聚泉、李太安，还碰到从我们南召一中来北京上访的女同学罗鸣欣。他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他们的情况。我和他约好明天到北京林学院找邵俊峰后，就乘车回北京航空学院了。

第二天，我和璩金生先后来到林学院，没想到很幸运，遇到7个高中同班同学，除林学院的邵俊峰、王田民外，还有石油学院的李聚泉、李太安，西安交通大学的谷玉海和西安公路学院的毛振宇。王田民一直是造反派，邵俊峰原来参加了保守派组织，后来觉悟过来，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现在，我们都是造反派，观点基本一致，谈得非常投机，不知不觉谈了一天，仍然意犹未尽。分别前夕，本来想照合影像的，因为时间晚了光线不行，就约定明天一起到天安门广场集中拍合影。吃完晚饭，邵俊峰和王田民把我们送出校门就互相道别回各自学校了。

北京有三个司令部，都是各大学的联合组织。第一司令部是中间派，也是动摇派；第二司令部是保守派；第三司令部是造反派。北京工业大学革委会主任谭立夫的讲话一度被第二司令部吹捧上了天，特别是林学院的红卫兵大量印发，还加上编者按，说什么“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

谭立夫是北京工业大学学生，7月29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一副“鬼见愁”对联，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谭立夫立即贴出一份《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称赞这幅对联“好得很”，甚至把党的“重在表现”政策说成是“修正主义”。他在北京工业大学召开的大辩论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系统的“血统论”论点，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家庭成分就决定了个人的立场和表现等。他的讲话一炮走红，立即得到北京中学生红卫兵与保守派们的极力吹捧，甚至传遍大江南北，声名超过了聂元梓。各地红卫兵组织都把他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作为组织路线，只许“红五类”（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加入红卫兵，并把斗争矛头指向“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大搞“打、砸、抢、抓、抄”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行为。但是，他们却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对造他们当权派老子反的造反派，极力反对和破坏，最典型的就是“8.24”血洗清华园事件。

下午，第二司令部在北京体育场召开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实际上是一个假批判真包庇、形“左”实右的会议。大会主席团不让西安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发言，却让西安的保守派红卫兵司令部代表发言。当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坚决要求发言时，大会主席团不答应。在我们学校和西交大等西北地区的革命师生齐呼口号的支援下，大会主席团不得不让红旗战斗队的代表发言。他发完言后，西安的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代表争相要求发言，会场一下混乱起来。大会主席团无法制止，干脆都不让发言了，改为播放“周恩来、江青在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我听了半截就走了，此时，已经是深夜一点了。

我走出北京体育场时，因为没有看清站牌又上错了车，一直到天安门时才明白过来，立即下车，但已经没有到北京航空学院的公共汽车了。和我一起的还有许多学生，没办法，我们就一起到北京市委找他们解决。市委的一个接待员倒很热情，他给我们找一个房间住下。

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太阳已上老高。我赶快起来到饭堂草草吃完饭后就来到天安门广场。这里已经有很多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在参观和照相，熙熙攘攘、三五成群。我四下游走、东张西望，没有看到高中同学的影子。于是先照了一个单身相，然后在天安门城楼前面等他们。没多大一会，璩金生、谷玉海、邵俊峰、李聚泉、李太安、王田民、毛振宇和罗鸣欣 7 人都陆续赶到。当我们准备照合影相时，却意外地碰到青海兽医学院的魏厚纯和空军技术学院的陈留定。他们俩原来都是我们班的同学，二年级时，魏厚纯转学到青海他父亲那；陈留定原来是我们甲班的，重新划分班级时到丙班了。遗憾的是西安石油学院的尹笃春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李丰有没来，不然我们班在西安的都来齐了。听罗鸣欣说，昨天她在体育场参加大会，散会时无意中见到了李丰有，就冲他叫喊。李丰有看到她时非常激动，慌忙下台阶找她，谁知一脚蹬空，倒下时本能地用手一撑，没想到手腕竟然骨折。我们这十一个同学久别重逢格外高兴，都觉得太巧了，一起在天安门前合了影。之后，我们边走边谈来到北海公园游览。



图 3 前排左起王田民、李太安、邵俊峰、田玉振、魏厚淳；  
后排左起罗鸣欣、王玉申、谷玉海、璩金生、陈留定、毛振宇

罗鸣欣告诉我们，我们南召一中的文化革命形势很糟，革命造反派被打成了“反革命”“牛鬼蛇神”，经常遭到保守派的围攻和殴打，他们要写大字报学校不给纸，上山拾柴卖钱买纸，县领导却发通知不让群众买他们的柴，否则以勾结、支持“反革命”论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刘福明老师一直被关押着，经常挨批斗，甚至戴高帽子游街、游乡示众，他偷跑几次没有跑掉，抓回去就是一顿痛打。罗鸣欣是偷偷跑出来的，很幸运没有被发现，她绕道北大山的回龙沟后先到了郑州，郑州的造反派比她们的遭遇更惨，只好又从郑州来北京上访告状。

我们都很为罗鸣欣惋惜。她是我们班的班花、学习尖子，一直担任学习委员。高考前夕，她在校园的花果山上捏块小石头在地上默写俄语单词时，从院墙外扔来一块石头，不偏不斜砸到她的食指上，石头对石头把食指砸破，红肿得很难捏笔。她仍然坚持翘起食指写字，论她的才华，完全可以考上一所重点大学。但可惜的是，我们一起到南阳参加高考时，只参加了一场她就退出了考试。原因是学校领导找她做工作，想让她留下第二年再考，那样更有把握考上清华大学，她也就同意了。想不到，第二年快高考时遇到了文化

革命，高考暂停，她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苗子受到学生们的批判。为此，她一直后悔不迭。

我们听了她的介绍，都很关心家乡和母校的文化大革命，更担心造反派的命运。有人提议在外的同学们联合起来回母校串连，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大家都很拥护，准备回校后就想办法打回母校。

11日这天，我专门在北京航空学院看一天大字报。北航红旗战斗队写的大字报很多，也很有理论水平，如“论两条路线的斗争”、“目前形势的十二点看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种种表现”、“《怀疑一切》是革命的斗争口号吗？”、“论红卫兵、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突变乎？不变乎？”等等。据说，红旗战斗队的头头叫韩爱晶，很受中央领导的青睐。中央领导经常召见他，称赞他们的战斗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得心应手的铁拳头。因此，他们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很了解，形势跟得很紧。可以说，他们的大字报体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

国家军事博物馆记载着我党我军辉煌的发展史，是我早就想去参观的地方。12日早上，我很早起来，专门到天安门广场参观军事博物馆。展览馆很大，展出的东西很多，内容非常丰富，我从头挨着一气看了七个馆。午时已过，腹内饥肠辘辘，为了节省时间，我到馆外花两毛钱买一个大面包，狼吞虎咽地吃完后又进入展览馆内继续参观。看到下午两点多钟时，感到累了，而且再这样看下去，回住地就来不及了，只好走马观花地把剩下地看完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13日，我又在北航看了一天的红旗战斗队大字报。晚上，学校给我们传达西安的文化革命形势。10月11日下午，西安的革命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从下午5点一直开到晚上12点，会议开得非常成功。许多工人、农民纷纷争先恐后地发言，揭发“8.14”“8.15”“8.16”流血事件的主谋和策划者，讲得非常生动，发言的学生不得不停下来让他们发言。

随后，学校又告诉我们，明天下午，我们在京的革命造反派也要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陕西省委、西北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学校还告诉我们，12日下午，西安的保守派也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他们打击、围攻革命造反派，执行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贼喊捉贼，把参会的工人、农民激怒了，纷纷起来谴责他们，把大会主持人赶下台，会议中途夭折。

14日忽然变天了，阴沉沉地还刮着西北风，气温骤然下降。下午，在京的西安革命造反派按计划在北京体育场召开了“彻底批判陕西省委、西北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红卫兵提前乘车到体育场门口担任纠察任务。我穿的衣服不多，冷得缩着头站在门口维持秩序。参会人员正在入场时，忽然来一伙西安的保皇派，他们不进会场却堵在门口企图阻挠参会人员入场。我们手挽手组成几道人墙，把他们挡在后面。参会人员入场完毕后，西北大学临委会的一帮保皇派骨干又企图进会场捣乱。我们立即进入会场，把铁门关了起来。他们进不来，在门口高呼了一阵抗议口号后灰溜溜地走了。

天气虽然很冷，但参加会议的革命师生热情很高。会场上秩序井然、斗志昂扬，“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批判大会开得很成功。会议快结束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张春桥及成员戚本禹、姚文元和穆欣到会祝贺。张春桥还发表讲话，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批判陕西省委、西北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讲话时，与会人员不时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要见毛主席！”。张春桥表示，一定把同学们的心情转告给毛主席。

这天下午，西军电临委会的一千多保守派师生和西安的其他保守派们也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头两个人发言时，污蔑我们造反派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西军电筹委会的造反派学生立即要求发言批驳他们，他们死活不让筹委会的学生发言。筹委会的学生们便起来造他们的反，抢占了主席台和广播等。双方互相争斗，闹得不可开交，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11点。党中央和周总理知道了，立即派吴德来处理。他可能也不好表态支持谁，便建议这个会不要再开了，两派组织只好散会。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西安的文化革命形势正在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发展，大部分工人、农民和各行各业的群众已经站到造反派一边了，保守派已经没有活动市场了。



## （八）：见到毛主席

15日这天，天气晴好。下午，我到林学院找高中同学郇俊峰，想和他好好谈谈心。可惜找到他，却没有好好谈，因为北京钢铁学院的高中同学张同洁也来找他了。我们三人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一起走出学校在大街上逛了一下午。张同洁说，我们南召一中母校又来了十几个同学，和罗鸣欣在一起，都住在六一小学。临分别时，我们约定明天一起去看望他们。

说起张同洁，他也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子，文章尤其写得好，人长得又帅，和罗鸣欣简直是一对金童玉女。高中一年级时，张同杰就开始公开追罗鸣欣了，经常在日记里表达爱慕之情，把日记给罗鸣欣看。他的痴情打动了少女的芳心，罗鸣欣虽然没有公开表示接受他，但也没有公开拒绝。张同杰的老爸是北京某部门的干部，原来一直不同意他们谈恋爱，但他家出身是地主，罗鸣欣家是贫农，思想进步学习又好，在张同杰的一再劝说下，他爸也就默许了。张同杰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后，两人仍然热情依旧，来往书信不断。没想到赶上文化大革命高考停止，罗鸣欣上清华大学的梦想破灭，给他们俩的爱情蒙上了一层阴影，张同杰他爸又不同意了。但是，张同杰仍然痴情不改，待罗鸣欣依然如初。

第二天下午，我随张同杰来到六一小学，郇俊峰、李聚泉、尹笃春、谷玉海、王玉申也来了。罗鸣欣和从南召一中来的十几个学生和教师见到我们异常高兴。他们也是受不了保守派的打击迫害，冲破层层封锁绕道回龙沟来北京上访告状的。我们交谈了一下午，对他们非常同情，鼓励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继续战斗，曙光就在眼前。晚上，我们陪同他们一起来到国务院接待站。这里上访告状的人很多，一直等到12点多才轮到他们。但他们谈得很不好，抓不住重点，几个人七嘴八舌啰里啰嗦。我坐在一旁的地板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他们一直到深夜两点多才结束。

我们在国务院接待站一直呆到天亮。早饭后，我们7个同学邀罗鸣欣到天安门广场照合影相。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又碰到了考入郑州大学的同班同学王定献。他原来在学校是支持校文革和工作组反对党言川的保守派，后来两次来北京串联学习，观点慢慢改变，准备回去后退出“校文革”加入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我们九个同学的观点基本一致，互相交谈融洽了许多。

在天安门广场照相时我们吃惊地发现，这里到处贴满了北航红旗战斗队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大标语。特别是广场南面正对着天安门城楼的地方，放着一副非常醒目的巨幅标语“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纷纷猜想，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又有什么新举措了。

果然不出所料，10月18日，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就要接见我们了。我们天天盼、夜夜想，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无不激动万分。当日下午，我们这些住在北航的来京师生在大操场集中，准备接见时的编队。据北航学生说，党中央内部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以毛主席为首的少数派与以刘少奇为首的多数派正在进行激烈斗争。昨天晚上，周总理把北航红旗战斗队的负责人韩爱晶叫到国务院谈话，让他们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地方张贴大标语，大造舆论。为此，北航红旗战斗队昨天晚上写了许多大标语，连夜贴到天安门广场及周围。我校和西军电从侧面了解到此情况后也写了许多这样的大标语到天安门周围张贴。

10月1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亲眼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这天，天气非常好。早饭后，北航派车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东面的一条街道旁。因为来京的师生特别多，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下，所以这次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方式改为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发，围绕天安门周围的街道慢慢行驶一周后再上城楼，以方便街道两旁的师生近距离地目睹毛主席的风采。

我们站在大道两旁焦急地等待着，不时走出队伍伸头向街道两头张望，觉得时间过的特别慢。为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学校组织我们不时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岁毛主席》等。即将见到毛主席的我们，和平时唱的大不一样，个个充满了激情，嗓音格外嘹亮。

下午 1 点 10 分，街道东面扬起一片尘土，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不一会，十几辆由军人驾驶的摩托车排成人字形缓缓驶过来，后面紧跟着一辆又一辆的敞篷吉普车。毛主席和林彪身着绿军装在第一辆车上并排站着，昂首向前，表情肃穆，不停地向两旁的群众挥手致意。路两旁的革命师生和群众挥舞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瞪大眼睛一直紧盯着毛主席看，后面的中央领导人还没看清面孔就过去了，毛主席后面好像是周总理和朱德，第三辆车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扳着面孔，面部表情非常严肃，机械地挥舞着手中的语录本。我猜想“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能指的就是刘少奇。大会的口号中就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他肯定看到了那些大标语，心知肚明都是冲着他来的，怎么会高兴起来呢。

毛主席检阅完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紧随其后。广场上空飘着许多红色大气球，下面挂着印有大标语彩绸。下面人山人海欢声雷动，个个挥舞着红色语录本，一浪接一浪地狂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喜笑颜开地不时走到栏杆边，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好大一会儿，广播中传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宣布大会开始。”接着陈伯达宣布道：“同学们，今天，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接见各地来的同学，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在一阵接一阵的“毛主席万岁”的声浪中，林彪开始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你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来到北京，看望毛主席，同时，交流革命经验。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今天，毛主席非常高兴地接见你们。这是两个多月来，连国庆节在内，毛主席第六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总是同群众在一起，充分地相信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毛主席给全党同志，给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整个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变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最近，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展开了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毛主席号召大家，关心国家大事，真正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行动。这是极大的好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保证。

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运用和新发展。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的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

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取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前进！

毛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讲话完毕后，陈伯达宣布游行开始。广大师生和红卫兵队伍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挥舞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通过天安门。毛主席和他的语录本不离手的“亲密战友”林彪，不停地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

## （九）：郑州见闻

10月19日下午，我们乘5点多的火车返校。我在去北京时给大哥的回信中交待要拐到郑州看望他的，便决定在郑州下车。我们班的另一个河南同学李双亨也很关心河南的文化大革命，想和我一起到郑州看看，就一起开好了介绍信，早晨5点多到达郑州时，我们一起下了车。

走出火车站，我们先到接待处办理公共汽车免费证。这里有许多外地串连的学生，排着长队，大部分是中

学生。我们排了近一个钟头才轮上。办好免费证后，我们坐6路公交车来到河南农学院。接待室师傅告诉我们，学院有许多组织，但总的说来是两派。我们俩是造反派的，便找到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接待站。接待人员听说我们是西工大的学生后，非常热情地给我们端茶倒水，很快安排好了住处。当我问起我大哥田玉印时，他说：“我知道，是园林系的，人很老实，但参加了保守派组织抗大战斗队，现在名字改成田卫红了。”他还告诉我大哥宿舍楼是哪栋。

大哥的母亲（我叫五婶）是明媒正娶用花轿抬到我们家的，特别受奶奶宠爱。我母亲是买来的，深受奶奶歧视，一直当丫头使唤。本来我母亲早在大哥之前就生了一个哥哥，产后母亲患病发高烧，奶奶不管不问，父亲成天地下地干活也没时间照顾。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烧得迷迷糊糊，把小孩放在身边睡着了。我父亲睡时没听到小孩哭，以为小孩也睡了，没有看。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去抱小孩准备喂面汤时，发现小孩的身子已经冷冰僵硬，不知什么时候死了。母亲一想起这件事就伤心落泪。五婶生下大哥后，奶奶非常偏爱，盼望他长大后能做官就起名玉印。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名字太俗气，有点“四旧”的味道改成了卫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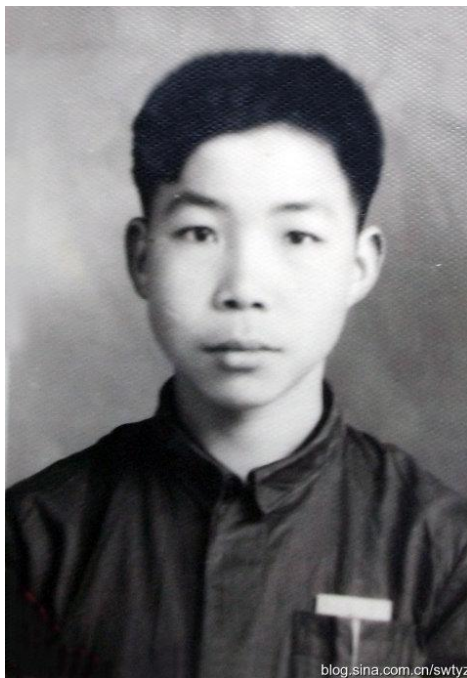


图 4 大哥田玉印

我们来到大哥的宿舍楼，不仅找到了大哥，还见到了高中同学黄庭恩。他也是“抗大战斗队”的，得知我们俩是西安造反派组织的，他的态度一下子冷淡了许多，也没有让我们进他的房间，在楼道里说了会儿话就离开了。我看到楼道里有新砌的墙，问大哥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们，学校两派斗争很激烈，不同观点

的学生住在一起都很别扭，经常吵吵闹闹，甚至打架，他们便自己动手把宿舍楼的楼道砌砖墙隔成一个一个单元，同一派的住在一起，两派互不来往，这样能避免互相冲突。

大哥的衣服上沾着许多浆糊，个头又矮，活像个小丑。他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他很少写大字报，战斗队经常让他到外面贴大字报或标语，最近忙得也顾不上洗衣服。他心眼太实在了，看着他那脏兮兮的样子，又可怜又可悲。他不善言语表达，给我们介绍学校和郑大的情况时，罗里罗嗦，并有点诉苦的味道，一直谈到吃午饭。不过，我们还是基本都搞清楚了。

大致情况是：他们学院的一些师生要造校党委的反，提出“炮打校党委”时，他们认为校党委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造反”“炮打”的词只能用在敌我矛盾上；学校的造反派提出要罢校党委书记毛克忠的官时，他们认为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学生老师根本无权；当省委作出罢毛克忠官的决定后，他们说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落实，是造反派瞎汇报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坚持为毛克忠翻案。别人说他是保皇派，他接受不了，并以多数派自居，认为大多数群众支持他们，他们肯定是对的。他们竭力反对郑大学生党言川等揭发批判省委的问题，说他们放着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不搞在外面瞎胡闹，是反革命行为。他们还把北京钢铁学院谭立夫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讲话视为香饽饽，复印很多到处散发张贴。

我告诉大哥，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都在声援、支持党言川等造反派。大哥硬说我们都受蒙蔽上当受骗了，说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领导，是反革命行为，把党言川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右派的学生等活该，是罪有应得。他们还大量印发造谣中伤党言川等学生的传单到外边散发。他的观点和认识明显有问题，不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要求。但是我们刚见面，我又不是很清楚这里的情况，所以也没和他争论，一直耐心地听他介绍。

第二天晚上，我找着大哥一起到学校的体育场边坐下交谈。开始，他仍然说我被蒙蔽了，给我谈了许多问题。我一一驳斥了他提出的观点和看法，他无言以对。但在关键问题上，他总是不正面回答，一滑而过。后来，我劝他好好学习一下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最后，我说他心是好的，主观上是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但客观上起了保皇作用；还说他消息太闭塞了，对外面的许多事情不知道，别人把你蒙在鼓里了，诚恳地劝他出去看看，或到北京或到我们西安。他也答应了，后来听说他去韶山和井冈山了。

第三天上午，李双亭去找他的同学了，大哥一直没来找我，我也不想去他们那个保守派单元找他，便到大街上转，想买一个挎包。我转了许多商店也没有买到一个如意的，后来在百货大楼旁边的一个小商店看到一种军用挎包，大小合适，两块多钱，就买了一个。之后，我又到人民剧院门口看豫剧三团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剧中的银环妈、栓保妈和二婶是电影中的老演员，而主角银环和栓保是新演员。栓保是一个三四十岁的演员演的，和电影上的差别太大了，唱腔也不好，我看了两场就走了。

下午，我找着农学院红卫兵的接待人员，让他给我介绍介绍他们学校和郑州大学的文化革命情况。他很高兴，我们几乎谈了一下午。听完后，我明白他们学校保皇派的观点和做法了，和西安一样：一是打死老虎，装怯作勇；二是别人打活老虎，他们反对、指责，甚至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或错误抓住不放，肆意歪曲攻击；三是造反派炮打司令部，他们出来保，攻击造反派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四是骂造反派是一小撮右派学生翻天；五是强调要落实材料，说造反派太过分了，没有事实就提出罢官、改组等。

郑州大学的情况很复杂，斗争也很激烈，接待人员给我讲了许多。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等7位教师写的大字报后，在郑大引起了很大反响。中文系的李学生、王相海、席占修、刘作周等14位学生立即贴出全校第一张《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持什么态度？》的大字报，批判校党委压制群众，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接着，政治系7个学生也贴出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欢呼、声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校园。

校党委慌了，当夜派宣传部长祝一清向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汇报。杨说：“郑大不是北大，王培育不是

陆平，你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搞我们，现在我们搞他们，让他们放出来再说。”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根据省委指示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提出三条措施：1、立即组织人反击，追查写大字报人的“历史表现”和出发点；2、下边的人不准进行串联活动；3、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宣传。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赵文甫也来到郑大作报告，公开提出对有问题的人要组织批判，同时对写大字报的人要进行反击。一霎时，整个校园贴满了“誓死保卫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对王培育就是反党”的大字报。他们对写大字报的学生扣上“小邓拓”、“小吴晗”、“右派”、“三家村黑帮”、“牛鬼蛇神”等帽子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召开大小斗争会，让写大字报的学生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在强大的压力下，6月5日下午，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第二天凌晨，数学系青年教师刘光武也跳楼身亡。校内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这时，校党委召开全体党员、团支部书记以上会议，说他们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还说他们“人虽死，心不死，鬼魂还在”，要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派人到王相海的家乡濮阳开批判会，声讨他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他那贫农出身的老父亲被吓得浑身打哆嗦，说不成一句话。他妹妹哭喊着说：“俺哥啥时候也不会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没几天，中文系资料室的两位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也相互拥抱着跳楼自杀，引起众多师生的恐慌和不安。

这时，政治系学生邵维均、贺长有、李春兰共同向党中央发电报，说郑州大学党委镇压学生运动，王培育组织反击写大字报的师生，造成4人跳楼，自杀的根子在省委。这下捅了马蜂窝，省委急忙派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带领工作组进驻郑大。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也来到郑大亲自坐镇。他们先后召开党员大会，强调省委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并竭力包庇校党委，采取种种手段对革命师生进行“反击”：一是利用学生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二是翻查邵维均等三名同学的档案，企图找出其它问题；三是召开全校各系各班代表会，开辟专栏大字报，号召全校师生揭发批判他们的错误、施加压力。同时组织全校师生批判邵维均、贺长有和李春兰，继续压制学生，把斗争矛头对准写揭发批判校党委大字报的学生。他们还威逼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写检讨书，对他们采取调整住室、派人监视、组织围攻等。结果，4名团支部书记被撤职，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妹妹张凤芝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报被污为“反党分子”，在强大压力下，张凤芝写好《绝命书》决定走和王相海一样走上自杀的路，但被同学发现未遂。

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激起许多学生的不满。6月18日晚，中文系学生党言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的巨幅标语“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党若平”。在他的带动下，反对工作组的大标语、大字报贴满整个校园。同时，历史系学生任延庆、郝秀仲带领一些学生自动聚集在王相海跳楼身亡处，声讨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迫害阶级兄弟的罪行。他们群情激愤，高呼“打倒王培育”、“枪毙王培育”等口号。这就是闻名全国的郑州大学“8.18”事件。

第二天，省委决定撤销王培育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改组校党委，并准备撤出省委工作组。在即将撤离之际，工作组根据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杨蔚屏的布置，由他们提出负责人，仓促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郑大文革）。

省委拖了40多天才处理王培育的问题，郑大许多同学认为他们犯了严重的右倾思想错误。为此，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38张纸的《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贴在行政楼前的大字报栏内。信中从二十个方面揭发批判省委及工作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接着，外语系郑玉清、杨树生等9人和中文系党言川、王举章等9人贴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脱责任！》、《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提出要追查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根子”，同时，郑大文革的学生们则贴出“省委驻郑大工作组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的大字报，两种对立观点和认识的斗争异常尖锐激烈。

8月6日，党言川得知毛主席发表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消息后异常激动，感到毛主席的话句句说到了心坎里。他立即赶赴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郑州大学的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同学也来到北京。他们三人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向首都人民系统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得知后，在北京前门饭店专门接见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刘建勋主动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并“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

## （十）：从郑州到西安

8月15日，刘建勋和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一同离京返回郑州。一回到学校，党言川他们三人便串联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当天晚上，他们又组织召开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专院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几万人前来参加。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等省委领导也到了会场。会议开始前，郑大文革的人强行要主持会议，郑大联委的同学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互相推推拉拉。最后，郑大联委的人把郑大文革的人轰下了台。会上，方复山、党言川、刘松盛介绍了北京红卫兵大串联、炮打司令部和高校的运动情况，气氛热烈，群情激昂。

第二天上午，郑大文革召开革命师生辩论会，会上称郑大联委的汇报会是“黑会”，还说“郑大联委的人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然后连续三天对党言川及郑大联委的同学进行了围攻斗争。

8月18日，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省委领导到郑州大学与两派代表见面，听取双方意见，听完后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就走了。次日，他们再次来到郑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刘建勋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在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且还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

他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肯定了党言川等少数派的革命行动，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汇报会上，公开表扬刘建勋和他发表的大字报：“全国省委书记只有刘建勋发表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刘建勋的大字报使倍受压制的党言川等少数派欢欣鼓舞，郑大联委由一百多人一下子发展到近千人，但也引起了郑大文革的强烈不满。8月30日，李月珍、彭学敏、郑毅涛等21人写出了《炮轰刘建勋》的大字报：“你们口口声声要支持保护少数，难道我校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成了保皇派吗？如果你也同意肆意歪曲污蔑的作法，要给我们扣上这项保皇派的帽子，我们决不答应！”

这时，金维珠同学贴出了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中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阳节吃了最后一口米饭至1960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这张大字报在郑大联委部分同学中引起了共鸣，9月3日，他们发出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书》。《呼吁书》中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他们接着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主要负责人任延庆带领十余人去广州揪原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但没有抓回来。

9月5日，郑大联委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全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100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5万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发言中控诉了省委1959年前后“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的罪行。省委领导文敏生、纪登奎等参加了大会，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表态道：“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决支持你们。”

9月7日，郑大文革也针锋相对地发出《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却说：“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

尤其是从 1958 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我们要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斗倒斗垮！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会后，郑大文革成立一个红卫兵战斗师，负责人是郑大文革的正副主席彭学敏、郑毅涛。

9 月 11 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声讨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大刮浮夸风，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由于吴芝圃未到场，他们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台批斗。对此，参加会议的纪登奎等当场质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历史反革命”？

正在两派互相激烈斗争的时刻，省公安厅披露出来党言川的一封“反革命”私人信件，成为反击党言川等人的有力武器。郑大文革红卫兵战斗师立即抓住把柄不放。

原来，新乡师院的保守派组织“八·三一”的学生，得知该院造反派学生朱××和党言川曾有书信来往，便趁该同学外出之际搜查他的读书笔记和信件，发现 1962 年党言川给该同学的信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拍照后送给学院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又送到新乡市公安局内保科。曾在新乡师院担任工作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知此信后如获至宝，亲赴新乡要回照片，由公安厅放大保存后披露出来。

党言川在信中谈到：“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少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 58-59 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

这封信成了党言川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大造声势，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在郑大红卫兵战斗师的重炮猛轰下，郑大联委不得不发出《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此后，郑大联委抓住省委和校党委工作组执行的压制群众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逼死人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狠批猛攻。

但是，郑大联委中的数学系学生张书震等同学对党言川的信件中关于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有不同意见。于是，他们决定另起炉灶，宣布退出郑大联委成立文化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郑大造委），负责人是张书震、马鸿勋和杨钦宝等。接着，以王志明为首的部分学生又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这两个组织都宣称和郑大联委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是战略伙伴关系，要和郑大联委并肩战斗。

9 月 19 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郑大文革等对立派认为，省委一味支持郑大联委，“党言川之流”已成为省委一小撮走资派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的“御用工具”，是真正的保皇派。就这样，两派互相攻击对方，斗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

10 月 24 日，我本来想找大哥再和他谈谈，让他赶快认清形势，尽早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但他一直没有来找我，我也不愿去他们的战斗队找他，便决定回西安算了，当天就到火车站买好晚上 6 点 21 分的直快火车票。



火车站里人潮涌动，大部分是串连的中学生，我和李双亭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车厢里更是挤得要命，不要说坐，连站都站不住。我们一直站到灵宝站，1000多人下车后，车厢里才不太挤了。从车上那些中学生的交谈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是打着串联的幌子出来游山玩水的。他们谈论的话题都是什么地方风景优美，什么地方好玩，问他们是哪一派的、什么观点？竟然说随大流，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观点。他们参加的战斗队，都是平时能玩到一块的要好同学，一听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串连，学校几乎走空了，怪不得到处都有他们在挤着上汽车、挤着上火车、挤着吃饭。早上吃饭时，有一个中学生拿着一个馍，没吃几口就扔到火车下，被一个红卫兵抓住，大家批评谴责他时，他的态度非常蛮横，许多人骂他太混蛋了。

上午9点多，我们回到西安，西安的文化革命形势很好，大街上很少有保守派的标语和大字报了。10月23日，我们革命造反派在体育场召开“赴京师生汇报经验并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两千多个单位参加，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震天。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人人喜笑颜开，对搞好西安的文化大革命信心十足。

但不知省委要耍什么花招，下午社教地区各工作队来了一个负责人要给我们作检讨，平反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师生。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说：“光检讨一下不行，我们要打回洛南去造工作团的反，追根挖线，让那里的群众彻底认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第二天下午，西安的造反派要在陕西日报社召开“声讨陕西日报社的罪行”大会。我和黄炳球一起冒雨到陕西日报社参加大会，但参加大会的人太多了，大院里挤满了人，门外还有许多人往里挤。我们俩正准备离开时，听说省委发生打人事件了。我们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又冒雨往建国路奔去。

## （十一）：西安红色恐怖队

我们来到省委一看，办公楼前聚集了许多人，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西安市保守派红卫兵司令部的“红色恐怖队”，看到北京来的人民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办公楼里散发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传单，20多个队员就上去围着他问：“谁批准你来这里撒传单的？赶快滚蛋！”那同学理直气壮地回答：“毛主席批准的，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的责任…”他们无言以对，二话不说，窜上去十几个人扭住这个同学就拳打脚踢，从四楼拖到三楼，再从三楼拖到四楼，一边拖一边殴打。他们还在一楼和二楼的楼梯口设了几道封锁线，阻止其他群众上去帮助。门外的群众看不上眼，纷纷围拢到门口谴责他们，大天白日竟敢在省委办公楼上殴打革命学生。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省委中有领导在暗中支持他们，也说明省委仍然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白色恐怖。

说起西安“红恐队”就得先说说北京的西城区纠察队。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发起并成立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也相继成立了“首都西城区纠察队”（简称“东纠”）和“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分队”（简称“海纠”）等红卫兵组织。成员大部分是各中学的高干子女。起初，他们成立的目的是遵照毛主席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指示，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他们发出的《通令》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和负责干部的家；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对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严肃批评和教育；严禁打人、侮辱人、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逼、供、讯等。因此，他们立即得到周恩来、陶铸、王任重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周恩来还通过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他们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及冬夜值班所需的军大衣等。在运动中，他们曾受周恩来嘱托，保护了一些民主爱国人士的宅弟和人身安全。

与此同时，他们却竭力阻挠大学红卫兵少数造反派揪斗各部委领导干部的革命行动，经常与他们发生冲突，甚至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说文革小组执行的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违背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意图。江青在一次谈话中曾指责他们“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爹保妈，要揪他们的后台。”毛主席风闻了“西纠”的所作所为后也起了戒心。9月15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周恩来特意安排“西纠”的红卫兵向毛主席敬献“西城纠察队”袖章，想借此肯定“西纠”，但毛主席没有接受他

之后，“西纠”红卫兵中有人建议停止办公，偃旗息鼓，等待机会以图东山再起。但是，大多数“西纠”红卫兵不同意。这些以“红五类”自居的红卫兵，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社会的宠儿，从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那天起一直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支持，在“破四旧”和揪斗“黑五类”中一直冲锋陷阵、横行无阻。深受“血统论”影响的“好汉”们怎受得了这等羞辱和挫折。为显示自己的决心和力量，他们汇聚起浩浩荡荡的人马，扛着“西纠”大旗，高喊“西纠不倒”的口号，驱车在大街上游行示威。看到自己的父母一个个被揪出来批判斗争后，他们更感愤懑和绝望，但又不肯善罢甘休坐以待毙，他们一反常态，抛弃反对武斗的宗旨，大搞“打、砸、抢、抓、抄”，动辄挥舞皮带，拳打脚踢，疯狂地把斗争矛头指向造他们老爸、老妈反的造反派，将积蓄在胸腔中的愤怒发泄到“黑五类”及其“狗崽子”身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干扰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引起党中央毛主席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这就注定了他们覆灭的命运，1966年12月底，江青、陈伯达代表党中央宣布“西纠”为反动组织，强令取缔。

西安“红色恐怖队”（简称“红恐队”）就是仿效北京“西纠”成立的。9月20日成立时，他们专门请“西纠”的学生来指导。当时，其成员有90余人，大部分是西北局、陕西省委和部分军队干部的子弟，以西安中学，西安市三中、十中、二十中，三十七中、陕师大一附中、二附中等学校的学生为主要力量。“红恐

队”的司令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开基之子张文光，组织部长是西北局干部孙克的儿子孙亚明，办公地点在新城区少年宫。

“红恐队”成立后，就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抄家、抓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成为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御林军。“红恐队”这个组织的名称就体现了他们要作什么。他们的成员戴着“红恐队”袖章，在马路耀武扬威，成群结队，公然进行暴力性的迫害活动，公开地以制造恐怖为荣，人见人怕，无人敢惹。省政协副主席、民主党派人士党晴梵被抄家杀害、三十七中教师王冷和退休教师王伯恭被打死（相关：王冷之死），就是“红恐队”的主要成员干的。当时有一起徐自简事件（相关：关于西安红卫兵组织的口述记忆），也是“红恐队”的暴力事件之一。

“红恐队”利用抄家来的房子，在西安市的广济街建立一个据点。在那里，他们审讯、关押抓来的“黑五类”，存放抄家抄来的金银珠宝和衣服、家具、收音机、图书、字画等。在关押的“黑五类”家眷中有长得漂亮的，他们就趁人之危，大耍流氓活动。他们先把那些有姿色的女眷批判后关押起来进行所谓教育，让她们斗私批修写检讨，等到后半夜后，便调戏、猥亵、奸污她们。那年冬，西安城四处贴有一张粉红色传单，标题为《一个被“红恐队”奸污的女人》，引起公愤，接着控诉“红恐队”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之后，“红恐队”臭名昭著，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不敢公开活动而转入地下。

“红恐队”不仅与北京“西纠”的关系很密切，而且和“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关系也很密切。12月5日，北京的高干子女又成立一个和“西纠”性质基本相同的组织“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的当天晚上，他们用几十张大字报刷成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向中央文革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弹。西安“红恐队”立即与他们建立密切关系，派干将到北京多次参与“联动”冲击国家公安部的行动。1967年1月17日，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讲话中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北京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的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随即，西安“红恐队”被打成反动组织和“西北局、陕西省委的黑子弟兵”、“刘（澜涛）家御林军”，主要人员被定为坏头头，部分成员被审查关押。

文革结束后，陕西省委在讨论“红恐队”的问题时，认为该组织是“反中央文革、反对林、江集团的”，是“因为出身干部子弟被迫害，心中有气，对随意批斗、揪斗老干部不满，有些过激行为”。之后，他们被平反，很多“红恐队”成员被解放，重新安排工作。

## （十二）：大串连到许昌

我们从北京回来后，无政府主义开始泛滥，不少同学给校文革会贴大字报，说校文革会、系文革分会、班文革小组等组织束缚了手脚，不符合毛主席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教导，提出“只有打破框框，学校才能大乱，才能打一场人民战争”，强烈要求解散这些组织。之后，学校的文革组织虽然没有解散，但已是形同虚设，对学生的要求放松了很多，尤其是各系、班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学校组织活动，都是靠广播站反复通知，谁愿意去就去，不去也无人管。整个学校成为一盘散沙，学生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0月27日晚上，西安的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第四次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陕西省委、西北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单位和人很多，有几个人发言很好，真正揭发批判了省委、西北局的阴谋勾当，就是天气太冷了，我的脚都冻麻木了。我们班只来了十几个同学，没多久，走的只剩几个人了，会场变得稀稀拉拉。

会议正开着，有人说西安外语学院的保守派组织筹委会趁临委会来体育场开会之机，抢占了他们的房子和广播器材等物品。大会立即让各校宣传车把西安外语学院临委会的人送回学校，接着西交大、西军电、冶院等院校纷纷去支援。我们学校派红卫兵五支队（五系）和四支队（四系）去支援。我们来到他们学校后，也没起多大作用，只是助助威罢了。他们先来的不仅夺回了房子和广播器材等物品，还从该校筹委会的资料室、印刷厂等地方搜出大量的黑材料和造谣传单，并搬走几台印刷机，一直奋战到凌晨5点左右，个个都冻得瑟瑟发抖。我们看没什么事了，便步行回到学校。

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暗中指使西安电影制片厂偷偷录制了一部纪录片，主要内容是西安的革命造反派张贴揭发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问题大字报、在省委门前的建国路静坐绝食的情况。学校不知道怎么把这部纪录片要了回来，第二天晚上组织全校师生观看，目的是把电影作为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企图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血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铁证和活靶子，供学生们批判。

10月31日，我们五系组织去洛南社教地区平反。我们班一些同学已经出去串联了，只去了几个同学。到洛南后，我们匆匆忙忙搞了12天。11月13日，天上飘着雪花，我们乘汽车返校。汽车过秦岭时，山上到处是一片白茫茫，崎岖的山路上，一队队学生背着背包，打着红旗，冒着风雪徒步串连。他们有去韶山的，有去井冈山的，也有去武汉的。我们不禁议论开了，有的说到上海好，有的说到韶山好，有的说到成都、昆明好，有的急不可待地说明天就走，但没有一个提出要徒步串连的。

第二天下午，西安的革命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刘兰涛、霍士廉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五六万人，整个会场坐满了人。刘兰涛、霍士廉低头站在舞台一边，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会议发言主要是揭发批判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会场上不时高呼“打倒刘兰涛！”“打倒霍士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刘兰涛和霍士廉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不时掏手绢擦脸上的汗。会后，他们俩又被押上汽车在市内游行。

这次批斗会后，西安就很少召开大会了，因为各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大部分都外出串联了，校内都冷冷清清的。为了接待全国各地来串连的学生，10月5日，西安市专门成立一个接待组，后来改名为西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省、市联络站。11月16日，我听说周总理有新的指示，今冬串联暂时停止，有些急了，若不快些出去，恐怕今后就没有出去串连的机会了。刚好，西安石油学院的高中同学尹笃春曾经邀我去重庆串连，我赶紧跑到西安石油学院找他，但没想到他一个人已经走了。回到学校，看看同宿舍的同学都走了，便决定一个人到上海去串连，那可是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我立即把东西一收拾就去火车站了。

## （十三）：家乡许昌见闻

第二天，我带着两个表弟步行 20 里到许昌县铁张村舅家，在那里住一个晚上。三个舅都在家，我住在大舅家，两个表弟住在二舅家。晚上，大舅也给我谈了他们乡下搞文化革命的情况。令我最难忘的是，七八月份大热天，一些中学生红卫兵和村上的年轻人把从地主富农分子家抄来的衣物堆在场上烧，还让被搜出衣物的一家人全部跪在火堆旁，让他们穿上厚棉衣一边烤火，一边挨棍子打。有的人头低得不够很，会被强按着头接近火焰。那些人热得浑身汗如雨下，有的脸都被烤得起泡了。大人们都不忍心看，在场的都是些孩子们。大舅感慨地说，那些衣物都很好，还有绫罗绸缎，烧毁真太可惜了，分给大家不更好嘛。他更不满意的是，把全村各家的狗都打死了，一律不让养狗。这破盆漏院的，万一有坏人来咋防啊。

我在许昌停留了 4 天，11 月 25 日我坐汽车到南阳市。到那里时，已经是下午后半晌，没有去南河店我家的班车了。我只好找到接待站，接待人员把我安排到南阳一高，一高又安排我到大礼堂住。这里住着许多外地串连的学生，男男女女都睡在铺有麦秸的地板上，每人发一条草绿棉军被。这些天，我一直奔波，没休息好，非常疲乏，找到个空位后和衣躺下不一会就睡着了。

我叔伯大姐玉荣对我很关心，经常写信问候我、鼓励我。她是我四爹的大女儿，学习很好。考高中时，班主任说她家庭困难，让她报考县师范学校，出来就可以教学拿工资。她听了班主任的话考上了南召县师范学校。没想到上了两年，遇上国家调整压缩学校，把师范学校砍了。她回家不久，经人介绍嫁给南阳县蒲山镇宋营一个高考落榜的青年。姐夫一心想考大学，卯足劲又复习一年正准备参加高考时，遇上文化革命，高考取消了。加上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孩，二老嫌弃，又因为已婚失去考大学条件，姐夫窝了一肚子火，老和大姐生气吵架闹离婚。大姐心情非常不好，曾写信给我倾诉。我决定顺便拐她家看看，安慰安慰她。

早上，我很早起床，赶上 6 点第一趟班车到蒲山镇下车。走到大姐家时，她们还没吃早饭。她和姐夫单独过，姐夫也没在家。我和大姐一起吃完饭，问候并安慰她一会儿后就急着走。大姐死拉着我，不让我走，我只好坐下来和她谈话拉家常。眼看快中午了，我太想家了，一定要走，何况她家也没处住。她实在留不住我，就赶紧给我做饭。吃完饭，我立即动身，大姐把我送出村子好远仍不肯回去，眼里泪丝丝的，好像有一肚子话要给我诉说。我心情很沉重，答应以后每次回来都一定拐来看她，让她留步，急忙走了。

这里离南河店有 80 多里，我归心似箭，干脆不等班车了，快步往家赶，到石门公社时天已黑透，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不见一个人影。我顾不得害怕，顺着公路快步如飞。一辆汽车从我身后开过来，上面站满了人，听到有人叫我一声，好像是儿时的好友张德川。但汽车灯光太刺眼了，我还没看清，汽车忽地就从我身边跑了。

赶到家时，家里人刚吃完饭。听说我回来了，一院子人一下围拢到我跟前，问长问短，亲热异常，弄得我不知回答谁的问话好。母亲赶快给我做饭。我们的院子住着老弟兄四个，我父亲是老三，还有二伯、四爹和五叔。二伯母早逝，膝下无儿，只有一个女儿玉定，我小时已过继给二伯。我们家兄妹 5 个，二伯、玉定和我们一起生活。四爹家姊妹 4 个，除大姐已出嫁外，还有一男二女。五叔家也是兄妹 5 个，除了在河南农学院上大学的大哥之外，还有三男一女。我们这一辈共 8 男 8 女，相处得如亲姊妹，男的按年龄我排行老二。

我正吃饭时，四弟玉言给我说“小泉死了”。我正要问，几个人吵他不让他说，我心里当即难受极了。小泉是我最小的弟弟，我去上大学时，他已经 5 岁了，一直跟着把送我到汽车站。我上车时，玉定妹还抱着他从小窗口伸着头看我。他那可爱的笑脸一直定格在我脑海里，想不到那竟是最后的诀别。那时，家里每人每天只供应 7 两豌豆，从来不敢吃什么馍。为了给我路上做干粮，母亲才下狠心给我烙几个豌豆面饼。小泉眼巴巴地看着，馋得直流口水闹着要吃。母亲吵他不给，我给他掰了一块。他津津有味地吃着说：“哥，真好吃”。这次，我在南阳专门给他买两个烧饼、四个火烧，谁知他…

围着我的家人个个默默无语地散去，我一阵酸楚，放下碗跑回屋里蒙头哭泣起来。母亲和弟妹们不敢劝我，悄无声息地睡了。父亲坐在我身边劝我好久，看我停止了哭泣才睡。原来，我走后不久，小泉患急性脑膜炎，卫生院误诊为感冒，很快死去。家里怕我知道后心里难受，影响学习，也没敢告诉我。当时，母亲难受得哭了好多天，到现在也没人敢在她面前提这事。第二天上午，我在打扫房间时，看到床下有一只小泉的鞋，一下子泪如泉涌，几乎哭出声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坐在床头流起泪来，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但看到母亲一声不吭默默地坐在我身旁，不敢劝我，表情十分痛苦，我只好强忍悲痛，不敢哭出声来。就这样，我一直伤心地坐到中午，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我们家是南召县的四大镇之一南河店镇，也是南河店公社所在地。家东面是南河店完全小学，西面是南召县第四中学。文化革命开始后，学校揪出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批斗，其中有教过我数学课的曾繁富老师。他平易近人，教学认真负责、通俗易懂，很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但因他是地主家庭出身，批斗后在学校菜地劳动改造。当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学生开始给校党委贴大字报，把斗争矛头指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安可，县委派工作组进驻该校，维护学校的正常的教学秩序，压制学生不让矛头向上。没多久，工作组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撤走，一些造反派师生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和红卫兵组织，批斗安可，给他戴高帽子游街。但是许多学生反对造反派的做法，也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叫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校文联）。两派势不两立，互相指责对方，闹得不可开交。双方的“黑五类”子女倒了大霉，互相揪斗对方的“黑五类”学生，把他们个个整得狼狈不堪，双方都无人敢袒护，最后都被勒令劳动改造。最近，学生们纷纷外出串连，学校没多少人了。

农村开始时也是搞“破旧立新”，批斗“五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在“破旧立新”时，没有完全按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办事，而是把矛头指向一般群众，掀起几股歪风。

- 一是打狗风，和许昌一样不让群众养狗。谁家有狗就命令打死，否则就开群众会批斗。理由是狗在旧社会咬过穷人，不许再养狗。
- 二是剪发风，不管老少都得留很短的剪发头。有的红卫兵手持剪刀站在街头，看到哪个女的头发长就剪。更严重的是，他们还到乡下各家去剪，有的妇女不愿剪，一听说红卫兵来了赶快躲起来或逃跑，群众气愤地说这像旧社会的“跑反”（指像躲避日本鬼子和土匪而逃跑）。
- 三是抄家风。他们以扫“四旧”为名，不管什么家庭，就是贫下中农也不行，只要查出旧书、字画、金银首饰等一律没收，群众称“大扫荡”。我们街有一个老中医姓毛，不识字，看病时，不需要病人说病情，把脉后给你说病情，一般说的很准。他不会开药方，说的大部分是单方，能在田间地头找到的，又治病又省钱。他说的药方没有上过一块钱，人们都尊称他“毛仙儿”。我在家时，好几次得怪病就是他给我开的单方治好的。这次，他被红卫兵抄家后非常生气。后来，他虽然把抄走的东西要回来了，但怒气未消，凡是当过红卫兵的人找他看病，一概借口不看。
- 四是毁坏古迹文物风。他们把所有寺庙里的塑像、匾额、碑刻等都砸毁不说，还砸毁群众住的瓦房上面的五脊六兽，好端端的房子被弄得破烂不堪，群众敢怒不敢言。

在家期间，我还到县城一次，在街上意外碰到高中同班同学王德祥，肩上扛着个扁担。原来，他刚在街上卖完柴，比上学时更黑更瘦了，破旧的衣服上打着好几个补丁，一副地道的山区农民相。当我问他在家干什么时，他很不好意思地给我谈了他的遭遇，让我很吃惊。他家在山区农村，比较贫穷，学习非常刻苦用功，经常熬夜复习功课，成绩也不错。一次段考时，他可能熬夜时间长了，早上正跑操时，突然晕倒在地，段考也没考成。但是，因为他家庭出身是富农，高考落榜了。回家后，他在附近一个小学教学，文革开始后，学校竟然把他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后遣返回家劳动改造。之所以叫“反动学术权威”，因为他是高中毕业生，全校数他文化程度最高，又是富农出身。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时，他又考上南阳师专，毕业后分配到我们母校南召一中当教师。

我在家呆 20 多天，临走时，两个妹妹玉芝和玉定合伙送给我一双鞋垫子。她们俩每人做一只，上面分别绣着“牛鬼”和“蛇神”，意思是牛鬼蛇神脚下踩，礼轻情意重。

12 月 18 日晚上，我告别家人回到学校，没想到学校一派紧张气氛。西安的资产阶级顽固派向革命造反派展开了反革命大反扑，这段时间连续发生了几次流血事件。12 月 1 日，我校的宣传车准备到市里宣传，在西城门外被保守派组织“西安大专院校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和西安工农联合总部（简称“工农总部”）的一帮手持木棒的暴徒拦住。他们气势汹汹地又骂又打又砸，把宣传车上的学生拖出来就打。很多路过的群众看不过去，放下自行车去保护我校的宣传车和同学。很多工厂的工人、学校的学生听到消息，紧急集合，跑步前来声援，在那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在现场开起了“炮打西北局、陕西省委的现场会”。许多工人、家庭妇女、白发老大娘在会上发言，对暴徒的打、砸、抢行为极为愤慨，对他们后面的支持者给予强烈谴责，群众对我校学生的关切和支持令人感动。有的工人说：“打在同学身上，痛在我心里”，“同学们被打，就像我被打一样！”12 月 16 日，“工农总部”的一帮暴徒又在南郊马兴公社围攻、殴打造反派，一个工人被打死，8 人被打成重伤，轻伤无数。我校得知后，派人去支援解围，抓住了主要凶手，但其他人都跑了，有的人躲进山里了。

## （十四）：西安造反派的分裂

1966年11月前后，西安地区的文化革命处于大分化、大瓦解、大联合的态势。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全国各校师生外出大串连，红卫兵到处煽风点火，许多保守派组织和受蒙蔽群众逐渐觉悟，纷纷反戈加入造反派行列。同时，广大工人、农民及各行各业都在成立或正在筹备成立造反派组织，就连掌握大权的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内也先后成立了造反派组织。

造反派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保守派势力开始土崩瓦解，各级党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基本瘫痪。那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保守派，不甘心自己失败的命运，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党、政、财权，收买操纵一部分受蒙蔽群众，拼命围剿、打击新兴的革命造反派，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猖狂反扑。“工农总部”就是那些顽固的保皇派们拼凑成立的。才成立几天，他们就砸了我校的宣传车，制造“马兴”流血事件。

针对当时形势，12月12日，西安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召开讨论会，统一思想认识，研究对策。会上，西交大文革总会主席李世英在发言中提出：我们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应该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和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通过“谈判”和他们消除分歧，共同对敌（造反派群众简称其核心内容是“三句半”）。但是，以西军电、西工大等院校为首的大部分造反派头头不同意他的意见，说这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折中主义和右倾思潮。他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扫帚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主张乘胜追击，彻底摧毁保守派组织。双方展开激烈辩论，但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这样一来，曾经团结一致、风雨同舟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出现裂痕。起初，双方的分歧只限于内部互相辩论，以后越演越烈，公开到社会上，甚至出动宣传车、贴大标语和大字报互相指责、攻击、谩骂对方。

1967年1月17日，陈毅接见西安地区赴京代表团讲话时说：“保守派的工农总部，主要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我们应该说服教育他们，把他们吸收到左派队伍中来。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法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对民主党派提的。我们都是同志，阶级兄弟，要耐心帮助他们，要有正确的政策，不能放弃原则，不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骂、对吵，去压服他们。我们也很幼稚，不是百分之百的毛泽东思想，要欢迎他们和我们在一起，压是压不过的，都是阶级兄弟，不做原则上妥协。”但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造反派双方，都想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根本听不进去陈毅的劝解。

1967年元旦，中央两大权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该社论发出了非比寻常的信号，格外引人注目。人人都明白，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决战，全面夺取他们手中大权的动员令。

当时，我们学校的情况是，保守派文革“临委会”很明智地宣布解散，校内的造反派一统天下，没有两派之争了。学生们除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和写大字报外，别无它事。为填补空虚打发无聊的时光，有的同学到图书馆看书学习，有的同学整天打扑克，有的同学自己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有不少女同学买毛线织毛衣。

1月8日晚，学校广播站播出紧急通知，“工农总部”的顽固保皇派们不甘心自己的灭亡，还要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他们竟然煽动工人罢工，不少工厂已经罢工几天了，情况很严重，政治影响很坏。校革委会决定采取紧急措施，让同学们下工厂去，一方面向工人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最新指示，一方面帮助



工厂生产。

根据学校安排，我们班去三原县 148 厂（红原锻铸厂），但只有陈美绍、蒋宜昌和我 3 个人去，其他人不是串连还没回来就是回家或到其它工厂了。1 月 16 日，我们乘车来到 148 厂，住在工厂招待所。该厂属于新建的军工厂，位于三原县西北的一个山沟里。

第二天早上，工厂革委会主任李向荣把我们分到 13 车间，即飞机起落架加工和总装车间。此车间有 86 人，大部分是从西安红旗机械厂调来的。因为这个厂还没有建成，活很少，大部分工人没事干。该车间有一位老工人郭师傅，车工技术娴熟，心慈面善，人缘很好，对我们也很和气。我总在他旁边看他干活，和他拉家常。他知道我们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无聊，便主动提出教我学习开车床技术，我当然非常乐意。他先给我介绍车床的一些基本知识，然后手把手地教我开车床、加工零件，教得很耐心细致。当我基本掌握加工技术后，就让我单独操作，他在旁边指导。这一技术的掌握，为我第二年参加 D-1 科研项目，自己设计图纸自己加工零件打下了良好基础。



图 5 作者田玉振在校工厂加工自己设计的 D—1 飞行器零件照片

1 月 21 日，从西安回来的革委会李主任讲，西安的斗争非常激烈，各大专院校批判以李世英为代表的右倾思潮已经从内部公开到大街上了。现在，大街上又是一堆一堆的人群在辩论，甚至互相指责、吵骂，互相攻击对方的大标语、大字报满街都是。

1 月 24 日，西安市的革命造反派要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刘兰涛大会。红原厂革委会得知后决定派一辆大轿车带人去参加。一共去了 40 多人，我也去了。参加大会的单位和人很多，足有 60 多万人，主持大会的是“统指”。大会上把刘兰涛批判斗争后，又押在汽车上游街示众，声势之大前所未有的。

第二天，我们 13 车间召开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王文凯大会。王文凯是车间主任，群众揭发他与同车间的一位年轻女工发生过多发性关系。他们不仅批斗王文凯，还把那位年轻女工押到会场陪斗。批斗完后，他们给他们俩挂上黑牌子，用黑色大字分别写上“蜕化变质分子王文凯”和“流氓分子×××”，还在年轻女工的脖子上挂一双破鞋，然后押着在厂区内游街示众。

又一天下午，工厂革委会把厂党委的领导几乎全部拉出来游街示众。那些领导干部好像并不在乎，队伍稀稀拉拉好长，个个大模大样、左顾右盼地走着，像是在结伴散步一样。路边的工人群众只是瞪着惊诧的眼神默默地看着。可能大多数群众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有些工人在窃窃私语道：“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主次和轻重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不仅触及不了他们的灵魂，倒会使他们更顽固。”当时，我们也不赞成他们的做法，但我们是来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那能干涉和责怪他们呢。第二天，我们13车间的“无产者战斗队”就为厂党委的领导游街示众之事到厂部造革委会的反，把革委会李主任搞得狼狈不堪。

1月31日下午，工厂开始放假，许多工人的家在西安市红旗机械厂，工厂有班车送他们。我们三人也随他们回到学校。

学校里的斗争出现了新情况，前校文革会副主任陈启顺和文革会委员杨梅生秘密给刘兰涛写“黑信”，向刘兰涛“投降”。学校师生非常气愤地骂他们俩是学生运动的“叛徒”。我们回校的第二天，他们把陈启顺和杨梅生揪回学校进行斗争，游校示众。

2月2日下午，西安“统指”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简称“冶院”）球场召开“西安地区右倾机会主义表现在何处辩论会”。各大专院校差不多都去了，唯独西交大说“反右倾”就是反他们交大拒绝参加。他们在本校独自召开什么“誓师大会”。其他院校对他们公开搞分裂活动的行为很气愤，同学们在发言中对他们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进行了不点名地批判和谴责。

冶院距西交大很近，我听完几个同学发言后，又到西交大看他们学校的大字报。校园内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内容大部分是对着我们西工大和西军电（临）的，说我们这些院校“一直抓着李世英讲话中的三句半不放，无限上纲上线，妄图把西交大打成保皇派，实际上他们抓住的是三根稻草，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西工大才是真正的保皇派，保霍士廉，搞打砸抢”“反右倾就是反交大”等，把西工大、西军电（临）、外院（临）等院校说得一无是处。

更令人吃惊的是，西交大文革总会中的某些人竟采用保守派也不敢采用的手法来对付其他兄弟院校。就在各大专院校在冶院开辩论会之际。他们煽动“工农总部”的一些工人和群众在大街上向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示威游行。当西北大学的宣传车在大街上宣传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时，他们借口西大破坏了他们的游行，怒气冲冲地开到他们学校北门闹事。西大师生大部分去参加大会了，在校师生把校门关起来。“工农总部”的工人在前面一边骂一边向里冲，西交大的人在人群后面大喊大叫。后来，他们又把汽车开来把大门拉坏冲进校园。我们学校和西军电（临）的在校学生闻讯后立即赶来声援，他们赶快溜了。当晚，西安的大专院校得知西交大的行为后非常气愤，几乎都派人来了。大家在校门口召开现场会，揭露西交大煽动工人打骂风雨同舟战友的背叛行为，声讨他们大搞分裂活动的卑鄙伎俩。

当晚，我校广播一个特大喜讯：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将举行盛大的成立仪式，党中央毛主席将派领导人参加并祝贺。为隆重庆祝“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西安市将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同时广播了西军电临委会的一张传单，其内容如下：

## 特大喜讯

革命的造反派朋友们：

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告诉同志们一个激动人心的、震撼全中国、震撼全世界的特大喜讯。明天下午，在世界的东方，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英雄城市——上海，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政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这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又一伟大创举。她是共产主义的曙光。她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她是新的共产主义机构的示范。早在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那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

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是和上海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以及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斗争胜利的结果。中央文革小组已命令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人民公社。新华总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等记者将乘飞机前往采访。大会成立时，将有直升飞机在会场上空拍摄彩色电影和散发传单。这部电影将作为重要历史文献载入史册！让我们高呼：

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

西军电临委会 四六一一临时战斗小组印

## （十五）：夺权分化造反派

受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陕西也积极行动起来。早在1月23日，西安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就召开会议，商议夺权事宜。当时，他们商定由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外语学院和“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夺西北局的权；由西交大、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等夺省委、省人委的权；由西安矿业学院、西安工业学院、陕西财经学院等夺市委和市人委的权；由西军电、西工大、西大等院校夺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权。后来又吸收“西安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工矿联”）、“西安地区农民文革总会”（简称“农总会”）等造反派组织参加，组成各级接管小组，接管西北局、省委、省人委、省公安厅和市委、市人委的权。1月26日夺权小组正式对外办公，2月30日向各地、市县委、直属各党委、党组发出通知，宣布“今后陕西省委的一切权利归夺权小组行施”。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委以及各地专员公署，市、县人委也相继被当地的造反派组织夺权。

在夺权中，各造反派组织都想掌握更大的权利，尤其是大专院校中的“老大哥”西交大。他们本来和其他院校已经闹翻了脸，这次更不客气，自称省公安厅是他们做的工作，和西军电、西工大争着要夺公安厅的权，互不相让，弄得不欢而散。

“统指”中其他大专院校都不支持西交大李世英的观点，说话没人响应，指挥棒不灵，西交大倍感孤立，准备另立山头。当时，已经人心涣散的西安最大的保守派组织“工农总部”中的人支持李世英的“三句半”观点，西交大便在他们中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又不敢冠冕堂皇地收拢这些保守派成员，便暗中串连和操作，为成立支持西交大的新的所谓造反派组织做准备。为达到此目的，西交大以救世主的面孔出现在工人农民面前，指责“统指”“夺权小组里没有工人、农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等。“统指”为堵着西交大的口，立即让“工矿联”、“农总会”等工农造反派组织参加夺权小组。西交大又在社会上大造舆论说：“工矿联”和“农总会”是受“统指”控制的，是他们的傀儡。

当时，我在大街上曾看到多处张贴的两首顺口溜：

工矿联是空架，里面坐着西工大。  
包办代替西电临，掌权不是咱工人。  
工人起来造了反，大权工人要接管。  
令你收起指挥棒，不然和你算老账。

农民总会没农民，里面坐着西电临。  
包办代替西工大，掌权不是田幸云。

（注：西电临指“西军电”的造反派组织“临委会”，田幸云是“农总会”负责人）

这些攻击言论，明显是一箭双雕，既可挑拨离间“统指”与“工矿联”和“农总会”的亲密关系，又可煽动所有工人、农民对“统指”中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的不满。总之，无论“统指”怎么做，西交大总会提出反对意见，总会抓住把柄大做文章，诋毁攻击，使分歧越来越大，裂痕越来越深。

不久，在西交大的暗中扶持下，“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成员大部分是保守派组织“工农总部”分化出来的工人。紧接着，又相继成立了“农总司”“文总司”、“机关总司”、“公安总司”、“中革会”等。这些所谓的造反派组织成立后便立即公开支持西交大“文革总会”（后称“东派”），反对包括西交大在内的造反派组织“统指”以及“工矿联”、“农总会”和以后相继成立的“机关总指”、“文总指”、“财总指”等（后称“西派”）。之后，这些组织通过串连迅速

发展到全省各地各行业及各企事业单位。再之后，西交大彻底从“统指”中分裂出来，成为这些新的所谓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人，在全省范围内又形成了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两派。

## （十六）：工总司横空出世

为什么说“工总司”是假猴王？从它的成立时间、人员、斗争目标和口号就可看出来。工总司成立时正是从白色恐怖里冲出来的老造反派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走资派手中夺权，走资派基本被揪出或靠边站的时期。人员大部分是即将崩溃的西安最大的保守派组织“工农总部”或过去受蒙蔽而保走资派的人。斗争目标直指“统指”“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工矿联”“农总会”等老造反派。口号是“坚决支持交大师生的革命行动”、“工人要说话工人要掌权”等。

“工总司”全名“西安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们要造的是老造反派的反，要把老造反派夺的权再夺回来或平分秋色。成立前，他们大造舆论“工矿联”是空架子，是“统指”的傀儡，成立后立即把斗争矛头指向老造反派组织。更露骨的是，他们口口声声支持“西交大”，对和“西交大”风雨同舟过的老造反派毫不手软，大打出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案。

因为西安大部分大专院校不支持李世英“三句半”的观点，感到孤立的老大哥“西交大”便竭力扶持支持自己观点的“工总司”及相继成立的“农总司”“机总司”等所谓新造反派组织，和他们一起与曾经的亲密战友对着干，争权夺利。党中央一再做工作都采用阳奉阴违的态度，置之度外。

以“统指”为首的老造反派没有识破他们的花招，对党中央的意图不理解，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大联合、大夺权”，尽快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而是一味“反右倾”批判李世英的“三句半”，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采取以争对争，以暴制暴的方法，使西安乃至陕西全省的局势越来越乱，武斗不断升级。当时，党中央领导是如何做西安地区造反派之间分歧的工作呢？

2月5日，陈毅接见西交大及西安医学院部分师生时的谈话中说：

马上就要搞春耕，抓生产，没有饭吃怎么办？起码西北局、省、市委活动起来，你们内部问题并不重要。你们有什么表示，可以使指挥部（即“统指”）一方满意？截止目前为止，他们对你们是不满意的。今天下午我同他们见个面，晚上两家见了面，不要吵起来，吵起来，我们就不好办啰！

把李世英的问题摆得比夺权还高，摆得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高，这个不对。

我的意见，大方向是一致的，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观点不一致，互相讨论，作些自我批评，不要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

西安的解放军要支持左派，但有两个左派，不能站到你们这方压对方，也不能帮助他们压你们。

不能在左派内部纠缠，那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你打我打是没有结果的。自己伤了自己。

李世英可能讲了错话，可以在内部自我批评。指挥部作法不好，他们作自我批评。你们不要去指责他们，不要互相攻击，文化革命中革命左派有分歧就非要对方投降，一讲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根本不是这回事，自己做自我批评就行了。掌了权，天天都会犯错误。

2月10日，陈毅接见西安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时的谈话：

造反派成立统一组织，辨别谁是造反派，防止你也去夺权，他也去夺权，防止“保”字派打起“造反”旗号，扰乱你们的阵营。

关于你们西安提出的三条要求，你们考虑交大同学能否接受，我看不大可能。你们若不善于大联合，将来掌权后会给自己造成混乱，你们得考虑后果。

中央要我解决西安问题，我总不能公公正正，不偏不倚。总之是为了大联合、大夺权。不要掌握权之后，为自己造成麻烦。

你们造反派有两派，斗争这么长的时间，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如果你们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这标志着你们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关心的。在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上，你们给全国树立个典型（范），但这不是和稀泥。

你们创造新形势，改变和防止你去接管他也去接管的混乱局面。几个主要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交大内部的事由他们去处理，革命群众自己会解决。

2月11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赴京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西安的群众基础好，内部斗争很激烈，你们政治上不仅占优势，人数上也占优势，组织上也占优势。现在夺权斗争落后了。有共性也有个性，各有各的特点，不过后来居上嘛！你们不要泄气。

看你们争来争去，在这些小事上争，争鸡毛蒜皮的事情，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你们的问题靠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教育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夺权也要靠自己。你们现在在街上互相斗，我是不同意的。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队伍真正的而不是假的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才有力量，才能推动省、市委领导同志出来亮相，推动军区左派出来支持你们，不然你们你争我抢，他们不好表态。不管怎么样，三结合总能实现，问题全在于你们自己。

2月14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和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的代表时批评道：“西安提出‘打、砸、抢’的口号是错误的”。他又苦口婆心地给双方代表做思想工作，要求大家“求同存异，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联合起来，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同时，对解决西安地区造反派内部的分歧提出两点意见：

在未解决问题以前，停止辩论，停止一切攻击，宣传车不要上街。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击国防工厂。

各位代表（包括西交大在内）向周总理提出“四条保证”，一定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

2月15日晚上，我刚躺下没多一会儿，学校广播里突然通知召开全校紧急会议，校文革会要布置紧急工作。原来，我们造反派今天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批斗刘兰涛大会。西交大不但不参加，反说我们召开这个会是“大阴谋”，明天要上街宣传揭露我们，扬言要先搞垮西工大、西军电等院校，再搞垮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工矿企业联合会和农民文革总会。校文革会动员全校师生立即行动，到大街上贴大标语和大字报，宣传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和西安造反派代表向周总理的“四条保证”，戳穿西交大的“阴谋”。同学们听完后，个个忿忿不平，很快行动起来，集合队伍浩浩荡荡开到市里去了。

开完会，我没有去市里，又睡了几个钟头就到吃饭时间了。我赶快起床到食堂吃饭，饭后拿起材料乘公交车赶到红旗机械厂，然后和黄炳球、陈美绍一起乘10点多的班车，晚饭前赶到三原县148厂。

上次来148厂，因为对工厂的情况不熟，缩手缩脚，对工厂一些人违反党中央“十六条”决定的行为也不敢说，什么也没干就走了。这次来，我们准备大干一场。我们3人已经商量好先组成一个战斗队，起名“永红战斗队”，再办一个“永红报”报栏为宣传阵地，宣传全国和西安的文化革命情况，宣传毛泽东思想、党中央的有关讲话和指示，宣传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为本厂的文化大革命作贡献。

第二天，我们到厂革委会与李向荣主任座谈，把这次来意、打算和对本厂文化革命的看法和她谈了谈。李

主任代表厂革委会表示热烈欢迎和支持。我们来时，带来一些大标语“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等，落款是“西工大永红战斗队”。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知道我们来了。下午，我们就把这些大标语贴了出去。

第三天上午，我们3人协商分工，我和黄炳球办“永红报”栏，陈美绍写、贴大字报。我们的《永红报》一贴出去，许多工人就围上来看。看样子，他们这里太偏僻，厂革委会也没有很好宣传，许多文化革命的情况都不知道，对我们写的内容很感兴趣。这让我们很高兴，信心和劲头更大了。

但自从我们来后，13车间的工人对我的态度和上次大不一样，一个个很冷淡，有的人好像故意回避我，不敢和我接近说心里话。我猜他们一定是回西安听到或看到一些谣传，不了解真实情况，认为我们西工大“糟得很”。要改变这种局面不是一件容易事，必须做好宣传工作，我们准备把西安的夺权情况，和西交大的分歧、争斗原因，特别是周总理的两点指示精神在《永红报》上好好宣传宣传。

下午，我正在车间干活，一个工人找我。原来，他是看了我们的《永红报》后慕名来找我的。他叫万吉祥，是五局三公司一处一队战斗队的负责人，想让我跟他谈谈西安的文化革命情况。我当然很乐意，我们走出车间，找了个向阳背风的墙根坐下。他先告诉了我他听到的谣传，接着，我说了事实真相，我们一直谈到天快黑。最后，他诚恳地约我晚上去给他们的战斗队谈谈。他们的战斗队原来是支持我们西工大的，一些工人从西安回来后，把看到和听到的谣传一散布，便怀疑西工大错了，不敢再支持了。他主动邀我去给战斗队的工人解释，这可是个难得的宣传机会，我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我来到三公司一处一队临时住的大房间。战斗队的工人都在这里，其他战斗队的工人听说后也来了不少。他们让我和万吉祥坐在中间的一张床上。我又把下午和万吉祥谈的内容说了一遍，还解释和回答了一些工人提出的其它问题。他们都非常客气、亲热，临走时，万吉祥把我送出好远，又站着谈了好久才恋恋不舍地分别。

2月19日，学校革委会突然通知我们回校，说是中央的指示。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当时为了制造舆论，当天晚上我和黄炳球写了很多大标语准备第二天贴出去。谁知，第二天刚把大标语贴好后，准备联系汽车下午回校时，我们同宿舍的谷成义来了。

谷成义告诉我们，2月18日西交大一手扶植的“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体育场东方红广播站人员大部分是我们“统指”的，他们反对西交大搞分裂活动，不让他们使用广播器材。西交大人火了，和一帮工人硬冲进去砸毁抢占了广播站，还砸毁了文艺兵团的宣传车，抢走了西安公路学院“红旗临委会”的宣传车。会后，他们又到大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坚决支持西交大的革命行动！”“誓作西交大革命师生的坚强后盾！”“工人要说话！工人要掌权！”“坚决反对打、砸、抢”……

他们的游行队伍经过东大街时，几个公安局的刑警从他们队伍中抓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张小林。这家伙也戴着“工总司”的袖章，正在跟着高呼“工人要说话工人要掌权”的口号时被拉了出来。西交大“向阳战斗队”的学生跑过来指责警察道：“你们为啥不等游行完再抓，现在抓不是成心破坏工人游行吗！”警察质问他：“让反革命分子参加游行？你们问一问工人们答应不答应。”游行的工人个个面面相觑，这几个学生脸红脖子粗支支吾吾不敢再说什么，眼巴巴地看着警察把张小林带走了。

第二天，“统指”“工矿联”“农总会”等革命造反派也在市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成立西安革命委员会而奋斗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44万人，在高呼“反右倾、反投降、反分裂”的激昂口号声中结束。会后，我们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西交大没有来参加。

谷成义说完情况，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走之前再出一期《永红报》，把我们的观点摆明，再提出一些问题，让工人同志们自己思考和选择到底应该支持谁。当晚，为了书写报刊文章，我们一直奋战到后半夜。第二天，我们的第二期也是最后一期《永红报》一贴出来，许多工人就围过来观看，互相议论。



## （十七）：疯狂的派性争斗

2月22日，我们回到西安市时惊喜地看到，大街上支持西交大的大标语不多了，相反，支持工矿企业联合会、文革农民总会、毛泽东思想捍卫军、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大标语多了。

回到学校后，我和黄炳球、陈美绍商量，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战斗队，仍然采用“永红战斗队”的名称，人数扩大了再选战斗队的负责人，反正干起来再说。他们两个非常拥护，便分头行动和班里的其他同学串连。

2月24日晚，“永红战斗队”正式成立，共有9个同学，大家选举张云忠同学为队长，商讨出今后的工作思路和计划。我觉得队员的心并不齐，好几个人不是实心实意为了更好地战斗而加入的，不过是随大流而已，但我想，只要我们几个人发挥好骨干作用，是会带动起来的。

第二天，我到大街上转，看到三五成群自称是工人农民的人在骂街。他们大骂“统指”的学生是“狗崽子”、“杂烩娃”等，博得一些逛大街的自称是“工农”人的喝彩和鼓掌。我一询问，方知明天“工总司”要开什么“加强工农联盟，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今天，他们出动许多宣传车和人在大街上张贴大标语、大字报造舆论准备。当晚，我回到学校后，听同学们说“工总司”还在大街上砸了西安邮电学校的宣传车。

因为“工总司”的成员很复杂，大部分人原来是保守派或参与过打击造反派的人，所以老造反派称他们是“大杂烩”。他们很忌讳这个称呼，当着他们的面，一般人是敢说不得的，否则会招来横祸。中学的学生娃娃们哪知天高地厚，竟敢当面揭他们的短，这就惹恼了他们。

2月26日上午，“工总司”开完“加强工农联盟，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后游行时，西安市七中“火种战斗队”的一些学生娃在路边冲着他们喊：“工总司是大杂烩！”游行队伍的人个个扭头怒目而视，几个工人冲着这些学生威胁道：“你们这帮杂种娃，想找死啊！”骂声未落，队伍中冲出一些人扑向那些个学生。这些学生一看不好赶快逃跑。但有几个跑得慢的，被他们抓着便暴打起来。这几个学生被打得直喊爹叫娘。忽然，一个穿皮鞋的工人竟然失去理性，恶狠狠地朝一个年仅13岁的学生踹了两脚。这个学生娃昏倒在地，他们还骂了声“狗杂种，看你还敢骂老子！”随后扬长而去。一些好心人赶快把这个孩子送进医院抢救，许多围观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等他们的游行队伍过去后，人们气愤地议论开了“简直没人性，和娃娃们斗啥气”，“这像是工人阶级干的事吗？真给工人丢脸！”“他们和‘工农总部’有啥两样。”…

2月27日晚，“工矿联”西郊二分会的工人们全体出动，高呼“反对大杂烩！打倒工总司！”的口号在大街上浩浩荡荡地游行，许多群众站在路边鼓掌，有的跟着呼口号。

就这样，西安市的大街上几乎天天有两派的游行队伍，街道上的群众也分两派，是自己支持的一派就在路边鼓掌叫好，不是自己支持的一派就反对，寻机谩骂、侮辱、殴打。一些小孩子受大人影响，也参与到两派斗争中。特别是火车站前的解放路，附近居民大部分是铁路系统的职工，他们中许多人加入了“工总司”组织。因此，该街道基本上是“工总司”的天下，老造反派的人经过解放路时，如果被他们识别出来就有可能遭殃。

3月1日下午，我到西交大看望从老家南召一中来的两个同学，当晚他俩就要乘火车回南召。吃了晚饭，我和高中时的同班同学西交大的李丰有、谷玉海和西安石油学院的尹笃春一起送他们俩去火车站。我和尹笃春是“统指”派的，李丰有和谷玉海对我们有些冷淡，昔日的亲密已经不再。为避免争论，我们都不提有关西安文化革命的话题。

我们走到解放路上时，看到我们“统指”某学校的造反派游行队伍正遭到“工总司”一伙人的围攻和殴打。当一辆载着解放军的宣传车过来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时，他们不仅毫不理睬，而且围着汽车，向上面站着的解放军吐唾沫、扔纸团、石头，解放军不理睬他们，始终巍然屹立在上面。忽然，有人用几尺长的棍子抛向游行队伍。我的心跟着“噔”的一下，看到好几个战友用手抱住头。

我们继续往前走时，又看到六七个小孩拿着很长的竹条往游行队伍里乱抽打。游行的人不敢还手，一个个抱着头赶快跑。队伍一下被打乱了，稀稀拉拉拖了好长。这些小孩更肆无忌惮了，一个比一个打得起劲。我们几个人不忍心看，加快步伐赶快绕着他们往火车站走。

行至西五路口，没想到这里围攻的人更多，有几个人正在扯游行队伍的红旗，把旗杆折断扔到路边踩踏，甚至有人窜到游行队伍里抓人，拉出来殴打。

我指着那打人场面问李丰有：“丰有，你看看，你们不是老喊反对打砸抢吗？他们就这样对待曾经是风雨同舟的战友吗？”李丰有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同意他们这样干，不过，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嘛。”

他竟能说出如此无情的话，使我十分痛心。尹笃春忿忿不平道：“这那像新中国发生的事，难道造反派游行有罪！看看这算啥话，公开在大街上打人，打的还都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你们学校还是老大哥呢，咋教其他大学信服？！”李丰有正准备辩护，南召来的两个同学拉着我们说：“好啦，好啦，别争了，何必为这事伤感情呢，咱们快走吧。”谷玉海也说：“咱们老同学别一见面就争，管他们咋闹哩。”我们都不再吭声，加快脚步默默地向火车站走去。

从车站回来时，我经过钟楼，看到一个人向一辆宣传车上扔带火的烟头，忍不住上前问：“唉，你为啥往上扔啊？”那人瞪我一眼：“管你什么屁事……”他话还没说完，一群气势汹汹的人围过来叫嚷道：“你是哪一派的？”“你是不是西工大的？”“你想干啥？”……

我心平气和地说：“你们别管我是那派，咱们是不是都要听毛主席的？”他们几个人齐声质问我：“你把话说清楚，谁不听毛主席的啊！我们就是在这儿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嘛。”我指了指那个扔烟的人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往人家宣传车上扔燃着的烟头，是按毛主席的话办事吗？”他们几个人立时无话可说，都不言语了。我又说：“咱们还不都是想把文化革命搞好，有啥意见咱就好好说嘛，咋辩论都行，咋能伤人呢？”看他们都不再吭声，我便扭头走了。

3月4日下午，学校革委会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党中央领导接见西安造反派代表时的谈话，只是传达要点，着重强调说：我们过去一直批判李世英的“三句半”右倾思潮，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自己人，斗争大方向错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按中央领导的要求，认真坐下来整风，检查错误，吸取教训等。

我们的“方向不对头”？难道西交大的斗争大方向对头？许多人转不过弯，吵吵嚷嚷，忿忿不平，纷纷质问文革会的负责人。后来，文革会的高志萍站出来解释一番。

他先吟诵一首毛主席的诗词《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民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然后解释道：我们之所以“方向不对头”，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僧是愚民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西交大是我们造反派的老大哥，是和我们一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杀过来的战友。李世英是受打击迫害最早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派反的学生领袖，是我们“统指”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他虽然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那是他没有认清“工总司”等假造反组织的真面目。但是，他毕竟是我们的战友，我们不能采用“千刀当刮唐僧肉”的办法，用对付保皇派的方法，针锋相对，使矛盾扩大化。特别是，我们过于感情冲动，提出“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的口号，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造成口实，并用来打击报复我们革命造反派、疯狂搞“打、砸、抢”。而我们置他们的疯狂反扑而不顾，一味地批判李世英和西交大的右倾思潮，这样作，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大方向对头吗？中央领导让我们坐下来整风，就是让我

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真正识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不要揪住朋友的缺点和错误不放，把敌人放在一边不管。经过高志萍同志的这番解释，大家的情绪才稍有好转。

自此，我们学校不再外出搞活动，坐下来老老实实整风，闭门思过。但是，一些保守派尤其是支持西交大的“工总司”幸灾乐祸起来，他们误认为中央领导单单批评了我们，说我们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甚至公开叫嚣要到西工大掀幕后策划者…同学们越想越憋不住气，越想越觉得我们太窝囊了。

第二天晚上，西安市儿童剧院的战友们来到我校为我们慰问演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来支持慰问我们，同学们激动地欢迎他们，夸他们不愧是风雨同舟的战友。演出前，他们先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成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虽然这些语录平时经常背诵，感受并不深，此时，倍感亲切，同学们的掌声和口号声经久不息。

## （十八）：造反派闭门思过

3月6日下午，校革委会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刚从北京回来的校革委会负责人孙福林，全面传达中央首长接见西安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其中周恩来接见“统指”和西交大代表时提出的六条要求如下：

1. 关于造反派内部分歧问题。要抓整风、整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
2. 打、砸、抢的问题。西安提出“打、砸、抢”是反动的。各校又提出“抓、揪、抄”，你们眼里没有党中央、毛主席。（总理谈到此时很气愤，并一个个提名指出，问“怎么办？”大家回答：“应受法律制裁”。）
3. 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总理传达了2月27日，毛主席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司令员既是军区的政委，又是一省的常委，他当然要保省委了，这就不能说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4. 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今后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有人说：“我们厂休日游行，不影响生产”。我就不相信不影响生产。对待是否“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和是否爱护国家财产，这是真革命、假革命的标志。
5. 对待解放军问题。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只要大方向正确解放军坚决支持，如果只剩下一个人，也坚决支持，如果大方不正确，那怕有十万、八万人，也是不支持的，要反对他们的。是否尊重解放军，这也是真假革命的标志。
6. 对待领导干部问题。对待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检查、赎罪的机会，要充分创造条件，给他们检查、揭发，让群众鉴定，是亮相的还是罢官的。斗争矛头绝不能针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

最后，孙福林安慰道：“中央首长对我们还是给予很大希望的，关键问题在于打砸抢问题上。中央首长的谈话主要是围绕这个打砸抢问题而批评我们的，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的爱护。一些同学本来是出自义愤说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结果，让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他们利用这个口号，不仅对我们革命造反派疯狂进行报复，而且还打着我们西工大、西军电的牌子进行破坏活动，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受到威胁，国家的财产受到严重破坏。因此，‘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已经成了一个极反动的口号，必须深刻揭露这个口号的破坏性和反动性，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口号的，把它批倒批臭，永远判处死刑。为了备战需要，西安的四大院校西交大、西工大、西军电和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在整风中还要进行军训。党中央将派人民解放军帮助我们整训。”同学们听后个个露出了笑脸，心里舒畅多了。

3月4日，我们学校刚开始闭门整风那几天，校园里贴出许多自己安慰自己、自己鼓励自己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如：“鹰有时比鸡飞得还底，但鸡永远不会比鹰飞得高。”“我们向真理低头，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但致死不向西交大支持的“工总司”低头、请罪，大杂烩组织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愿意在叫骂声中成长，不愿在鞭炮声中狂欢灭亡。”……

西安的大专院校对西交大都是口服心不服，对我们学校的忍辱负重、受窝囊气深表同情。每天都有大专院校来我校，以赠送毛主席、列宁等名人语录的方式，表达他们支持和鼓励我们学校的真挚感情。摘录如下：

西军电（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

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革命的战斗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毛泽东

西大（筹）：“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们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嗡嗡地叫着，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鲁迅

西医（临）“战犹酣”“从头越”战斗队：“不犯错误的人并不是聪明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但错误不是很重大同时又能迅速而且容易地纠正错误的人，才是聪明的人。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的。”——列宁

西安新政法（临）：“在这样艰难伟大和崭新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失策是在所难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中的困难，谁被这种困难所吓倒，谁见了这种困难就悲观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列宁

西安无线电学校红旗野战军：“真朋友可以共患难，假朋友却只能共安乐。一个同志顺利发展的时候可能有许多朋友，但当他犯了错误的时候便有一些人离开了他，或因怕沾染自己而离开，或因厌恶而离开，或因“划清界限”而离开。然而我想到，他犯了错误而仍是他的朋友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他不迁就也不原谅朋友的错误，比别人更严格地批评他。他不厌恶地逃避朋友的错误，而是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他坚持原则，然而决不幸灾乐祸。他指责错误但对朋友仍怀有感情。我希望这个原则应用于整风之中，纠正了错误，加强了团结。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姚文元

自从我们学校进入整风后，我们每天坐在宿舍里学习讨论，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认识错误的根源和如何改正错误，却整天围绕错误的性质，争论我们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校文革会的检查也没有什么诚意，给自己扣许多大帽子，什么无政府主义呀、宗派主义呀等等，然后说非常痛心、罪不可恕，不联系实际，不触及灵魂，空洞无物，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

在大讨论中，有些人玩弄概念游戏的上纲风，从某个人的思想动机推断到他干的某件错事，从这件错事推断到方向错误，从方向错误推断到路线错误，从路线错误推断到有幕后策划者……

有些人成为事后诸葛亮，把别人视作阿斗，说他们早就看出来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就是没听他们的话，铸成大错，致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于是，他们好像是局外人，一味谴责校文革会，一味追究这个人的什么责任那个人的什么责任。

有些人对中央领导的批评一直想不通，又怕别人说自己对抗党中央，不敢说自己想不通，便违心地装得像真想通了的样子。更可笑的是，个别人还装得一本正经地教训其他人，说其他人想不通是“私”字在作怪，应该好好“斗私批修”改造思想。

大部分人是随大流或“逍遥派”，墙头草随风倒，看风使舵，人云亦云。别人说想通了，他们也想通了，跟着说中央领导批评得对，我们确实错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应该老老实实承认错误，认认真真地检查错误，实实在在地改正错误。可是，当有人说想不通，我们明明是上了对方的圈套，是“打、砸、抢”的受害者，党中央却批评我们，让我们背这个黑锅时，许多人也觉得有道理，认为校文革会确实太窝囊了，强烈呼吁重新派代表到党中央去汇报，洗刷我们的冤屈。

总之，整风中形形色色的论调都有，有时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同学们的思想越整越混乱，越整越糊涂，许多同学发牢骚说，整风简直变成“整疯”了。

3月7日，毛主席发出指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3月8日，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陕西省军区、解放军21军、兰州军区空军、总后勤部驻西安办事处

联合组成“西安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训练指挥部”，并抽调 2059 名干部战士，首批进入西交大、西工大、西军电、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四所院校帮助整风和军训。

3 月 18 日上午，解放军 21 军进驻我们学校帮助整训，我们全校师生出动，排列在大门口内外的马路两旁等候。可是，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同学们情绪激昂，任凭雨淋丝毫不乱。10 点左右，解放军排着整齐的队伍进校了。他们个个淋得湿漉漉的，但仍然雄赳赳气昂昂的，不停高呼“向西工大革命师生学习！”“向西工大革命师生致敬！”。同学们激动异常，不停振臂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在校军乐队的带领下，解放军和同学们队伍陆续进入学校大操场，排列成整齐的方阵，共同召开“西安地区组训革命师生第二师成立大会”。大会持续近一个钟头，同学们和解放军一样，虽然都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却始终巍然不动，最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高昂的歌声和热烈的口号声中结束并井然有序地退场。



图 6 西安地区组训革命师生第二师成立大会在雨中进行

第二天，解放军分别到各班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和讨论。我们班来的是一位姓王的班长，四川人，个头不高，敦厚和气，总是笑眯眯的，非常平易近人。第一阶段是学习提高对整训的认识。我们每天学习党中央领导的有关讲话、毛主席有关著作和语录等。同学们有点拘谨，很少争论，都能平心静气地学习、交流体会和认识。第二阶段是理论联系实际，查找和分析存在的问题。一接触具体问题，同学们之间的思想分歧和争论又逐渐激烈起来。

## （十九）：思想斗争白热化

我们班的思想斗争也逐渐进入白热化状态。

我们宿舍的张希俊是陕西韩城人，也是从农村来的。他学习认真刻苦，待人热情，关心集体，但缺乏农村人那种忠厚淳朴的作风。他总怕别人笑话自己是农村人而瞧不起他，为此，有时显得有些做作甚至虚伪。有一次，我们班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他在会上介绍自己是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

一天，他在大街上碰到前面一位农民正吃力地拉着大粪车缓缓前行。他闻到臭烘烘的气味后赶快捂起鼻子。这时他突然想起毛主席教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以为很干净，其实，最干净的是农民，尽管他们脚上有牛粪。”马上认识到，自己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必须彻底改造。于是，他忽然就不感到臭了。为了有意改造自己，他还一直追着大粪车闻臭味。

这件事一直成为同学们私下的笑谈。

文革前，张希俊和我们同宿舍同学的关系还比较融洽。我们不叫他“希俊”而叫他“喜儿”。文革开始后，学校成立保守派组织“临委会”时，班里的大部分同学反对，唯独他公开站出来支持“临委会”。后来，他可能感到孤立，就和其他班的学生外出长征去了。学校开始整风时，他长征刚回来，立马变成诸葛亮教训起我们了。在讨论会上，他指责我们“都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别人的批评没有过火的”等等。

3月27日，张希俊写出一份很长的大字报，腔调唱得很高，好像就他最冤屈、最正确、最革命似的。但是，我们觉得他的大字报空洞无物、牵强附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不知情人看了，好像他是一个侠客在打抱不平，知情人一看便知道他满文贯穿了发泄私愤、申冤叫屈的内容。他的主观愿望可能是站在革命立场上为革命利益写的，但其实质却是站在个人立场为了个人利益和反动路线说话的。

我是个心里存不住东西、说话比较直的人，就站出来和他争论，甚至批判他的观点。他激动得脸红脖子粗，和我争吵得不亦乐乎。当晚，我们宿舍的同学在向毛主席的晚汇报上，互相开展起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每个同学都谈出了心里话，甚至达到了触及灵魂的程度。张希俊给我提出了尖刻的批评，一是自私自利；二是搞宗派主义。我在检讨完自己的错误后，也对张希俊提出了尖锐批评，可能许多用词不太恰当。他虽然没有为自己过多的辩护，但从他满脸通红，不断渗出汗水的表情看，心里有些怨恨不服气。

我们班惟一的女同学曹淑媛（还有一位女同学因病长期住院）也参加了这个会。她是一位心地善良、说话直来直去的人。但是，她又是一个老好人，从不参与争论。在同学们互相争论时，她从来不表示自己的观点。看到我们之间展开激烈的相互批评，如此尖锐不讲情面，她可能有许多话憋在肚里没法说，竟然激动地哭起来了。现在想想，我们那时的认真劲实在可笑。

就这样，我们同学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关系越来越紧张。不过，进驻我们学校的解放军是野战军，对我们比较同情，没有指责我们，而是认认真真地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和同学们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

但是，有的学校，本来一些保守组织和倾向保守派组织的同学借助整风横加指责造反派，要和造反派算账。再加上支左的部队是地方军队，受地方派性影响，他们支持一派压制打击另一派，而且恰恰压制打击的大部分是真正的造反派。更严重的是，一些保守派势力比较大的省市，如河南、四川、山东、湖北、湖南等地，竟把造反派重新打成反革命，残酷镇压，实行白色恐怖，全国各地告急。

3月26日，我和璩金生到西交大看望高中同学时，听到一个家乡消息。河南的革命造反派都被保皇势力摧垮了。我们南召一中的造反派组织“联络委员会”和“造反委员会”也被摧垮了，造反派头头和骨干被斗

被捕，过去保工作队的人现在又神气十足起来。

详情是这样的，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郑州地区造反派在大联合并向走资派夺权中也产生了分歧。地方军队介入后使之迅速分裂为两派。2月7日，以郑大联委为首的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河南二七公社”。同时，“郑工造反派”和“中医学院八三一”等，在省军区的支持下联合成立了“河南省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造总”）。他们和保守派组织“郑大战斗师”、“省直造总”等“十大总部”联合起来镇压“二七公社”。

3月6日，省军区驻军和“河造总”、“十大总部”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告全省人民书》。郑州市公安局发出四条《通令》：

1. “郑大联委”必须遵照军区决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该组织中的头头必须交代幕后策划人，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
2. “郑大联委”中的头头限于本月15日前来郑州市公安局进行登记。他们的一切文件、资料、物资等必须全部交出，不准转移，不准销毁。
3. 凡是为他们保存文件、资料、物资的单位、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资料全部交出。
4. 受他们欺骗蒙蔽的群众要迅速觉醒，揭发他们的一切罪恶事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省公安厅保守组织“公安公社”和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并在生活区树起“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同时，要求他们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48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党言川、陈红兵、申茂功等造反派头头相继被捕、游街示众后投入监狱。受其影响，全省各地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统统被宣布解散，主要头头和骨干分子被逮捕入狱。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双方到北京汇报。可是，军区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判，竟然支持“十大总部”多次挑起武斗，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公社”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的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白色恐怖笼罩河南各地。

3月30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和《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该文章指出：

一小撮刚刚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死心。他们惊魂稍定，立即同各种反动势力结合起来，掀起了一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时机已到，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竭力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妄图抽去它的革命灵魂，使它成为“合二而一”的大杂烩。他们千方百计挑拨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利用他们的影响，大搞调和主义、折中主义，指使他们的同伙，混进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有的甚至公然叫嚣，要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大作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歪曲事实，制造谎言，拉一帮打一帮，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竭力往革命闯将的脸上抹黑，说那个人“出身成份不纯”，那个人“造反动机不良”，那个人“怀有个人野心”；他们利用过去的影响，暗中操纵，积极复活“保字号”组织；有些人甚至公然威胁曾经批判、斗争过他们的革命群众组织，说什么“过去你们斗了我，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该是和你们算账的时候了。”“不能等到秋后算账，现在就得算，马上兑现”如此等等。该文章最后指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阶段的新的战斗任务是边整风边战斗。

受这篇文章的影响，当天，学校里贴出许多大字报，对整风提出质疑，现摘录三篇如下：



## 整风向何方？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王效禹同志所写的《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的文章写得何等好啊！他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士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而我们呢，整天关在屋里整风整风，两耳不闻窗外事，风雨不动安如山，对社会动向一概不了解，越整越被动，真不知整风向何处去？

边整风边战斗是形势的需要，是阶级斗争的需要。这样做不会影响我们整风，反而会促进我们更好地整风，给整风增添新的内容。有人说：“你们提出边整风边战斗就是不安心整风”。我们就是不安心，形势的发展不能使我们安心。我们能看着阶级敌人正在进行阶级报复、复辟资本主义而熟视无睹吗？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战斗，如果只整风不战斗，等整好了，阶级敌人的阴谋也得逞了，整风还有何意义。

群众不愿意干的事情硬要领着去干，那是冒险主义，其结果必然要失败。群众觉悟起来了，迫切要求前进的时候，领导上不前进那是机会主义。师部和校文革应当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不要作群众运动的尾巴，相信群众会正确处理整风和战斗的关系的，是会在大风大浪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冲刷掉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的。

我们应该边整风边战斗，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粉碎全国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但是，我们很痛心，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能挺身而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

##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有人提出“反革命逆流终究不会变成主流”。这个想法实在太幼稚可笑了。然而，这样的糊涂虫毕竟还是有的，我们有必要纠正这种糊涂想法，让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时候天明，反正天总要明的，只要你安心地躺下，舒舒服服、无忧无虑地睡上一觉，天自然就明了。如果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像睡觉一样，我们便可安心地整天坐在屋子里学习、讨论，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两耳不闻国家事，哪管天下秋与冬，反正反革命的逆流不会变成主流，社会总会向前发展的，那该多理想啊！可是，这个想法太幼稚可笑了。

## 谈“书生气”

有的人书生气十足起来，说什么只要我们每个单位都把风整好了，破私立公了，一下子就联合起来了。我看还不如说我们现在别搞文化大革命了，先坐下来整风，等整好风了，人人都破私立公了再搞文化大革命，那样就不会犯错误了。果真那样，人人都公字当头了，阶级也就消灭了，再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还革谁的命？

近些天，我们整天坐在哪里讨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罪状什么的，实际情况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革命路线已处于决战时刻，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已在袭击我们。正像一个书生谈虎一样，老虎已经张

牙舞爪地扑来，他还悠然自得地在哪儿数老虎有几颗牙齿，观察它有什么厉害，这不是很危险吗？

4月2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中指出：

目前出现的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利用革命小将中的一些缺点尽量夸大，把革命小将一棍子打死，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文化大革命夭折。我们能答应吗？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文化大革命。

同学们听了，心情非常激动，真是说到我们心坎里了。当天下午，在同学们的一再呼声下，师部不得不答应同学们的要求，全校师生和解放军全部出动，威风凛凛地到大街上游行示威，欢呼《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发表。

从此，平静了近一个月的西安古城又热闹起来了。

## （二十）：军队支左现偏差

毛主席曾讲过：“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

——屈元《竹幕后的真相》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夺权阶段和军队介入，也许并不是毛主席的初衷，而是他始料未及的。军队支左、军管、军训的目的是让军队帮助造反派整风，使造反派冷静下来，修正错误，吸取经验教训，消除分歧，团结对敌，尽快实现大联合，早日成立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然后进入“斗、批、改”，结束文革“抓革命、促生产”。

但军队尤其是地方武装（包括公安干警）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在“支左”中面临一个识别谁是“左派”的问题，何况他们中的领导和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造反派中的人员大部分是无权的思想激进的普通青年群众，而保守派中的人员大多是党员干部和思想保守听话的年长群众。因此，他们大部分选择了支持以保守派为主的新成立的改头换面的所谓造反派，并利用专政工具打击、迫害真正的造反派，并想方设法摧毁矛头始终对准当权派的造反派组织。军队的介入使军队内部也产生分化，使问题更加复杂，派性斗争更加激烈，以至发展到恶性武斗。

事情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尽管当时社会乱象丛生，但归根结底都是围绕一个“权”字，即夺权、保权、争权。社会最乱人们最疯狂的时期是1966年8月至1968年8月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这一段，一旦走资派彻底被打倒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社会就风平浪静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都是被操纵和利用的工具。现在的当权派何尝不是这样呢？权能变钱，为“权”，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

4月1日，戚本禹发表评“清宫秘史”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资产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自此，全国掀起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高潮，并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月4日，我校同学听说第二天要召开全市批判“刘、邓”大会，并由“工总司”代表工人发言，非常气愤，纷纷写造反声明。他们在声明中说，明天若按原计划开会，将拒绝参加大会，并为某些人制造这种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大会不让“工企联”发言，就是否定“工企联”，就是替刘兰涛翻案，就是否定西安的文化大革命。“工企联”是在去年八九月份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最深。他们最有资格代表工人揭发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总司”是大联合和夺权斗争时的分裂产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杂烩组织。它从成立那天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造反派和人民解放军，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工人发言。

经过同学们的抗争，终于迫使校革委会改变计划，通知第二天的大会不开了。

4月7日，西交大和“工总司”“农总司”“机总司”“文总司”在新城广场召开批判刘、邓大会。我们“统指”“工企联”“农总会”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没有参加，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但是，他们这个分裂的大会竟然得到了军区的批准，并把全市的广播借给他们使用。同学们被激怒了，几天来，校内张贴出许多揭发军区某些领导人问题的大字报，怀疑军区的某些负责人是刘少奇、刘兰涛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的人。

4月9日，我们学校和交大针锋相对，由“工企联”“农总会”“造反司令部”“统指”等25个单位联合召开批判刘、邓大会，解放军也参加了。西交大和“工总司”“农总司”等派代表参加，由“工企联”代表工人、“农总会”代表农民发言。参加大会的人数达55万多，声势异常浩大。这不仅是一个批判的大会，也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联合的大会。虽然中途下了大雨，我们的衣服淋湿了，但与会人员 and 解放军一样毫不动摇，任凭风吹雨打，一直站在雨地里坚持把大会开完。

4月10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该社论指出：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极力混淆黑白、颠倒是非，造谣惑众，挑拨离间，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妄图破坏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血肉关系，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该社论还号召解放军战士：

要自觉地、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左派和广大群众。

要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边，绝不能有半点含糊。

一定要想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之所想，急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之所急，和他们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作他们的坚强后盾。

而决不可干出打击革命左派，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的事。

这篇社论在同学们中引起强烈反响，无不称赞发表得如此及时，何等好啊！它说出了我们革命造反派几个月来不敢说的心里话。回想近几个月的斗争历程，我们无不为之愤怒。军区和西交大步步引我们上钩，使我们犯错误。我们犯错误后，又极力打击我们，企图把我们搞垮。从军区对我们革命造反派五大组织的态度和对待反动组织“红色恐怖队”、“工农总部”和大杂烩组织“工总司”“农总司”“机总司”等五个总司的态度可以断言，军区内一定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捣鬼。我们是革命左派，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人民解放军给我们作坚强后盾，一定要穷追猛打，彻底捣毁刘家黑店、挖出刘家黑线。

当晚，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冲出校门，挣脱校文革会和师部的束缚，和西军电、西大冲出校园的同学们汇合一起，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奔向大街游行示威，热烈欢呼解放军报《社论》的发表。

4月10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指出：

阶级敌人最害怕人民解放军，最害怕有军队干部参加的革命的‘三结合’。他们费尽心机制造流言蜚语，捏造事实，妄图挑拨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对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必须给以充分揭露和坚决的打击。

在某些地方，由于阶级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当地部队的某些同志，也可能在支援工作中，犯暂时的错误。但决不是说当地部队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像赵永夫式的篡军分子，在支援中一直犯严重错误，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甚至利用专政工具镇压群众。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真正的革命左派应该善意地采取适当的方式，向部队负责同志说明情况，提出意见，而绝不应

该采取公开对抗的态度，更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阶级敌人所利用。

几天来，我们学校出现许多揭发军区某些负责人的大字报。其中一篇大字报如下：

## 驳几种奇谈怪论

同学们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为了彻底摧毁刘家王朝，为了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发扬去年8月的革命造反精神，天不怕、地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为革命在所不惜。他们的行动好得很！你是一个革命者就会拍手称快。你是一个不革命者就会横加指责。你是一个反革命者，就会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有人跳出来指责我们说：“你们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这样有损解放军的威望”。我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矛头指向了解放军”。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中明明指出“阶级敌人最害怕人民解放军，最害怕有军队干部参加的革命的‘三结合’。他们费尽心机制造流言蜚语，捏造事实，妄图挑拨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说这种话的人就没有动脑筋想一想，我们所揭发的问题是否是费尽心机制造的流言蜚语，捏造的事实？是否要挑拨解放军同革命造反派群众的关系？我们是否是阶级敌人。

大家都很清楚，是谁对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是谁对侮辱、谩骂、殴打773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反革命行为熟视无睹甚至造谣污蔑？是谁别有用心地抓住我们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不放，制造流言蜚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费尽心机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极力夸大，肆意歪曲，拼命往我们脸上抹黑，企图挑拨离间我们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一棍子把我们打死？正是省军区中的一小撮坏家伙，他们就是《解放军报》社论中指出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给我们扣的这些帽子早已不新鲜了，社会上早就有流言蜚语说“西工大、西军电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了”“对抗军区，冲击军区了”等等。事实是，我们把斗争矛头指向的是左右西安文化大革命的省军区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虽然是省军区的负责人，但决不能代表解放军，更不能自称是解放军的化身。刘兰涛不是兰州军区的负责人吗？霍士廉和“8.26事件”中的李一松不也是省军区的负责人吗？若说他们代表解放军的话，那么，我们早就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了。

我们是如何对待军区的？是我们没有向军区说明情况吗？是我们没有善意地采取适当方式反映情况吗？是我们采取了对抗的态度吗？我们连罪都请了，就差没有下跪了。近几个月来，省军区的某些领导人已经成了我们的“最高统帅”，把我们的命运和西安的文化大革命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了。我们干什么都得经他们批准，甚至连说句话也得经他们批准。

大家都很清楚，是谁对反动组织无动于衷甚至竭力扶植已经垮台的铁杆保皇派组织“红恐队”使其死灰复燃、重新抬头？是谁支持几个工厂的保守派，解散造反派？是谁给“农总司”“机总司”写信并支持他们？是谁恐吓“农总会”负责人田杏云？是谁压制我们革命造反派借口“还没有定性”不让我们点名批判刘少奇？…不是别人，正是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代表不了解放军，他们是解放军中的败类。他们别有用心地把这些坏事强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头上，我们决不答应。

我们坚信，解放军战士一定会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毫不含糊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全心全意地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把这一小撮混在解放军队伍中的败类揪出来，维护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谁挑拨解放军同我们的关系，甚至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冲击军事机关，我们坚决和他们斗争到底。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因怕敌人捣乱而不敢动。

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和解放军战士紧密地团结起来，彻底摧毁刘家黑店，扫除我们大联合中的主要障碍，为建立新西安革命委员会而努力奋斗吧！

4月11日，校文革会决定把揭发军区某些负责人问题的大字报贴到教学区去，说什么要为军区保密，但遭到许多同学反对。同学们的意见有三条：其一是不应该保密，越保越神秘；其二是我校能保密就可以写大字报揭发军区的问题，其他学校不能保密就不让揭发军区的问题吗？其三是全校师生都可以出入教学区，根本就保不了密。校文革会看那么多同学反对，就自动撤销了这个决定。

4月13日，我校的大字报骤然增多，许多大字报写出了造反派的心里话，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可能造反派的心情和我们前一阶段一样着急、盲从，不知西安的斗争向何处发展，所以，到我校和西军电、西大看大字报的人非常多，拥挤不堪，他们绝大多数是被压抑的革命造反派。

当天，我们听说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和21军军长胡炜要来我校，听取校文革会负责人反映揭发省军区的问题。为此，校内又贴出两封给黄司令员和胡军长的公开信，质量很高，看的人也很多，我也挤不到跟前。可是，晚上又听广播中说，我校已派代表前往驻军向他们反映情况。于是，学生们便都翘首以待，看两位军队首长听取我们反映后的态度如何。

## （二十一）：从陕西闹到河南

4月14日晚上，校文革会给我们传达黄司令员、胡军长接见我校和西军电代表的情况。接见我们的军队首长除黄司令员、胡军长外还有省军区袁政委、支左委员会的负责人和红旗杂志社的一位记者。我方代表24人，其中我校14人，西军电10人。我们反映的问题很多，主要有：

1. 西安“农总会”负责人田杏云在北京受到王副司令员威吓的问题。
2. 西安“红恐队”死灰复燃和北京“联动”的问题。
3. 省军区某负责人对我校和西军电负责人训话的问题。
4. 关于放走在《陕西日报》社门前书写反动口号人的问题和接管《陕西日报》社的问题。
5. 我校保皇派干将王应魁升官的问题。
6. 关于省军区发布的《通告》问题。
7. 省军区某负责人到西安工业学院和某工厂讲演的问题。
8. 关于打击西安市七中造反派组织“火种战斗队”问题。
9. 省军区给西安“农总司”的信件和支持“机总司”的问题。
10. 关于2月5日省军区副政委肖潮之死的问题。

驻军领导非常重视这些问题，黄司令员和胡军长亲自记录，并初步表态如下：

1. 大联合要以我们的“统指”“工矿联”“农总会”等五大革命造反组织为核心，团结交大。
2. “工企联”是一个斗争历史悠久的革命造反组织。
3. 对“工总司”要调查，暂不表态。
4. 省军区孙喜岱的某些讲话是错误的。
5. 对“红恐队”要反击。
6. 坚决反对某些人借革命造反派犯一些错误之机，趁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企图把革命造反组织搞垮的做法……

同学们听完传达报告后，都感到驻军是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心里非常高兴。4月23日，毛主席在《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上报材料中的几段批语连同材料一起批复给林彪和周恩来如下：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

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上报材料和毛主席的批注如下：

## 《4月20日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首长胡炜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大革命派，交大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主席注）

黄经耀、胡炜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和胡炜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主席注）

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如下：

1. 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
2. 对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
3. 对保守派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
4. 部队要帮助工总司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
5. 抓好活思想。
6. 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主席注）
7. 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主席注）
8. 没有记录

黄经耀、胡炜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四月二十一日召集西工大、西电、冶院和交大四大院校的负责人，就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陕西省驻军在以后的支左工作中，虚心听取两派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耐心细致地做两派的思想工作，尽力化解双方的矛盾，促进双方的大联合。

之后，尽管双方的分歧和对立情绪并没有完全消除，但西安的局势暂时趋于稳定。但是，河南的情况就不一样了。4月15日，我收到初中同学马云立的来信，告诉我家乡的文化革命情况非常糟。我们南河店公社的干部竟然带领各大队的群众冲击南召四中，逼迫四中的造反派组织“文革会”和“红教联”解散、交出公章，甚至把几个学生头头拉出来斗争游街，殴打学生。这是什么行为？

他的来信使我认识到，河南的革命造反派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我实在为河南和南召的文化大革命担忧，便利用午觉时间，一气给马云立写了8页回信，并把《解放军报》社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剪下来寄给他，争取能使他转过弯来，起码不要参与打击革命造反派的行为。



第二天，我和高中同学璩金生一起到西交大、西安公路学院、西安石油学院串联。李丰有、谷玉海、王玉申、尹笃春、毛振宇我们7个高中时的同学一起商量，立即写一个“声援书”寄给南召一中，坚决支持他们的“联委”和“造委”。“声援书”明确指出，河南军区抛出的所谓声明是一株不折不扣的大毒草，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宣言书和信号弹。“联委”是南召一中第一个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为南召县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谁否认他，就是否认南召的文化大革命。



图7 南召一中甲班在西安的同学合影  
(前排左起王玉申(已故)、璩金生、谷玉海；  
后排左起李丰有(已故)、尹笃春、田玉振、毛振宇)

4月23日，我收到马运立的回信和南召一中语文老师王永华的来信。从他们的来信中看出，河南的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俩虽然没有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但思想是倾向于革命造反派的。马运立的进步很大，认识提高了许多。我继续回信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吸取经验教训，早日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关于河南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有一份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如下：

## 毛主席啊！河南人民想念您！

——侧记河南的白色恐怖

目前，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正在河南泛滥！河南告急！

毛主席啊！毛主席！处在白色恐怖中的河南人民想念你！顽强奋斗的二·七公社的战友们想念你！河南五千万人民眼望着北京，盼望着听到您老人家的声音！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八个月的战斗中，郑大革联的战友们，河南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同志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敢打、敢拼、敢革命、敢造反！他们向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为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怎能忘记啊！二月七日这一天，就在“二·七”大罢工的圣地——郑州，红旗漫卷，锣鼓喧

天，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了大联合，“二七公社”诞生了！然而，革命正在蓬勃发展，革命派的大联合正在进一步形成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凭着他们反革命的嗅觉，感觉到朝不保夕，马上就要彻底完蛋了，于是，便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拼死同革命派进行斗争，一时，黑云滚滚，妖雾弥漫，白色恐怖再一次笼罩着河南，一场大厮杀又要开始了！

风云突变！几天时间内，郑州市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均被保皇派砸了一遍！

3月5日晚，郑大革联门口，一辆吉普车嘎然而止，从中跳出4个人，对郑大革联下达通牒：“明天我们要开大会，不许你们捣乱，如果破坏会场，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3月6日上午，我们在郑大革联与党言川交谈。党言川，他中等个子，蓬松的头发，戴着眼镜，摸着长头发对我们说：“过去，我们有些作法不对，今后应尽力与军区搞好关系，然后搞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正在这时，门外人声嘈杂，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把郑大革联包围了！保皇师的广播车疯狂地叫骂：“郑大革联是非法组织！要坚决取缔郑大革联！”…

保皇师的干将在外大叫大嚷，并强行冲入搜查，情况万分紧急。在匆忙之间，党言川写了封简信，并把郑大革联的印信交给我们，托我们带出。说时迟那时快，保皇师一窝蜂似地破门而入就要绑架党言川。“把我们的情况带给中央！”党言川仅来得及说出这么一句心里话，就被绑架走了！

“别了！同志！别了，亲爱的战友！暂时的分别并没有什么！地质东方红的战士坚决地支持你们！坚决与郑大革联并肩战斗！”我们充满必胜的信心，背起书包，带着郑大革联战友们的委托，大步向门口走去。要出门时，保皇小丑们瞪大眼睛疯狂地吼道：“一律不许走！”好一幅看门狗似的耀武扬威！“告诉你们，你们没有权利戒严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保皇派毕竟是保皇派，在我们的凛然正气面前，他们不得已而退后一步，让我们登记一下。向老保登记是对地质东方红的污蔑！“要写，你自己写去！”于是，我们昂然地跨出了革联的大门。

我们刚走出不久，保皇师们由于没有搜到革联的印信，便望眼欲穿地死命盯着我们的书包。他们派出大批侦探盯梢、跟踪，甚至要强行搜查！一场激烈的斗争开始了！

在一大群保皇卫士们的“保护”之下，我们来到郑大门口，门口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仅留一个门洞供钻来钻去，两侧还立着几十位打手。大门不让走，我们走旁门！这下可忙坏了保皇师，几十个人往返“护送”。可怜的保皇师，动手抢吧，又不敢，放我们走吧，心不甘！只得甘当我们的“随从”，在郑大周游了5个小时！

为了不辜负战友们的委托，为了带出郑大革联的印信，我们决定打开书包让校门栅栏外边的广大群众看一看。我们打开书包，在众目睽睽之下，保皇小丑们不敢细看，只得允许我们出去。我们胜利了！我们雄赳赳地跨出了郑大的大门！

这是一件小事，它比起河南革命造反派的斗争业绩，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本不值得一提。但是，我们写出来，是给那些保皇小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你们跳吧！骂吧！跟踪吧！盯梢吧！就在你们几百人的重围之中，我们4名地质东方红战士通过你们的层层搜查，终于带出了革联的印信，这不是对你们绝大的讽刺吗？

我们写出来，是让郑大革联的战友们看到，这是我们对自已战友的支持！顽强战斗，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我们写出来，是让“二七公社”的工人、农民同志们看到，地质东方红的战士永远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革命的战友们，同志们，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郑州，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并没有屈服。为

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正在浴血战斗！

3月6日，郑大附中红旗等“二七公社”的小将们，冲破郑大的围墙，冲入郑大，冲入党言川被囚的楼房，向党言川告别！他们把心爱的语录牌和毛主席像送给党言川！是他们，在楼下给党言川扔馒头，让党言川“不吃保皇派的馍！”是他们，在房上写下了巨大的标语：“二七”公社必胜！然而，战斗师却对这些红小将恨之入骨，对他们连推带打，使他们的鲜血洒在郑大的土地上！

3月6日，郑州，黑沉沉的夜！

消息传来，党言川被打，凌晨4点，失踪！粮院革命造反派被砸！河医东方红被砸！……多少人彻夜未眠！多少人对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像片，热泪夺眶而出！

3月7日，各厂革命造反派的广播均被管制，并强迫命令他们解散加入保皇组织！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有的在睡梦中被抓去；有的，在车床边被抓走；……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种种借口……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河南五千万人民是怎样地盼望啊，盼望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忘不了，在郑大被围的那天，一个衣服被撕烂的同学，不顾战斗师的监视，拉着我们说：“你们回到北京，千万别忘了把我们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我们忘不了，我们临走前，国棉一厂的革命工人保护着我们，送我们到车站，帮我们甩开盯梢的小丑，直到深夜4点。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使他们凌晨六点半钟还要赶回车间，为国家创造新的财富！我们忘不了，国棉一厂的一位老工人颤巍巍地捧起毛主席像，含着眼泪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日夜想念你啊！”我们忘不了，一位工人同志含着眼泪说：“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指保守组织），杀头我也不干！”

当我们提笔写到这里，心头压不住满腔的愤恨，现在，河南革命派的战友，我们共同浴血奋战的同志，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被逮捕，遭毒打，受迫害！而那些保来保去，一保到底的保皇干将却死灰复燃，成为当然的“左派”，甚嚣尘上，耀武扬威，毒打郑大革联的战友，是可忍，孰不可忍！

何XX，这个在河南十余年的老混蛋，当初和吴芝圃一起打击迫害潘复生同志，今天又妄图搞垮刘建勋同志。正是这个败类，开动造谣机器，蒙蔽广大人民，残酷镇压革命派，实行反革命复辟。其用心何其毒也！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时的猖狂，丝毫不表明他们的强大，却充分说明，他们的末日就要到来了！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五千万河南人民！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在中原大地高高飘扬！

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豫战斗队

1967年4月12日

4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刘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而“河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省委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大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尉屏也应邀参加大会。另一方面，他们派人到北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 （二十二）：军队撤离

4月24日，帮助我们整训的解放军要撤走了。我校在大操场隆重举行“庆祝整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大会。会上，师首长和解放军代表对我校的文化大革命评价很高。

他们讲到，从进校帮助我们西工大整训以来，在共同的学习和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和革命友谊。他们深受我们革命行动的感动和教育。特别是整训刚开始时，省军区和西交大曾印发和张贴矛头对准我们西工大、西军电等革命造反派的“声明”、“通告”和大字报，同学们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集中精力整风，没有回击，没有受到他们的干扰和影响，充分说明了西工大同学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决心。与此相反，同学们高举大联合的旗帜，主动和西交大进行联合，共同成立了“西交大、西工大联合战斗团”。西工大和西安各院校特别是和西军电、西大，在战斗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解放军也在享受这种友谊中深受感动。他们希望我们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吸取经验教训，在什么地方跌倒了，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并明确表态，坚决支持我们西工大的革命行动，誓作西工大同学们的坚强后盾。

会议结束后，我们全校出动，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革命的战斗友谊万岁！”等口号，一直把解放军送到驻地——西北局党校门口。

解放军撤离大学后，西安的两派仍然是面和心不和、明争暗斗，4月27日，两派的争斗异常激烈，以至惊动了周总理。

这天上午，西工大等40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发起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三反分子刘澜涛大会”。但是，西交大竭力阻挠这个大会的召开。大会主席团经过反复斗争取得了胜利。黄司令员和胡军长答应把东方红广播站给大会使用，并在11点半以前把刘澜涛交到大会接受批判。

但是，会议开始不久就遭到破坏，有人把外线掐断了。大会主席团经过好长时间斗争，下午两点左右，外线的喇叭终于响了。我们正准备开会，突然又不响了，一直折腾到天黑也没解决问题。后来，大会主席团决定暂时把宣传车串联起来继续开会。刚开不久，省军区来两个人告诉大会主席团说：“周总理打来紧急电话指示，要军区出面，建议此会最好不要开，或者双方合开，或者以后再开。”

大会主席团认为，周总理的指示与实际情况不符。我们和西交大、“工总司”并没有发生冲突和摩擦，主要问题是有坏人故意破坏。如果批判大会半途而废，无疑助长了刘澜涛之流的志气，灭了革命造反派的威风。但我们又不能不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因此，大会主席团经研究决定，大会继续开，不用全市的有线广播，仍然用串联的宣传车，并把这里的情况立即汇报给驻军首长和中央文革小组。

大会终于在曲曲折折的困难情况下胜利结束了，但与会者无不西交大和“工总司”的百般阻挠和破坏而义愤填膺。在游行时，与会者不断高呼“打倒刘澜涛，气死保皇派！”“会议开成功，气死麻花兵！”“革命大联合，打倒大杂烩！”等口号。这天发生的事也使驻军首长亲眼目睹了派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4月28日。西工大文革会领导班子的革命三结合出现了新高潮。同学们一致要求把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寿松涛作为三结合对象。文化革命以来，寿松涛校长能及早认识自己的错误，主动写检查并引火烧身，让广大师生揭发批判自己的错误。他一直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压制、排挤和打击，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始终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与同学们同呼吸共命运，为文化革命立下了新功。同学们一致认为，像寿松涛这样的革命老将在全省是少有的，他是人民的宝贵财富，应该及早解放出来。

校文革会根据同学们的一致要求，决定立即筹备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并上报国防科委和有关部门领导批准。但是，正在我们一心一意筹备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之际，西交大又来干扰了。4月29日，校园内贴出一些大字报，揭发并提醒同学们不要上当受骗。其中一篇如下：

## 贼喊捉贼的西交大

最近，西交大又放出了贼喊捉贼的空气。他们大喊什么“反对内战”呀，“不准把斗争矛头对准群众”呀等等。

可爱的先生们，这次我们再也不上你们的当了。反右倾时，就是你们的“遍身赤战斗队”挑起了内战，就是你们用“陈、杨信件”挑起了宗派斗争。但你们却高喊“内战是你们挑起的”，“反对宗派”等等。那时候，我们笨蛋，上了你们的当，跟着你们的指挥棒跑，犯了方向性错误。

今天，你们为了挽救“工总司”即将灭亡的命运，为了缓和“工总司”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又放出了这个空气。我们已经吃过一次苦头了，已经比较地聪明了，要我们再上当那是痴心妄想。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掌稳舵，朝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前进！

我们在西安的高中同学早就约好“五一节”到大雁塔聚会照合影相。5月1日早饭后，我和璩金生动身去大雁塔。我们赶到时，已经近10钟了。他们早就到了，正在等我们俩。其中西交大的同学7个，除我们高中同班的李丰有、谷玉海、王玉申外还有上届的4个同学，加上西安石油学院的尹笃春、西安公路学院的毛振宇，共11个同学。但是，我们的观点和意见不一致，西交大7个人一派，我和璩金生、尹笃春、毛振宇属“统指”派，和他们7人根本谈不到一块，一谈起西安的文化革命便吵起来。不过，在对待河南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有李丰有消极些，其他人都很积极。照完合影像后，我们又互相交谈一会河南的文化革命情况便分散了。

不知怎么回事，帮助我们整训的解放军要调宁夏去，而且5月6日就要乘火车离开。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听说后，个个心里很不是滋味，非常难受，因为我们与解放军在共同的战斗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亲密友谊。同时，同学们又疑虑重重，为什么在两派还未真正实现大联合、争斗仍在继续的节骨眼上，偏偏把帮助我们整训的解放军调走了呢？我们以后依靠谁呢？有冤屈向谁反映和诉说呢？



图 8 西工大师生在西安火车站送别帮助整训的解放军

午饭后，我校全体师生赶到火车站相送。当解放军陆续上火车时，同学们一拥而上，争相和他们握手告别。知心话不知怎么说，也不知说什么好，许多同学望着解放军掉泪，解放军也不停地和同学们握手，望着我们掉泪。每个车厢的窗口都挤满了解放军同志，他们探出身子，挥舞着军帽，嘶哑地喊着“同学们，再见”。

了！再见了！”同学们也都拥在窗口下，纷纷抓住解放军的手不放，甚至泣不成声地喊着：“再见！解放军同志，再见！……”

这时，一位解放军高喊：“同学们！咱们都别哭，咱们一块唱歌！”于是，他挥舞起拳头打着拍子，我们和解放军共同反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万岁！毛主席”“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但是，歌子一停下来，大家又感动地哭泣起来，连我这个不爱掉泪的人竟然也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感动得流泪了。

解放军同志又挥舞着拳头高呼“毛主席万岁！”“誓作革命师生的坚强后盾！”“我们永远心连心！”“我们永远不分离！”。同学们也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解放军还高喊：“希望你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火车快开了，马上就要和亲人解放军分别了，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一位解放军一手挥舞着帽子，一手拿着水壶摇动着往下洒水一边喊：“咱们每个人都沾点水，咱们的感情如鱼水之情。”好像身上多沾点解放军洒的水就感情深一样，同学们都挤向他的水壶下，挣着往自己身上洒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感苍天泣鬼神，连不停地忙着摄像的摄影师也被感染，淌下了激动的泪水。

十点钟，火车在欢呼声和哭泣声中慢慢向西开走了，解放军走了。同学们望着飞驰而去的火车，恋恋不舍地走出火车站。

我们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一是全校革命师生早已实现了大联合，统一在校文革会的领导下；二是大部分干部也已站出来了，校长寿松涛通过近段做工作，基本上可以作为领导班子三结合的对象了；三是学校民兵的指挥权不用说由校文革会掌握着。5月9日，学校召开规模空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首战告捷大会”，被解放出来的许多干部登台亮相。校长寿松涛代表被解放的干部发言，受到同学们的好评，激起阵阵热烈掌声。西安五大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和两百多个外单位的同志共一万多人参加大会并表示祝贺和支持。

但是，由于校内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泛滥成灾，我校真正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会场上几乎空荡荡的。我们班包括我在内才参加5人，有些人成天吃饭、睡觉、打球等，什么活动也不参加，真是逍遥自在。校内许多同学成为逍遥派，学校搞的活动，高兴就参加，不高兴就不参加，还美其名曰：“我这是‘造反’行动”。正因为这样，大部分同学不愿意当干部，嫌当干部不自由，人员也难以管理。

前些天，我们班推选领导班子，出现一些怪现象：

1. 许多人推选上一味推辞不干，认为班里的同学不好领导。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同学大家一推选他就发脾气。荆良友同学是大家公认的好人，都像老大哥一样尊重他。当同学们一再推选他时，他却非常恼怒地发脾气道：“谁愿意干谁干，我不干！”接着，他又忿忿不平道：“我看张希俊、杨风成就不错，从同学们对他俩的态度，我算看到了实质。”当同学们问他什么实质时，他却拒绝回答。
2. 有些人根本不把选举当回事。有的是有意胡闹，偏偏推选不愿意干的同学，弄得选举工作难以进行。有的同学好像是在选别人的领导，始终不表态，说什么“不管选谁都行，没意见”。
3. 有个别同学和荆良友恰恰相反，特别想当班干部。但是，同学们又偏偏不选他。

就这样，经过反复几次投票，最后总算推选出没有再拒绝干的杨风成、张云忠和李世文为领导班子。当时，我们班的同学确实不好领导。

5月9日学校召开的大会，不管班干部怎么叫，最后也只有我们5人参加。5月10日至15日，学校组织同学们到长安县劳动，我们班分配到东升公社、太平大队第一生产队劳动。生产队让我们帮助修水渠，有些人根本管不了，叫干什么，偏不干，随心所欲，稍不如意就要“造反”，把带队的班干部气得也不亦乐乎。



## （二十三）：河南局势堪忧

5月16日，我们从长安县步行回到学校，我收到两封家信，其中一封是大姐的，另一封是家乡好友张德川的。他们都给我谈了河南和家乡文化革命的情况。大姐的信摘抄如下：

弟弟：你好，工作忙吧！

见弟弟的来信真好像见到了亲人一样，拆阅后真为有这样一个好弟弟感到高兴。弟弟对我的关心使我感动得几乎掉泪。从信中可以看出来，弟弟对小泉的死是非常悲伤的，当我才得知这件事时，也是和你一样的心情。弟弟，人已经死了，咱们再悲伤也是没有用的，希望你不要为这件事过多地考虑，要把他扔在脑后，不要再去考虑他，以免影响你的身体和学习。

陕西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搞得好一些，但不知你们学校是否发生过严重事件。咱河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得不平衡，城市比农村搞得好一些，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够好，但也取得了部分成绩。我从某些报纸和文件上看到，以党言川为首的组织可能是反动组织，因为他们不但保皇，而且竟敢辱骂军区，扬言要夺取军权，并且还冲军区。你大哥（玉印）的观点是不是和党言川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更好。你也不要再写信劝他，相信他是能够辨别是非的。

弟弟在信中提到的事情真符合我的心情。我很早就想和你谈谈，总是遇不到时机，那次你回来在我家也没停多久，也没谈成。现在，我把心里话给你谈谈吧。62年时，姐姐年龄还小，在农村时间也不长，对婚姻问题处理得不够好，也就是不够慎重，以至造成婚后的苦恼，几乎把我变成一个木头人。只因×××没有考上学，他又是个不热爱劳动的人，在农村生活不了，只想参加工作。谁知三四年也没有找到工作，他又费尽心机再考学。但结过婚的人不好考，他就想出一个毒计，决心搞假离婚。去年，他也没办成，正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推迟了考学时间。年内他也不怎么，过罢年，他就操着心，终日对我和小平冷酷无情。现在，我也准备和他离婚。你看这件事行不行？能不能这样办？希弟弟接到信后迅速回音。你能把这件事告诉给你大哥也好，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也不知道他现在的地址。

祝你一切均好！

姐姐玉荣 4月16日

好友德川的信摘抄如下：

玉振：你好！

你的来信我在7号晚上才收到，看了以后好像受到刺激一样，确实感到对不起你，没有及时和您通信联系和得到您的帮助。在这方面，我以后坚决重视起来。

.....

你不是很想知道家乡的情况吗？我可以大致给你说一下，在我们大队，前一段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很好，但后来就不行了。因为以孙九省为首的大队文革会在干部问题上采取一概打倒、一概排斥的方法，如五大主干（主要领导干部）已罢了三个（支书、大队长、武装营长），并扬言要一律打倒老干部等。现在，上级已发觉这种现象，群众也准备起来革命。他们（大队文革会）已感到孤立，正在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得到的是上级的支持和群众的拥护，所以什么也不怕，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南召）四中的问题，校文革会也犯了些错误，

另一方也有不对的地方，因为我学习的不够，观点吃不透，所以我就无法表示态度。

另外，你所回来的信中，很多地方我看了以后很不理解，因为我们总是认为反对解放军不对，打人不对，干反革命活动不对，把解放军放在水牢里不对，骂解放军不对。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所以谁反对解放军谁就是反革命。这也不是我个人的认识和观点，不强加于人。我想以我个人的想法和家里的情况给您说个意见。你认为对就照办，如果认为不对就当耳旁风，或……都行。就是说，按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教导办事。再一个遇事不要盲干，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要光听一面之言就表态，这样容易出问题。

关于你给我的传单和给马运立的 8 页信，完全和家里的情况相反，不符合实际，所以我们看了以后有的烧了，没有烧的也保密起来。为此事，我早就想给您去信说一下，以后尽量不寄那一类的传单或少寄，多寄一些国家的新政策、全国的形势等。

……

致以无产阶级的战斗敬礼！

友：德川 7 月 5 日

5 月 17 日，我又收到叔伯伯弟玉君的来信，也给我谈了家乡文化革命的情况，与好友德川谈的情况相反。摘抄如下：

二哥：身体健康，学习忙吧！

自从你考上西安学校以后，我从来没有给你去过一封信，这使我心中实在的不美。你也经常往家里回信，家里也给你去信，你也知道家里的生活和各方面情况。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南河店公社以田振林、王健为首挑起南河店街和乡下的群众，把矛头全部指向了（南召）四中文革会，对文革会的学生进行疯狂的围攻、殴打，使四中的文化革命陷于低潮阶段。公社不按中央的指示办事，违反中央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使全公社的群众停止生产，用人多压制的方法对四中（文革会学生）进行殴打、威胁，对四中贫农教师进行暴烈的法西斯式的殴打。关于四中的问题，德川和马运立可能给你去信说了，我只是略加叙述。四中的问题你不要关心，你在那里好好学习，不管它事。

前时，你给马运立邮寄了信和传单，后又给德川邮寄信和传单，说明你对河南很关心，这一点很好。但是，河南的问题你在那里只是听到一些，没有经过调查，不十分了解。河南变化很大，从上到下都反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都拥护河南军区的“严正声明”，在每个地区若发现有拥护“二七公社”和“郑大联委”的就以反革命处理。中央也发表（文章），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对的。河南的问题现在很乱，问题很严重。你在那里好好学习，不要把河南的事情和某一个问题的记在心上而耽误学习，影响自己的前途。河南的问题谁知谁胜谁败，若支持错了，就会坏了你的名誉和学习。全省的群众和干部都支持河南军区声明，都反对“二七公社”和“郑大联委”。你再有理也说不出，不要因拥护一小部分而反对一大部分，闹出风头是危险的，前途不可想象。你再给德川马运力写信，不要写关于“二七公社”和“郑大联委”的事情，千万不要给德川寄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而影响德川的工作。不要想着是朋友，朋友之间没有什么，还是小心的好。这些“黑组织”大家都反对。你给德川的传单，他看了心中甚是不美。希你千万不要管河南的问题，要好好学习，自己的前途是光明远大的，是大有可为的，不要因河南的问题而影响自己的前途，那是不合算的，不值得的，叫河南的事情乱下去吧！发展下去吧，就此停笔。

此致



敬礼

弟：玉君 67.5.12

从家乡不断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河南从上至下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真是惊人，就连我们南河店街的每个老百姓都知道党言川是“反革命分子”，“二七公社”和“郑大联委”是反革命组织，说他们要“夺军权”、“骂解放军”、“冲军区”“把解放军放进水牢里”等等，罪名多如牛毛。河南的问题这么严重，时间拖这么长，已三个多月了，一直未见中央表态并着手解决。当时，我真有点不理解中央的意思，摸不清中央的意图。

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派人到河南支援重新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二七公社”和“郑大联委”。当时我认为，他们只能鼓舞这些造反派的斗志，对解决河南的问题起作用不大。要知道，河南的问题少解决一天将会有多少战友受难，甚至献出生命，那会给革命带来多大的损失。

在西安的高中同学都收到了介绍家乡文化革命情况的来信，都为此担心，想帮助家乡的造反派。5月18日，西安石油学院的尹笃春和西安公路学院的毛振宇要回河南家乡串连，问我回去不回去？我告诉他们俩说：“我不愿回去，回去起不了多大作用，实际上，只要党中央毛主席说一句支持河南造反派的话问题就好办了。”

此时，我们西工大正在搞斗、批、改，革命委员会马上就要成立。西军电也搞得差不多了，冶院也有眉目了……我们这些学校虽然牢牢掌握了斗争大方向，但是仍然处于被动状态，一直让西交大牵着鼻子走。在对待“工总司”的态度上，刚开始，我校文革会不承认他们是造反派组织而要打倒，后来是不表态，再后来说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就这样，西交大仍不满意，非让我们承认他们是革命左派不可。西交大校内问题很复杂，前几天，一位刚刚亮相的干部自杀了。5月19日，一个参谋部的人自杀了…自杀原因他们一直对外保密。他们对校内的斗、批、改一直没兴趣，一直热衷于打内战。他们把矛头对准西工大和西军电（临），说西工大是“曲线保皇派”；西军电（临）是“硬邦邦的保皇派”，是“投机的造反派”。我们这些学校不敢动，一动他们便吓唬道：“小心你们重犯反右错误”“休想替‘反右倾’翻案”“反对打内战”等等。5月13日，驻军胡军长也批评我们西工大“没有参加交大庆祝毛主席批示大会”“支持了静坐绝食”“没有突出毛主席批示而突出了李世英”等等。几天来，在西交大的扶植下，西安市又成立两个拥护他们的学生组织，一个是西安市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大学总司”），一个是西安市中学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中学总司”）。他们是在搞分裂还是在搞联合？同学们气愤地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5月21日，我在大街上看到西交大的某期校刊把李世英的文章登在头版显著位置（占全版），并且周围画许多人。这些人都望着标题上的李世英三个大字，而把毛主席的关于西安问题的批示放在四版。同时，在西交大校刊旁有一份小字报，上面是一首根据“红军想念毛泽东”歌曲改编的歌词如下：

## 我们想念李世英

抬头望见李世英，心中想念交老总。

夜里想您有方向，迷路时想您心里明。

大西北，<sup>1</sup>

您带领我们打内战，打败曲线保皇兵。

总司是您亲手创，战略是您亲手订。

我们永远想念您，交老总啊李世英。

西工大“看不惯”战斗队

（注：老总指交大，群众都称交大（总）为交老总或狡老总；李世英是西交大文革总会的负责人）

我回学校后，也编四句顺口溜准备往他们的校刊上贴，其内容如下：“抬头望见李世英，四版才见毛泽东。百姓见了吃一惊，不知老总何心情？”我把这四句顺口溜抄写许多份，然后又到大街上找西交大的这期校刊。但是，我转了一下午也没见到他们的这期校刊，只在西大校园里见到一份。我猜想，可能西交大知道此期校刊出得有问题而销毁了。

---

<sup>1</sup> 此三字疑衍。

## （二十四）：三院校成立革委会

5月22日，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西安举行两天的庆祝活动。当天，西交大派的“工总司”“农总司”“机总司”等召开庆祝大会，“工总司”全部参加了。第二天，我们“统指”派也召开庆祝大会，声势更大，游行了7个多钟头，“工矿联”也全部参加了。工人们干劲很大，他们的游行队伍非常整齐，好像受过训练一样。

但是，刚受过军训的我们西工大的队伍，还没有工人的队伍整齐。队伍一停下，学生们便散开了，纷纷躲在树荫下纳凉，有些“造反”精神强的人干脆回学校了。我们班只剩下刘瑞池、赵成顺、林瑞生、荆良友、黄炳球、张学贵、李双亭、曹淑媛和我10个人了。当我们回到学校时，那些同学们已经吃过饭了，有的在看小说，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睡大觉。我当时很看不惯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现在看来，他们才是聪明人。

5月24日，“工矿联”准备和“工总司”联合召开“庆祝中央三篇重要文章的发表大会”。但是西交大派总是和我们“统指”对着干，我们“统指”愿干的，西交大派不愿干，我们“统指”拥护的，西交大派总是反对。“工矿联”尽了极大努力，作出了极大让步，但仍然被“工总司”无理拒绝了，致使大会没有开成。西工大积极宣传胡家庙地区打破“工矿联”和“工总司”两派组织的界限，实现工人大联合的经验。西交大派却说：“这是个大阴谋，是反对大杂烩的翻版。”也是这天下午，陕工大斗争西交大揪出的“三反分子”彭康，却遭到西交大的破坏。他们说：“你们借斗争彭康把矛头指向了西交大”、“你们不是在斗争彭康而是在斗争西交大”。

5月25日，学校广播站播送一条大快人心的喜讯，国防科委已经正式批准西工大和西军电成立革命委员会，两校即将同时召开成立大会，并派刘华清同志率领代表团前来祝贺。聂老总（聂荣臻）在接见西工大和西军电代表时诚恳地说：“你们要挺起腰杆，夹起尾巴。”我们西工大的同学们不怕打击，不怕污蔑，挺起腰杆干，但在胜利时，不可骄傲，且不可在一片掌声中把尾巴翘到天上去，飘飘然起来。

同学们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后，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当天晚上，敲锣打鼓到我们西工大报喜的单位接连不断，战友们都和我们学校一样欢欣鼓舞。之后连续5天，来我校贺喜的单位仍然络绎不绝，大概有200多个单位，都是和我们共同战斗、风雨同舟的战友。他们和我们心连心，把我们的胜利当做他们的胜利，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我们校内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已经泛滥成灾，对满怀热情前来祝贺的战友麻木不仁。广播上一遍又一遍地叫同学们前去欢迎来贺喜的战友，许多人却无动于衷，参加欢迎的学生一直寥寥无几，致使来贺喜的战友们高兴而来、扫兴而归。文革会的领导也感到无奈和脸红。

就在我们西工大和西军电集中精力准备6月1日同时成立革命委员会之际，西交大不仅一直没来祝贺，反而竭力干扰破坏我们的筹备工作。

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霍士廉3月份在北京时，陈毅曾对我们西安的造反派代表（包括西交大）说过：“霍士廉是个好同志，是我的老部下。”之后，霍士廉站出来亮相表示支持以西工大为首的“统指”“工矿联”“农总会”“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四大造反派组织，并多次检查错误，揭发西北局书记刘澜涛的问题。因此，四大造反派认为霍士廉不能打倒，要挽救他，这可惹恼了西交大。他们不仅要打倒霍士廉，而且要把以西工大为首的“统指”派说成是保皇派。

5月30日，西交大派把霍士廉押在汽车上游街，说他是“大叛徒”。到底霍士廉是不是“大叛徒”，在材料没有落实之前，我们“统指”派不能随其表态。为此，他们指责我们“统指”派是保霍士廉的“保皇派”，甚至造谣说“统指”派提出要“解放霍士廉”“霍士廉是‘三结合’的第一号种子”等。他们把霍士廉押

着游街的目的显然是故意刺激四大造反派组织，挑起内战，以达到破坏西工大、西军电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目的。但是，以西工大为首的“统指”派没有上他们的当，对他们的挑衅行为不理不睬。

6月1日，西工大和西军电终于排除西交大派种种干扰，共同召开隆重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规模盛大空前，参加会议的有37万多人，分三个会场，中心会场在西军电大操场。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北航红旗战斗队负责人韩爱晶、“工矿联”副主任、“工总司”副司令、“农总会”主任田杏云、西交大文革总会负责人沈荣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文革会负责人杨梦云等出席了大会。

大会在鞭炮声、《东方红》军乐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开始，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首先宣读聂荣臻的题词。6月3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同志为西工大革命委员会成立特题词如下：“热烈祝贺西北工业大学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然后，刘华清代表国防科委、黄经耀代表军区驻军支左统一指挥部分别讲话，接着，各来宾代表讲话。最后，新当选的西工大革委会主任孙福林、西军电革委会主任李洪明讲话，并向参加大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兄弟院校的战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来宾讲话中，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韩爱晶的发言，对西交大来说很刺耳，但也很诚恳，弄得参加大会的西交大代表哭笑不得，如坐针毡。他们的代表李维娜发完言后，便借口晚上有事退出会场。

令全校师生异常兴奋的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给我们带来了中央军委赠送给我们的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语录章。第二天晚上，我们西工大在大操场举行隆重的颁发仪式。当同学们拿到金光闪闪的两枚像章时，无不喜笑颜开，立即佩戴在胸前。当时，我和大家一样，一戴上毛主席像章，好像在毛主席就在身旁一样，心里美滋滋的，无比幸福和光荣。



图9 学校革委会成立大会西工大分会场

6月3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隆重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我们西工大、西军电的师生全部出动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军区黄司令员在大会上的讲话态度非常明朗，支持我们“统指”派的行为，不点名地批评了西交大派的破坏大联合行为。他这次讲话与6月1日在我们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时我认为，军区态度的逐渐明朗化可能与中央的指示有关。据说，5月31日，西交大李世英从北京给他们学校打回电话说，周总理、康生等中央首长批评了他们，说他们四月份以来，把斗争矛头错误地对准了四大革命造反派组织。正因如此，今天西交大派3000多人来参加大会。但是，他们可能处境尴尬，仍然是没等会议结束就借口撤走了。

我们学校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临潼县支援农民夏收。但是，由于校内自由主义泛滥，不少人怕苦怕累怕热不愿意去，全校只去1500多人，我们班只去16人。6月6日，我们乘火车来到临潼县。我们班被分到徐扬公社的一个大队。这个大有6个生产队，我们被分到4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4人。今非昔比，

这次下到农村和去年下到长安县农村大不一样，社员们对我们非常热情。

我们来到生产队，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我们4人放下背包，生产队长就给我们送来了开水，并泡了几壶茶，专门打一盆清水让我们洗脸。他们这里非常缺水，对水非常珍惜，洗完脸的脏水还要用来饮牛，或积存起来再用。我们喝了一会茶，就要求队长给我们派活，队长说我们一路辛苦了，休息休息明天再下地。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队长才给我们找来四把锄头，让我们和社员一起锄棉花。

这里是棉花主产地，棉田一片连一片，长势很好，已经有1米多深。我们队的4个同学都能吃苦，每天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一样汗流浹背。一天，天气特别热，我们在棉田里喷洒1059农药，也没戴口罩。陈美绍正在喷洒时，出现中毒征兆，头晕恶心。社员们劝他回去休息，但他只在地头休息一会，就又下地一直坚持把农药喷洒完，受到社员们的好评。

6月15日我们就要回校，当晚，我们和队里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座谈。他们纷纷赞扬我们能吃苦耐劳、谦虚谨慎，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也谈了对他们大队文化革命和生产的看法和建议，越谈越亲切，大有恋恋不舍之意。16日上午，当我们离开时，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们热情地把我们送上汽车，挥手告别。

当晚，我们回到学校，校革委会给我们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即6月13日，周总理对霍士廉的问题给西交大提出三点指示：一是把他放回来，给他自由，把病治好；二是停止对他的斗争；三是把有关材料上报中央，由中央处理。这三点指示不仅解放了霍士廉，也解放了我们“统指”派。西交大派借斗争霍士廉一直攻击、谩骂我们是保皇派。这下，他们的阴谋宣告破产了。同学们无不为之窃喜。

第二天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出一个特大喜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氢弹在我国西部上空爆炸成功。西安古城一下沸腾了，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热烈欢呼、共同庆祝我国氢弹爆炸成功。大街上人潮涌动，鞭炮齐鸣，欢呼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中午12点，西工大的师生全体出动，浩浩荡荡到大街上游行。同学们把周总理三点指示的喜悦之情和我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激动心情一起发泄出来，队伍格外整齐，精神头格外饱满，口号声格外激昂。

再回头谈谈河南的文化革命情况，5月25日，西交大的高中同学谷玉海来到我们学校，告诉我们西工大的南召一中同学，刘福明老师来了，而且是从郑州来的。这真出乎我们的预料，刘福明是我们的体育老师，是全县最有名的造反派负责人。保守派说他是“黑司令”，曾经两次被县委打成反革命。他父亲为此气得患病而死，爱人怀孕因被揪斗而流产。他自己仅在这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就被押着游街、游乡8次，被批斗无数次。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压垮，趁夜深人静看守他的人打盹时，悄悄逃了出来。为躲避追捕，他不敢走大路，连夜从回龙沟的小道赶到北京告状。回到郑州时，他刚好与准备回南召的西交大同学谷玉海相遇。他们正要一起回南召时，南召的战友给他去信要他筹些纸带回去。

原来，南召的造反派战友们一直没有宣传用品。他们没办法就上山打柴卖钱买纸和宣传用品，但县委又通知群众不让买他们的柴，否则以支持反革命论处。他们要揭露县委打击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和丑恶嘴脸，急需纸张等用品。刘老师接到他们的信后，就在郑州筹备纸张，但这里的造反派和他们的处境一样没翻过来身也弄不到纸。谷玉海遇到后就邀刘老师到我们西安，因为西安的造反派强大，南召一中毕业的同学也多，都会竭力支援他们的。

26日下午，我和璩金生及七系的两个上届同学一起把我们西工大同学筹备的宣传用品送到西交大，并连同清单交给刘福明老师。其清单中有：大字报纸850张，大吸水纸60张，大绵纸200张，大红纸130张，大黄页35张，8K刀切纸4300张，油墨两盒，蜡纸120张。清单后面的落款是：西北工业大学革命委员会。

刘福明老师非常感谢西安同学的大力支持，但是，一谈到河南和家乡的文化革命情况，禁不住黯然泪下。最后，他喜悦地告诉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对河南问题一直很关心，也很清楚，正在着手解决。”

附：4月23日，毛泽东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的批语如下：

林彪、恩来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 （二十五）：回乡堕爱河

1967年6月16日，我们从临潼县帮助农民夏收回到西工大后，西安市的文化革命形势比较稳定，大部分大专院校在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很少集会游行。但是，西交大对校内的斗批改一直不感兴趣，热衷于打“内战”。就因为省委书记霍士廉表态支持以西工大为首的“统指”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一直责骂西工大是“保皇派”。当他们押着霍士廉游街受到中央领导批评后，仍然不甘心，又偷偷抄了霍士廉的家，企图搜集他是“大叛徒”的“黑材料”。谁知，偷鸡不成反蚀把米，6月19日，我听说他们学校有7人被捕，其中两个是学校文革总会作战部和参谋部的副部长，还有潜藏的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特务等。原因是，他们在抄霍士廉家时，把国家机密文件复印后偷偷送到了国外。中央领导很恼火，严厉批评了校文革总会的头头李世英，责成陕西军区严查此事。

西工大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对西交大的挑衅一直不理不睬，把外边的学生往回撤，准备集中精力开展斗、批、改，并计划9月份复课闹革命。眼下，校内没有什么集体活动，学生们整天没事干，无聊得很，许多人整天打牌、看小说、装收音机、打毛衣等。我也觉得日子过得太无聊，闲得发慌，每天看书、学游泳、到郊区散步等打发时日。

6月24日，我收到许昌姨表妹任荣寄来的许多传单，大多数是攻击“二七公社”的，还有打倒刘建勋的揭发材料。这些传单把“二七公社”的人说得像恶魔一样，似乎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罪恶滔天，但很容易看出，传单里的内容漏洞百出、前后矛盾，有的地方把“二七公社”说成是一小撮亡命之徒在作垂死挣扎，有的地方又把他们说成是一大批狂徒，包围了×××，成了天兵天将，神乎其神。

任荣是支持河南军区和“河造总”的，她过去不断给我写信寄传单说我受蒙蔽了。我很清楚党中央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是支持“二七公社”的，也给她陆续寄了不少这方面的传单，但她一直不相信，力图说服我是受蒙蔽了。

7月1日，我又收到母校南召一中同学的来信，说河南的斗争形势变好了，而且越来越好。“二七公社”的革命造反派不仅没有被反动势力压垮，反而越斗越坚强，越来越壮大了。最近，“二七公社”南阳分社也要成立了，南召一中的刘付明老师还将担任南阳“二七分社”的社长，这真是一件大喜事。我立即跑到八系宿舍楼，把这个喜讯告诉高中同学璩金生。他听后更是无比兴奋，和我商量一起回家去。他的女朋友就在南召县城的缫丝厂，他早就想回去。

我何尝不想回家呢？但我家那么穷，回去一趟就会增加父母的负担，我有些犹豫。但是，在这儿又实在太无聊了，我便想到不如去许昌姨家。姨夫是建筑工地的工头，如果他能给我找个小工干，一天就能挣一块多钱，不仅充实生活，也可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于是，我便立即给任荣写回信，让她征求一下姨和姨夫的意见。璩金生亟不可待，第二天就先回了。没想到，我寄信时出了错，把给许昌和家里的信装错了信封，直到7月6日收到任荣的回信后才知道，后悔不迭。我决定先去许昌再说，便赶当晚火车于第二天上午回到许昌。

走在许昌的大街上，我看到许多支持“二七公社”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明显感到河南的文化革命形势已经好转了。来到姨家后，任荣看到我很不好意思。她原来给我写信说，等我回来了好好和我辩论辩论的，现在她已经知道是自己上当受骗了，再不提和我辩论的事。当我向姨夫提出想干小工时，他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们建筑公司的活不多，许多工人都没活干在家歇着。因为学校不上课，任荣也想让姨夫找小工干，但工地不需要人也一直呆在家里。我只好取消了在这里打小工的念头。

我在许昌呆了两星期，期间还到乡下舅家帮忙干了十来天农活。在我决定回老家时，任荣要求跟我一起回我们老家看看。她从小在城市里生活，从没出过远门，对我们家乡的山区异常向往，姨和姨夫答应了她的



要求，她异常兴奋。7月20日，我带着任荣一起高高兴兴地回老家了。

可能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和姨重男轻女思想比较重，任荣9岁才上学，16岁才小学毕业上初中。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从小就懂事、勤快，经常帮助母亲做家务活。9岁时，她就开始挑着两个大水桶到街道上的水井打水，小学毕业时已经揽下了全部家务活，担水、洗衣、做饭、烙馍、整理打扫房间、带弟弟妹妹等，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家务事根本不用姨和姨夫操心。

当时，她才17岁，但身体发育得快，已经是个一个眉清目秀、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我们家人看到她来我们这穷山沟都非常高兴，母亲尤其乐得合不拢嘴。我家住的是两间旧茅草房，连个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烂衫。她不仅不嫌弃，还像在自己家一样，什么话都干，每天打扫房间和院子、到井上担水，下厨房帮助母亲烧火、做饭，还和我妹妹一起下河洗衣、买茧、拉丝绵等，看到什么活都抢着干，受到全家人的交口称赞。

任荣对我像亲哥哥一样，非常尊重、亲热，尤其喜欢跟我一起干男孩子的活，如上地拔草、上山薅柴、砌鸡窝、脱坯等。我们俩脱坯有20多天，拉土、打水、和泥、脱坯，她样样活和我比着干。到井上打水时，需要用钩担一端的钩子勾着水桶探到井下，再摆几下水桶让水桶倒扣水里，才能把水桶灌满水拉上来。我的技术不行，往往把水桶掉到井里，她却轻松自如。就这样，我们俩总是一起到井上，她打水，我担水。脱坯时，我蹲着很吃力，她就蹲着脱坯，我给她铲泥巴，配合得井井有条，吸引了很多人的羡慕。

她和我在一起时异常大方和亲热，一些封建和传统的农村人有些看不惯，说一些风言风语，我有些不好意思，有时便有意躲避她，心里却甜丝丝的。我们俩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非常投机和开心。后来，我们都感到互相之间越来越牵挂、越来越离不开。有几次，我一个人外出看望回乡的老同学，人在外心却在家里，不时牵挂着她。当我回到家时，家里人告诉我，她更是魂不守舍似地牵挂着我。我们都有一刻也不想让对方离开自己视线的感觉，但还不知道这就是爱情。相处几个月后，我俩已经到了难舍难分形影不离的程度。终于，在家人的撮合下，我们水到渠成，毫无悬念地定下终身，一发不可收拾双双堕入爱河中。

这年9月，大姐和大姐夫离婚，带着3岁的女儿回来了，大哥也从河南农学院回来了。大大小小24口人聚齐很不容易，中秋节时，任荣和我们家人一起分别照了本家和家族的合影相，家里人已经把她当成我们家的成员了。当时，我们俩和家人都不了解近亲结婚的危害，父母亲还不时向亲属们炫耀我们是亲上加亲，要是再晚些年，我们俩就不可能结合了。



图 10 家族合影

（后排左起第三大姐玉荣、妹玉凤、任荣、弟玉言、玉振、大哥玉印、弟玉军；  
中排左起五婶、四妈、母亲、五叔、四爹、父亲、二伯；怀抱左起妹玉峰、外甥女小平、小弟玉强；  
前排左起妹玉芝、弟玉生、妹玉敏、妹玉梅、妹玉华、弟玉贵、弟玉江）



幸福甜蜜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我们在家已经呆三个多月了。没想到，这三个多月里，全国许多地方包括西安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规模武斗，死伤无数革命群众。10月16日，学校给我发来电报，让我立即返校复课闹革命。我俩立即回到许昌，她恋恋不舍地把我送上开往西安的火车。回到西工大，西安的武斗已经过去，但学校里仍然弥漫着劫后余生的浓重气氛。

## （二十六）：争抢霍士廉

1967年7月20日我回老家前，西安的形势还比较稳定，大部分大专院校都在忙着成立或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只有西安交通大学还在继续打内战。西交大本来也是“西安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的发起院校和负责人，在西安最大的保守派组织“工农总部”即将垮台时，特别是在“一月夺权风暴”时，因为以西北工业大学为首的其他院校负责人不同意西交大“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的所谓“三句半”观点而闹分裂。他们于2月18日，扶植成立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西安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吸收了众多的保守派组织“工农总部”的成员。为此，老造反派称其为“大杂烩”。之后，西交大又陆续扶植成立类似的“农总司”“文总司”、“财总司”、“机关总司”、“公安总司”、“中学总司”等组织。这些组织都支持西交大，与老造反派组织“统指”、“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西安农民革命造反总会”、“西安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势不两立。因为西交大和“工总司”的成员大部分在西安市东部，而“统指”的所属的院校和“工矿联”的成员大部分在西安市西部，人们分别称东派和西派。

在夺权斗争中，两派互不相让，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以致发生“1.28”庆华电器制造厂、“2.10”西北光学仪器厂等多起大的武斗事件，引起党中央的关注。后来，根据中央指示，“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派解放军进驻西交大、西工大、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四所院校整训，闭门思过，社会很快安宁了许多。整训结束后不久，西工大、西军电、冶院等院校陆续进入“斗、批、改”，6月份，这些院校陆续成立革委会或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那时，如果每个学校都能这样搞，西安就会顺利地实现大联合，并很快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西交大是西安市规模最大的大学，在校学生就有两万多。他们偏偏不热心校内的“斗、批、改”，热衷于到社会上“帮忙”，到处插手拉帮结派，支持“工总司”“农总司”“机关总司”等各基层组织在本单位争权夺利，企图把老造反派的基层组织搞垮，进而搞垮“工矿联”和“统指”等老造反派。当党中央号召“大联合”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时，省委书记霍士廉站出来亮相，表示支持“统指”、“工矿联”、“农民总会”等革命造反派组织。西交大和“工总司”“农总司”等组织生怕霍士廉成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的“三结合”对象而于己不利，便千方百计想办法要打倒他。他们根据未经调查落实的材料，说他是“大叛徒”，多次组织批斗、游街，并指责老造反派组织“统指”“工矿联”“农民总会”等是保霍士廉的“新保皇派”，并在批斗霍士廉、押着他游街时，除喊“打倒大叛徒霍士廉”外，还喊“打倒新保皇派”。目的显然是一箭双雕，不仅把支持老造反派组织的霍士廉打倒，还要把老造反派搞臭、搞垮。

陕西省军区和驻军比较好，在支左工作中，开始对老造反派有些不理解、看不惯，没有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后来，通过派军队进驻院校整训与造反派共同学习、座谈讨论，逐渐改变了对造反派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和21军军长胡炜等领导亲自虚心征求各造反派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思路和方法，公开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对新成立的所谓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农总司”“机关总司”等，没有同时表态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但表示要经过调查后再确定是不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一直到7月份我回老家前夕，军区仍然没有表示态度，他们渐渐失去了耐心和理智。在西交大的支持下，他们一方面组织游行示威，抗议省军区和21军的所谓“不公正”，一方面狂风暴雨般地批斗霍士廉，并将其与西北局被打倒的领导刘澜涛、习仲勋、王林等一起游街示众。霍士廉身体不好，经不起连日的疲劳战术，渐渐不支，身体状况极差，甚至有生命危险，这就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67年7月14日上午9时11分，总理办公室吴斌打电话给西交大“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传达总理的指示如下：

1. 你给总理的来信已收到，关于毕业生的问题，如照来信所提的办法，时间会拖得很长，中央正在研究

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

2. 据悉：西安最近“打、砸、抢”又在抬头，而且两方面都有，希望双方能通过协商予以制止，如果不行，将来可来北京解决，但现在不要来。
3. 听说交大对黄经耀、胡炜有意见，黄、胡二人是中央派去的，而且从一开始也是支持交大造反派的，希望能注意同他们的关系。（当时，黄经耀是军区司令员，胡炜是 21 军军长）
4. 霍士廉身体很不好，要批判他可以，但一定要注意他的健康。中央已委托省军区和驻军加以掌握，关于霍士廉是叛徒的问题，根据中央所知，情况并非如此。

李世英得到周总理的指示后，虽然心中不服，但也不敢违抗，只得暂时有所收敛。为了保护霍士廉的生命安全，1967 年 7 月下旬，西工大的学生李文斌、杨祚华、马小兵和西军电的学生何涛 4 人，经过精心策划，冒险把霍士廉从西交大关押的地方抢救出来。为了确保他的安全，他们把霍士廉藏在西工大图书馆的书架空挡里。西工大是国防大学，属于机密单位，由 21 军的一个团负责保卫。图书馆大楼在教学区内，教学区各门口都有解放军站岗，严谨外人进入，加上中央有关于不准冲击国防机密单位的通令，外人不敢随便冲击。图书馆大楼内分四层，各层都密密麻麻摆满了书架，就是进入图书馆也很难发现。这样，霍士廉就暂时得到了休息与放松，安全问题也就有了保障。但是，文化革命形势很快发生了急剧变化，霍士廉的安全又出现了危机。

7 月 22 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个口号哪个群众组织都可以利用，不仅没有起到保护革命造反派的作用，反而促使全国的武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造成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包括革命造反派群众的伤亡，也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江青发表“文攻武卫”讲话的第二天，上海《文汇报》便刊登出江青的这个讲话精神，许多地方小报也纷纷登载。全国各地的真假革命造反派好像听到了冲锋号，都打着“文攻武卫”实际上是“自卫”的旗号，开始想方设法搜集或制造武器、弹药、构筑工事，准备“文攻武卫”。他们不谈“文攻”只讲“武卫”，使全国许多地方的武斗愈演愈烈，逐步升级。

更为严重的是，8 月 1 日，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红旗》杂志又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40 周年》。社论指出：“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这篇社论犹如火上浇油，不仅加剧了全国的武斗，而且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打着“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抢劫枪支弹药，甚至公然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和弹药库。

8 月 5 日，也就是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发表的第四天，西安一下子大乱了。西交大组织动员“东派”数万人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霍士廉！”“打倒新保皇派！”等口号。同时，他们以对军队支左委员会的支左工作不满为由，煽动“工总司”“农总司”等 799 个单位、9.8 万人民群众在省委门前的建国路上静坐。静坐期间，他们发表造反声明，并成立了“八·五造反指挥部”和“文攻武卫”的专业武斗组织——“八·五战团”。他们以“工总司”的头头马希圣为司令、西交大“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为政委，不断组织群众冲击省支左委员会办公楼和 21 军军部，向部队施加压力，要求承认“工总司”“农总司”等组织为革命造反派组织，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并要求交出“大叛徒”霍士廉批斗（其实省军区和 21 军也不知道霍士廉已经被藏起来了）。

与此同时，西派也与他们针锋相对，组织“统指”“工矿联”“农总会”等数万人上街游行，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打倒大杂烩！”“反军乱军绝无好下场！”等。原本矛盾已经得到缓解的西安市两派群众组织，转瞬间怒目而视，变得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矛盾逐步激化，恐怖气氛笼罩西

安全城。

当时，中央虽然担心西安的文化革命局势，但是，由于正在集中精力处理武汉和河南等地的棘手问题，还无暇顾及西安。

## （二十七）：帮霍士廉逃出西安

自从省委书记霍士廉“失踪”以后，以西交大为首的东派头头们如热锅上的蚂蚁，“找霍”、“揪霍”的呼声日高一日。他们一方面继续给军区和支左委员会及 21 军军部施加压力，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静坐，不断组织冲击，要求交出霍士廉批斗；一方面组织人员四处暗中搜寻，在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关卡，防止霍士廉逃出西安。

眼看西安的斗争形势日见紧张，大小武斗此起彼伏。霍士廉长期呆在西工大也不是长久之计，一旦他的藏身之处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西派的“统指”、“工矿联”、“农民总会”和“红总司”四大组织的头头们经过研究，决定设法把霍士廉送到北京交给周总理。这样，不仅保护了老干部，也可以缓解西安的矛盾冲突（四大组织的头头分别是“统指”孙福林、“工矿联”张培信、“农民总会”田杏云、“红造司”李洪明。）。经过周密策划，四大组织头头定下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

附录：文革往事—保霍士廉进京

作者：李文斌（亲自送霍士廉进京的四名学生之一）

1967 年 7、8 月间，距今已经三十年了。事情的当事人只有四个，而且也在茫茫人海中失散了三十年。我已经 63 岁了，如果不写这篇文章，这段历史将会永远湮没。

1967 年 7 月下旬，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李文斌、杨祚华、马小兵，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学生何涛等四人，经过传奇般的策划和惊险的实施，把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霍士廉保护到了北京，置于周总理的关怀保护之下，使这位老干部得以延续生理生命和政治生命。

### 一、文革时期的霍士廉

霍士廉是文革前调陕西任省委书记的。此前，他是浙江省委书记兼浙江大学校长。文革开始后，作为省委书记自然处于风口浪尖，屡遭冲击，常挨批判。到了 1967 年，各地干部纷纷“亮相”，就是向群众组织在大会上表明自己对当时热点问题的观点和态度，目的是征得群众组织的认同，将其吸收进“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当时，西安地区的群众组织已经分裂成两大派，观点对立，针锋相对，辩论争吵，如火如荼，甚至由文斗发展为武斗；西安形势，异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地方干部和支左解放军的任何表态都可能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霍士廉和 21 军胡炜军长的言论就是典型代表。他们的“亮相”由于不合某一派群众的口味而立时成了该派的攻击矛头。他们一方面组织了规模浩大的针对 21 军和省军区的静坐，一方面狂风暴雨般地批斗霍士廉。将其与西北局的领导刘澜涛、习仲勋、王林等一起游街示众。霍士廉身体不好，经不起连日的疲劳战术，渐渐不支，状况极差，甚至有生命危险。

### 二、保护霍士廉

霍士廉的处境和状况受到“四大组织”的关注。他们设法把霍士廉从对方手中“抢”到手，藏在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的书架空挡里。一座图书馆是一栋大楼，密密麻麻的书架是很好的保护。加上，中央有关于不准冲击国防机密单位的通令，西北工业大学是国防大学，机密单位，21 军的一个团负责保卫，解放军站岗，外人不准随便冲击。于是，霍士廉就暂时得到了休息与放松，安全问题也有了保障。

### 三、策划保霍进京

由于霍士廉的特殊身份，长期呆在西北工业大学不是长久之计。况且，西安形势日见紧张，“找霍”

“揪霍”呼声日高一日，静坐人数达数万人，大小武斗此起彼伏。于是，“四大组织”经过研究，决定设法把霍士廉送到北京，交给周总理；一方面保护了老干部，一方面缓解了西安的矛盾。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四大组织领导向有关单位电话征集汽车，很快就开来很多。后留下军事学院的四部车辆，其他车辆原路返回。然后从图书馆将蓬头垢面、弱不禁风的霍士廉扶出来。夫人丁聪，也只能和他匆匆挥泪而别。四部军用卡车向西安不同方向开去，上面坐满了穿军装的人，使对方摸不着头脑，是为疑兵之计。同时，一部小轿车则载着霍士廉开进西北工业大学对面的西军电（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原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在那里为霍士廉换上了军装（霍还是省军区第一政委），这样在进京的路上会减少不少麻烦，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五辆车约定汇合的地点，是西安东郊临潼火车站旁的 152 部队（军校）。

#### 四、有惊无险

当五辆车汇集于临潼火车站时，小车司机竟率先把车开进了站台。这是极其危险的举措，因为铁路系统大部分是对方的人，他们一旦发现有霍士廉的动向，一场大乱就要来临。好在处理快，未等车站迷糊过来，他们就调头跑了。

#### 五、直奔潼关

五辆汽车载着霍士廉、四大组织的头头，还有一百多名军事学院的军人，急如星火向陕晋豫三省交界的潼关开去。为什么呢？也是精心策划。当时送霍的方案有航空、火车、汽车三种。走飞机场，目标太大，最易被发现而惹麻烦；坐火车，铁路系统全是对立面的人，霍随时会被“抢”走；乘汽车到潼关，然后渡黄河，经山西太原、河北石家庄到北京，对方很难想到，是最稳妥的方案。

#### 六、珍重道别

车到潼关，前面就是滔滔黄河，四大组织头头与霍士廉珍重道别。他们不能再往前送了，因为当时潼关并无黄河大桥，要想过河，只能小船摆渡。此时，三个学生就真正成了送霍主角了。何涛、杨祚华、马小兵都是 23 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当今，这个年令的人还争当“另类”，而他们却机智勇敢地保护着一个省委书记高干向首都北京、向敬爱周总理所在的中南海进发了。

#### 七、艄公与首长

四人下了车，举目四望，滚滚黄河，茫茫河滩。等了很久，才见远处一叶扁舟，缓缓而来。他们喊来小船，说要摆渡过黄河。划船的是一位老者。因为黄河水性莫测，没有经大风大浪的经验是不敢在黄河上使船的。老人问，什么人坐船；学生们回答，是“部队首长”。老人又问，什么部队首长？学生回答是部队高级首长，7 级干部。老人说，从未有如此大的首长坐他的船。很高兴，也很小心。于是，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凄美景象中，四位神秘人物从陕西进入了对岸。

#### 八、下马工程的不速之客

船到对岸，不等于就一切完事了。从水面到河岸有人住的地方还有一公里多的沙滩。霍士廉已是弱不禁风，寸步难行。怎么办？再难也要想办法！他们一人留下陪霍士廉，两人向河边的三门峡工地跑去，看能不能找辆车。好容易到了工地，因三门峡早已下马，留守者寥寥无几，只找到一辆拉水泥的架子车。他们就是用这辆破旧的架子车，在一步一滑的黄河滩上，把霍士廉同志拉到了三门峡留守处。此时，天已黑了。由于霍士廉身体太虚弱，只好到留守处卫生所打葡萄糖。还好，当医务人员得知是一位领导干部，他们非常激动。因为在这个平时人迹罕至的地方，见到一位大干部实乃三生有幸。于是，很精细地为霍士廉作了检查并输液。

#### 八、太原卸装

第二天，他们坐火车去太原。太原是山西省会，当时该省的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但省军区司令江渭清正受冲击。在这里，穿军装，显然不妥。于是就给霍士廉脱了军装，成了地方干部，住进了省革委会招待所。在招待所里，虽然不能暴露真实身份，但也稍觉放松。他们受到招待所工作人员的热情款待。下一步就是经石家庄进京了，他们先给总理负责西北地区的联络员吴斌发了电报：西安形势紧张，我们送霍士廉进京。以使总理早有准备。至于为什么总理会同意霍士廉进京，这还有一段插曲。

## 九、联络通道

向中央请示、联系霍士廉进京的任务，是由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李文斌完成的。在他们三人还在路途的时候，李文斌就先期到北京了。他是陪同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寿松涛同志去北京的。而寿校长等是应国防科委的邀请到北京汇报学校关于教育革命、复课闹革命情况的。他们到北京住总参谋部第三招待所，这是个高级干部招待所。住进后就分头展开了工作，两次到国防科委接受刘华清（国防科委副主任）接见，与钱学森座谈教育革命。还作为西安的来人旁听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判陈毅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批斗罗瑞卿等人大会。而李文斌的主要工作是向中央文革、国务院反映情况，提出将霍士廉送来北京的请求，得到答复后传回西安，然后西安方面才开始行动。也就是说，送霍士廉进京是得到中央和周总理同意的。不然，我们也不敢如此大胆。

2当时，李文斌是西北工业大学文革情况汇报组组长，负责向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周总理书面汇报西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他们编辑打印了《情况汇报》的简报，定期而频繁地向中央报送资料。兰州空军的机要通讯员准时到学校来拿简报，并用飞机送往北京。在当时正常的国家机器处于半瘫痪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为中央了解西安情况起了较好的作用。中央的收文单位把我们的简报都每期存档，如缺了还打电话要求补上。在这样的汇报工作中，李文斌自然也就与中央的一些单位建立了工作联系，送霍士廉同志的安排就这样快速而严密的完成了，这是整个任务的关键一环。

## 十一、到达北京

在太原住一晚后，他们一行四人就乘火车经石家庄去北京。整个旅途，备历艰辛，危险重重。霍士廉一路上身体很差。在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的时候，每天由学生给他点土豆吃。在火车上也很少吃东西，很少说话。可以说，如果不把他送到北京，他的生命都有危险。这样的状况还能经受日复一日的批斗吗？晚上，车到北京站，当车门打开时，总理联络员吴斌正在站台等候。霍士廉颤巍巍从车厢里走出来，吴斌上前握着他的手说：“霍士廉同志，总理让我接你来了！”只见霍士廉心情激动但说不出话，多日未刮的胡子直哆嗦。这是一个中国省委书记的九死一生啊！这四个年轻的小人物改变了他的命运。

---

<sup>2</sup> 此处疑脱第十节标题。

## （二十八）：红色恐怖罩全城

西安市以西交大为首的“东派”一直不见霍士廉的踪影，他们心里明白，肯定是军区或 21 军或“西派”的四大组织（即“统指”“工矿联”“农民总会”“红造司”）把他藏起来了，但又找不到真凭实据，仅是怀疑而已，底气不足。怀疑的根据是：自霍士廉神秘“失踪”后，他们的线人确实发现“四大组织”有些异常举动，估计与霍士廉有关，甚至怀疑霍士廉已经逃走了。东派异常恼火，更加嫉恨“西派”的“四大组织”和省军区、21 军，犹如困兽发疯般寻找报复。

东派一方面继续动员人参加省委门前的静坐示威，甚至动员西安市以外各地、县 90 多个单位 1900 多群众参加，最多时近 10 万人。他们高呼“粉碎西安的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打倒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新保皇派”等口号，不断组织冲击，向军队施加压力，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军区和驻军一直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要求，怕犯错误，也不敢硬性制止他们的过激行为，使他们一直找不到借口而采取更加过激的行为。就这样，他们一直在省委门前持续静坐示威（持续 42 天），不仅造成许多工厂、单位和部门停产、停业，也严重干扰破坏了社会秩序。

另外，他们为了寻机报复“西派”的“四大组织”，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围攻、抢占工厂、医院、学校、机关，企图搞垮对方所属的群众组织，独揽这些单位或部门的党政领导大权。“西派”四大组织所属单位和部门的群众组织也不甘示弱，同样以“文攻武卫”为借口，与他们针锋相对。双方展开了激烈争夺战和“军备竞赛”，武斗不仅越来越频繁，参加的人数、使用的武器也越来越先进。双方甚至还私设公堂、牢房，严刑拷打被抓的所谓“俘虏”。一些单位和部门一有风吹草动，两派都呼吁增援。市民们经常看到，两派出动成百成千，持枪带刀，乘坐汽车，在市区横冲直撞，经常伤及无辜群众，恐怖气氛笼罩西安全城。

党中央根据省军区的反映，于 1967 年 8 月 10 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省军区发出指示如下：

陕西省军区：

对西北光学仪器厂二·一〇事件，根据国务院调查和陕西省军区反复调查的材料，中央认为是一个破坏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对逮捕的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应该予以教育释放。二·一〇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两个群众组织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在二·一〇事件中犯了破坏国家财产错误的，应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2 月 10 日，西北光学仪器厂的两派为夺权而发生武斗事件，“东派”的“工总司”调动韩森寨地区国防工厂千余人前往支援，冲击厂区，致使该厂装配车间停产，严重破坏了国家财产。）

陕西省军区在处理二·一〇事件中是有错误的，但不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现在平反是对的，不是为“打、砸、抢翻案”。

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相信他们，如对他们有意见，应实事求是地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

党中央没有估计到西安问题的严重性，以为只要军队稳定，能正确处理与群众组织之间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正确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军队和双方群众组织各做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不断的冲突与武斗已经使西安的两派视若仇人，中央指示的传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达不到制止武斗和混乱局面的作用。

更为严重的是，党中央包括江青本人也料想不到“文攻武卫”口号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和破坏性。这个口号犹如双刃剑，对立双方的群众组织都可以用来保护自己攻击对方。江青提出这个口号后，全国许多地



方的武斗迅速恶化，如四川、广西、广东、湖南、江苏、黑龙江等地，不仅武斗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四川省重庆市的武斗惨烈异常，全国有名，令党中央忧心。

重庆市武斗双方分别是“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都宣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为“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卖命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在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所形成的社会气氛、思维习惯、行事方式下，双方都认为“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民主不给反动派，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于是，他们都向对方进行压制、打击，不准对方发表意见，撕毁对方贴出的标语和大字报，砸对方的宣传车、广播站，这就势必引起冲突，发生斗殴。不过，他们开始只是动拳头、扔石块，逐渐发展到用匕首、棍棒、钢钎等。

重庆作为“三线建设”中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分部在主城区及周边的几个大型国防企业生产和储存有大量的常规武器，有的武器连当时的野战军都还没有配备，是准备送给越南抗美援朝用的。当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后，为了战胜对方，两派都公开借口“武卫”而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自己。他们各显神通，竞相抢夺国防企业成品库或部队军火库中的武器，有的还将国防企业的半成品武器组装、加工为成品，甚至自己生产武器（如重大“八一五”自制“八一五式”冲锋枪、手榴弹）。大量武器流散到群众组织手里，使重庆的大规模武斗迅速升级。值得一提的是，武斗双方都是为着同一个“革命目标”——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面对死亡时，双方都在念着同样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仅7月25日至8月底，重庆两派就发生13次大规模武斗。

在7月25日的武斗中，双方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8月5日，两派除使用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8月8日，武斗组织竟然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在江上横冲直撞。他们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8月12日，两派在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死亡数十人，伤600余人。8月18日，两派武斗中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惨案一直进行到8月20日。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达4000多人，死亡人数达200余人。当周总理听说杨家坪武斗期间，一夜打了1万余发高射炮弹时痛心地说：“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武斗不仅造成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更造成数以万计人员的伤亡，死亡的绝大多数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的学生和青年工人。更可悲的是，双方都称死难者为烈士，都为死难者开追悼会、建烈士墓，并依此激励本组织群众，更加仇视对方，要为死难者报仇雪恨，提出什么“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血债要用血来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至今，重庆市还保存有文革武斗时期建的“烈士陵园”。2009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沙坪公园内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以“红卫兵墓园”之名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名单。文革期间，重庆市有三个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其中，市二十九中八位学生的合葬墓墓碑很有特色。这座墓中的学生，均死于1967年武斗战火最炽烈的8月间，合葬墓建于大规模武斗暂时告一段落后的1967年10月，其碑文如下：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春华。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织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

胜利。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

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经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

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看环宇火样红。

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这大旗啊，我们高高举；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十月

全国各地的两派武斗都是这样，越斗仇恨越大，报复心越强，武斗越惨烈。为了申明自己的正义，赢得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武斗双方都大量印发“严正声明”“血泪控诉”“×××告急！”、“紧急求援”等传单和小报到处散发、张贴。

西安市受此影响，东西两派都加紧备战，暗中互相展开军备竞赛，有的工厂、学校自己制造枪支、弹药；有的干脆抢夺军队、武装部、民兵武器库的枪支、弹药；有些支持本派的军事院校、基层武装部等不便公开送，就搞明抢暗送。各大专院校的学生都准备了自卫武器，一般情况是，每人发一杆利用钢管做的长矛和一顶柳条帽，有的发给气枪等。学校周围的要塞处构筑工事，日夜派人看守。我们西工大有校工厂，工人们全力以赴制造自卫武器。我9月20日回到学校时，武斗已经停止多天了，但还可以看到许多制造武器、弹药的原料和半成品。

西安的形势眼看一触即发，越来越严峻，人人惶恐不安。但是，全国许多地方的武斗情况比西安严重得多，党中央根本无暇顾及，就这样，终于在9月2日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恶性武斗事件，闻名全国，这才惊动了党中央。

## （二十九）：腥风血雨西安城

1967年8月30日凌晨1时许，湖南来陕西串联的5名红卫兵和西安“工总司”的工人乘西安交通大学的汽车，携带武器到西安市东郊秦川机械厂预谋抢枪。汽车行至韩森寨地区时，被手持钢钎、头戴安全帽的一群工人发现并向他们高呼：“站着，站着，干什么的？”

韩森寨周围的工厂和单位，大部分职工加入了“工总司”，因此，这里是“东派”的天下。平日里，“东派”的汽车在这里可以横行无阻，没有人敢阻拦。他们以为这群工人是自己人，便急刹车把车停下，并向他们高喊：“我们是‘工总司’的，要到秦川机械厂办事，快让开！”没想到这群人是属于“西派”、“工矿联”的冤家对头，非但不让开，反而高喊“停下，快停下”、“反对打砸抢，打倒‘大杂烩’（指工总司）”。天黑，他们看不清车上人拿的什么武器，挺着钢钎冲杀过来。汽车哪敢再停，立即启动。这群人看他们要开溜，便围过来阻拦。只听车上的人喊：“快闪开！再过来就开枪了！”话音刚落，有人已经对准那群工人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在爆炸声和噼噼啪啪的枪声中，倒下一片人，其他人慌忙四散，等救援人员赶来时，汽车已经逃窜。这次武装冲突死2人、伤9人，成为西安市第一次开枪武斗的事件。“工矿联”的人这次吃了亏，发誓“血债要用血来还”。

8月31日，胡家庙地区和未央路地区的许多工厂发生武斗，双方都要求紧急增援。“东派”、“工总司”的头头马希圣等人经过策划，由刘安全率领大批武斗人员乘40辆卡车开往国营五四四厂为同派解围。“西派”、“工矿联”的头头张培信等人正想“报仇雪恨”，经过精心策划，调集数千名武斗人员，开赴庆安公司，对“东派”武斗人员实行包围，准备全歼。双方都不断调动人员参战，动用了大量汽车、消防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及步枪、机枪，甚至坦克和电台等作战武器和器材。这次武斗规模空前，激战惨烈，一直持续到9月2日。西安筑路机械厂、机械化工厂、西北金属结构厂、国营五四四厂、陕西制药厂、庆安公司、西安冶金机械修造厂等单位的厂房、设备及一些技术要害部门遭到严重破坏。一百多人死亡，290余人受伤，双方俘虏2000余人，并造成交通中断，厂矿、商店、机关停工、停产、停业。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西安九·二武斗事件”。

9月2日上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知后，严厉批评了双方头头，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撤出现场。同时，命令军区和驻军派大批部队分别赶赴各个武斗现场，包围武斗人员，制止和监督他们撤离现场，让武斗逐渐平息。

在那腥风血雨的日日夜夜里，西郊的枪炮声日夜不停，硝烟弥漫。一辆辆满载武斗人员的卡车，不断向西郊集结。街道两旁防御工事里埋伏的武斗人员，用砖头、石块，甚至步枪、机枪阻截增援的车辆和人员。那些参加武斗的卡车冲过一道道防线，冒着枪林弹雨呼啸而过。大街上，枪声不断，各个商店关门停业，人员稀少，异常恐怖。市民们关门闭户，个个心惊胆战地躲在家里。

请看目睹过这次武斗的网友的回忆：

安康：

8月30日晚，西安西郊某群众组织攻打东五路十字附近的西安市人民搪瓷厂。在搪瓷厂东边的利民米厂十字，这个群众组织架起了几挺机枪，整个晚上，枪声不断，就和打仗一样。子弹拖着光线在空中来回穿梭，夜晚的天空都被映红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人们跑到搪瓷厂门前看热闹，只见搪瓷厂的宿舍楼东面楼墙面被子弹打成了马蜂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把厂门口都围严实了，马路也堵塞了。这时，厂大门开了一条缝，走出了一个人。

光着上身的胖小伙子，只见他两手各持一枚手榴弹，朝着围观的人狂吼：“看球呢！你们再不走，我就擦手榴弹啦！”围观的人一看这阵势，哗地一下都跑散了，那个小伙子哈哈大笑着钻进了大门里。

这以后的几天里，西安紧接着又相继发生了攻打某供电单位的“8·31”武斗和西郊的“9·2”武斗。

王龙秦：

当年西安的楼房不多，我家住三楼，那天晚上在家里阳台看着那边子弹光飞来飞去，父亲不让在阳台上看怕被流弹打着。第二天才知道是在攻打搪瓷厂。

老来福：

那天晚上还出现了文化革命中唯一的一辆坦克，莲湖路上有坦克印。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去看坦克过去压的轮印了。

孙宗政：

搪瓷厂离农械厂很近，那天晚上的机枪声嘣嘣响，震得我一晚没睡觉。

ypl：

还是我们院子的 7.19 武斗打得厉害，航空机关炮咚咚咚，坦克把我们小学的楼穿过了两个洞，亲眼看见枪打死人很简单，人倒地翻几个滚就死了。现在有些人还很怀念那个年代啊，杯具！

学五连统计员：

我家住在西军电，66 年这所军校集体转业，所以上千的学员和教职工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出身，而且学校有武器库，都是真枪实弹。文革期间的每场运动，西军电都是一马当先、威震古城。

9.2 武斗西军电去了几十辆大卡车赴西郊，但是没有太大的伤亡，只死了一个老工人，是我同学的父亲。听说和西军电风雨同舟的西工大死了几个大学生，所以西军电的学生兵也是群情激昂。“9.2 武斗”后，西军电全民皆兵，围墙上全架起了机关枪，防止反对派的攻打。我们小孩子也被动员起来，做了很多的“烟雾弹”，就是把裁好的报纸包上石灰面，堆在围墙里作为应急弹药。呵呵，现在想起了都可笑。不过当时的红色恐怖也真的挺恐怖的哦。

“9.2 尸展”在建国路 26 中展出，我去看过，回来几天不能进食。“8.31 武斗事件”东派占了便宜，“9.2 武斗”西派是赢家。后来 21 军做了许多消除武斗的工作，（东派）“八.五”战团与（西派）“九.五”战团的首脑都被 21 军控制起来了，对这两个尖刀组织成员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所以西安在九二武斗后再没有更大的武斗发生。西安相比全国其他武斗严重的城市还算不错的。但也与东派太“窝菜”不能打也有关系。现在看来，这种“窝菜”救了西安市人民，也是好事情。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一位参加过“九.二武斗”的学生：

九月一日夜，我院“临委会”（应该是革委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我们带上自备的武器，乘坐我们这派（西派）支持“工矿联”的卡车车队，去西安西郊的庆安公司（一个大型国有飞机制造公司），支持该公司中我们这派的组织与对立派进行“文攻武卫”。当我们的车队通过玉祥门时，遭遇到了埋伏在路边的人砖头、石块的袭击，因为是黑夜，看不见袭击的人，只听到砖头、石块打在铁皮车框上的声音。突然有一块砖头打到我的柳条帽上，感觉头被震了一下，心想幸亏带了柳条帽，不然脑袋要给打破了。开卡车的司机迅速冲过这道“封锁线”，到达庆安公司外围的马路上停下，这时天已经亮了。

接着我们听到不幸的消息，在遭遇袭击时，我院一名教员柳××被人用掷来的“飞镖”刺中了头部，

“壮烈牺牲”了。同时，我们这派西北工业大学几名学生因为自带的燃烧瓶起火，也被活活烧死了。

过了不久，就听到了清脆的枪声，传来消息说对立派用机关枪架在汽车上，要冲出包围圈。指挥者要我们把便道上的砖撬起来，堆成“工事”，进行阻击。接着又不断听到更密集的枪声。说实话，当时我心跳得连我自己都能听到，看看路边单位的围墙不高，心想对立派真要冲过来，我就爬过这个围墙逃命。后来听说对立派的汽车从前面的岔路走了，有人看见子弹打在水泥路上冒起的一簇簇白烟。

当天下午，我们这派有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挺机关枪，由于不会使用，在庆安公司厂内摆弄，我站在旁边看，突然不知怎的枪走火，哒哒哒一串子弹射出，看的人都吓得跑开了，幸好没伤着人。

晚上回到学院，“临委会”也把我院封存的武器库打开了，枪支分到各个班。我因为回来晚了，没有分到真枪，只给了我一支气枪，一盒气枪的铅弹，还有一颗手榴弹。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用这支气枪在校园里打麻雀。就在 52 号楼前 5 系食堂旁的树上，一会儿就打 了 5、6 只麻雀。后来又跑到西大楼，找一些用过的墨水瓶，放到学院的北围墙上，在西大楼一楼北侧的大教室，把气枪架在窗户上打墨水瓶，射程大约有四、五十米吧，虽然不是枪枪打中，也把能找到的墨水瓶都打碎了。

我于 9 月 20 日回到西北工业大学后，才听说学校参加西郊庆安公司武斗的事。9 月 1 日夜里，我们学校革委会派数辆载满学生卡车去支援，路上，遭到埋伏在街道两边工事里对方人员的枪击。卡车上装载许多自制的燃烧瓶，其中一辆车的燃烧瓶被打爆，引起燃烧瓶的连续爆炸和燃烧。汽车不敢停下，反而加速行驶。车上的燃烧瓶借助疾风，爆炸和燃烧更加剧烈，处在火海中的学生们惊恐万状、鬼哭狼嚎、不知所措。有的学生当即被炸死烧死，没有死的学生衣服被点燃，浑身是火，无法忍受，纷纷跳车逃命，非死即伤，其惨烈之状无法形容。



图 11 西北工业大学“9.2 武斗烈士”追悼大会

周总理的指示只是暂时制止了“9.2 武斗”的继续恶化，并没有消除两派之间的“血海深仇”。在这次武斗中，“东派”的“工总司”吃了大亏，伤亡惨重。他们怎肯善罢甘休，发誓要伺机报复。为激起本派群众的义愤，他们在建国路二十六中举办了“9.2 尸展”，把死难者的遗体摆放在大礼堂里，供本派各部门、单位的群众组织参观。遗体周围摆满了花圈、花篮，墙上贴满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为死难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等白纸黑字的标语口号，在一阵阵哀乐声中，阴森可怖、凄凉悲壮。

与此同时，“西派”在西北工业大学大操场为“九.二武斗”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死难者的墓就在大操场西面，墓前、主席台前和两边摆满了花圈、花篮，“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巨幅白对联格外醒目。“西派”的四大组织头头都送了花圈并参加了追悼会。“工矿联”的许多工人戴着柳条帽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大会。会场上哀乐声声，庄严肃穆。与会人员个个“同仇敌忾、义愤填膺”，誓与“东派”血战到底，为死难者报仇。

为了报仇雪恨攻打对方，两派都抓紧备战，密谋策划，想法抢夺武器、弹药。西安市依然人心惶惶，笼罩在更加恐怖的气氛中。

## （三十）：周恩来下达开枪令

为了尽快贯彻执行周总理的“9.2”指示，制止武斗继续恶化，陕西省军区、二十一军和省委支左委员会把“工矿联”和“工总司”的负责人安文保、王宪琳、吴文杰、张谦等召集到省委支左委员会办公室进行紧急协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谴责对方的残暴行为，难以平静。若不是军队领导在场竭力劝阻，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打在所难免。直到3日凌晨2时许，军队领导经过苦口婆心反复的说服教育，双方总算冷静下来，最终达成协议如下：

### 协 议

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西安地区“工矿联”、“工总司”经过反复协商，达成关于坚决贯彻执行9.2总理指示的协议如下：

一、双方保证坚决地无条件地积极地传达和贯彻执行总理的“9.2”指示。

二、双方保证坚决贯彻执行9月1日晚达成的三条协议和十条协商。

三、鉴于9月1日晚已发生严重武斗事件，双方保证从即日起，绝对不再开火，对于牺牲受伤的人员立即移交对方，进行妥善处理。

签名：工矿联、工总司

1967年9月3日2时30分

双方虽然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但都没有真心实意去落实，特别是双方参加武斗的激进分子，已经斗红了眼，一心要为“死难者”报仇雪恨。协议如同一张废纸，置若罔闻，两派暗地里仍然加紧备战，密谋策划，报复对方。

9月4日，西安市的军部总机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总理要二十一军军长胡炜接电话。胡炜拿起话筒，听到总理那熟悉的声音。周恩来告诉胡炜：“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已经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介绍完情况，周恩来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胡炜同志，你要立即派部队严加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胡炜如同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双腿并拢，笔直挺立。他手持话筒，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斩钉截铁地说：“请总理放心，我们坚决执行总理的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文化大革命以来，周总理办事一向小心谨慎，从来没有亲自下过“开枪令”。那么，这天他为什么会下达开枪令呢？看一看当时全国文化革命的严峻形势就明白了。全国各地武斗不断升级，武斗双方为了报仇雪恨，都想法武装自己，想法抢夺武器、弹药。当时，我国中型以上的国营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都设有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并配备有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所以，武斗双方首先都把目光投向了基层的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因此，这些基层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的武器弹药就是最先遭到抢劫的对象。当然，许多地方的武装部和民兵组织也参与了派性斗争和武斗。西安市就是这样，有的武装部直接把武器弹药发给本派群众组织，有的采用明抢暗送，还有一些军事院校和少数基层连队，也参加或暗中支持本派群众组织的武斗。但是，这些武器、弹药数量有限，而且都是一些常规的轻型武器。为满足压倒对方的需要，许多地

方的武斗组织又把目标选择到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库。

1967年7月底至8月下旬，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的武器弹药库先后被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各类枪支、迫击炮、手榴弹、子弹等。

1967年8月9日，浙江省军区军械一库、二库的武器弹药先后被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信号枪、手榴弹、子弹等。

1967年8月29日至31日，宝鸡几个造反组织先后抢走宝鸡市武装部、宝鸡县武装部、宝鸡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步枪1400多支，轻机枪110多挺，冲锋枪2支，手枪100多支，子弹几十万发。

.....

面对全国各地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抢夺军队武器库的事件屡屡发生的严峻局势，党中央十分忧虑，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尽快制止。1967年9月4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制定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特别重申：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该命令是9月5日颁布的，也就是说，周恩来总理于9月4日向胡炜下达“必要时可以开枪”的命令时，“九.五命令”已经决定颁布了。恰在此时，周总理得知西安交通大学和当地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相互勾结，带领“工总司”的工人到解放军武器库抢夺武器装备。这个仓库的武器装备，可以装备几个步兵师，一旦被抢，整个陕西省就要大乱，甚至影响到邻近的其他省份。令周总理更为恼火的是，双方刚刚签订了停止武斗的协议，还没有执行，又要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他看情况严重而且紧急，立即亲自打电话给军长胡炜，命令他派部队前去守卫。放下电话后，周总理仍不放心，又交待总理办公室西北地区的联络员吴斌再给西交大“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打电话，责成他立刻派人前去武器库，把准备抢夺武器弹药的人员全部撤回回来。

胡炜接完周总理电话，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没有片刻迟疑，马上向团长徐保健下达命令，要他亲自率领一个营的兵力，用最短的时间火速赶到该武器库，全面接管武器库的防务。

再说，一个多月来，西交大的学生和“工总司”的群众不断冲击二十一军军部，并侮辱谩骂解放军官兵。解放军官兵早就窝着一肚子火，憋着一肚子气，因为有“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命令，他们也只好忍着。这下好了，因为有周总理“可以开枪”的命令，他们也就不再畏手畏脚了。一声令下，部队迅速集合完毕，徐营长简短作了介绍和动员，便分乘数辆军用卡车风驰电掣般赶到该武器库。此时已近黄昏，“工总司”的人员还没有赶到。众官兵下车后，徐营长命令他们先把武器库的防务全面接管过来，然后，里里外外布置了好几道警戒线。

战士们迅速进入临战状态，纷纷架起机枪、子弹上膛，严阵以待。很快，西交大和“工总司”的人马也赶到了。他们正准备向武器库接近时，徐营长向他们高喊：“这里是解放军武器装备库，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谁胆敢跨越警戒线抢夺武器、弹药，就是反革命行为，我们解放军就要执行周总理的命令，开枪制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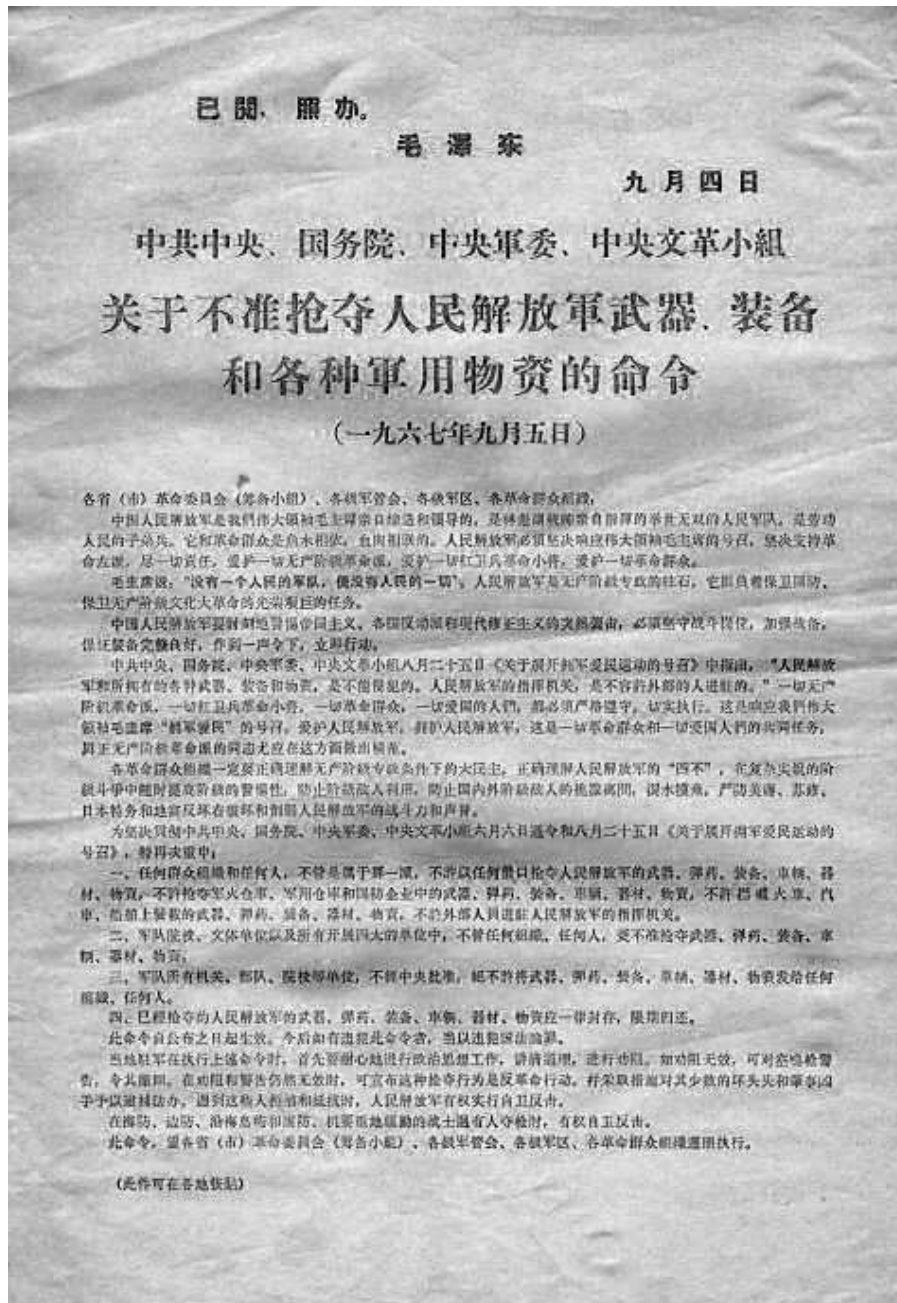
这些人看到武器库周围有那么多解放军把守，黑洞洞的机枪口正对着他们，一下子傻眼了，个个愣在那里



不敢动。正在这时，李世英派的人员也风风火火赶到。他们和领头的嘀咕一阵后，纷纷掉转车头灰溜溜地跑了。

## （三十一）：九五命令终止武斗

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该命令对制止西安乃至全国各地不断发展的大规模武斗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原文如下：



其实，党中央在此以前，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和物资了。只因武汉和河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引起造反派的愤慨和极力反抗，中央投鼠忌器，要保护造反派，没有授权军队“可以自卫反击”。而今，各地武斗的规模越来越大，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和物资的事件频发，再不立即制止，必将失控，威胁国家安全，党中央终于采取强硬措施制止武斗。

正是“九.五”命令赋予了解放军必要时可以开枪自卫的权力，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陕西省军区、驻军和支左委员会立即把“九.五命令”印发各企业、部门、学校、机关、单位，出动大批军人和宣传车广泛宣传、到处张贴，迅速掀起贯彻《九.五命令》的热潮。

10月13日，省军区、驻军和支左委员会又召集西安的两派组织代表，就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央《九.五命令》，彻底收缴各造反组织、武斗人员的武器问题进行协商，最终达成协议。为保证协议的落实，省委支左委员会还对一些重点企业、部门和单位实行军管或派驻军宣队。

9月13日，针对全国一些地方群众组织在武斗中不断发生抢夺国家粮食、现金、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的严重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通知》要求：

1.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1967 年 6 月 6 日的《通令》，坚决制止抢夺国家和集体财产。
2. 对已发生的抢夺国家财产的事件要严肃处理，抢夺的国家财物要一律追回，首恶者要严办。
3. 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和革命群众组织要对保护国家仓库、金库、物资、财产的安全负责，不准冲击、砸抢国家仓库、金库、油库、冷库、营业场所和生产企业。
4. 对外出串连的群众，要动员回去就地闹革命，要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
5. 因武斗造成停产的单位，从停产时起到恢复生产之日止，一律停发工资。
6. 该《通知》的传达贯彻，对恢复西安市各厂矿企业生产和劳动纪律，制止工人参加武斗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武斗造成停产的企业和单位，尽快恢复生产，大部分工人不再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参加武斗。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各学校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一切大、中、小学校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在教学实践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各学校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各学校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除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外，有些人过去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应该让他们站出来工作；各大、中、小学校都要积极筹备招生事宜。

这个《通知》下发后，在各个学校尤其是大专院校产生了极大反响，深受大多数学生的拥护。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一年多了，越闹越没结果，学生们的心都有些凉了，又学习不到课本知识，将来如何工作，无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实际上，学生中积极参加文革活动的激进分子是少数，大部分是随大流。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浪潮的冲击下，各级党政机关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学校更为严重。学生们不上课，无人敢管，任何人也管不了，学校已经成为一盘散沙，真正经常参加活动的很少，大部分是“逍遥派”。我们学校搞什么集体活动，都是靠校广播站反复“吆喝”，才把学生们集中起来的。在武斗最严重的七、八、九三个月，大部分学生都离开学校了，有串联的，有外出游山玩水的，有回老家的，有走亲访友的等。我们班的同学们几乎都走了，当学校发电报让回校“复课闹革命”时，都积极响应，很快回到学校。我就是10月16日接到电报，20日从老家赶回学校的。

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制止武斗措施，对制止西安武斗的不断加剧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的两派武斗，大部分与两派学生的参与和煽风点火有关。如今，学校搞“复课闹革命”，学生们都回学校了。各企业、单位的职工因怕扣发仅能养家糊口的工资，哪敢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武斗便很快制止住了。

随着全国各地武斗逐步缓和，文化革命逐步纳入正常轨道——“大联合”“斗、批、改”和筹备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为此，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

“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自此，党中央开始筹备召开“九大”，陕西省开始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